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研究所

碩士論文

網路傳播科技對於蘭嶼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
的動員與凝聚

**Social capital and indigenous social movement: How
Internet affect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Orchid
Island**

研究生：劉嘉偉

Name: Chia-Wei Liu

指導教授：張玉佩 博士

Advisor : Professor Yu-Pei Chang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

網路傳播科技對於蘭嶼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
的動員與凝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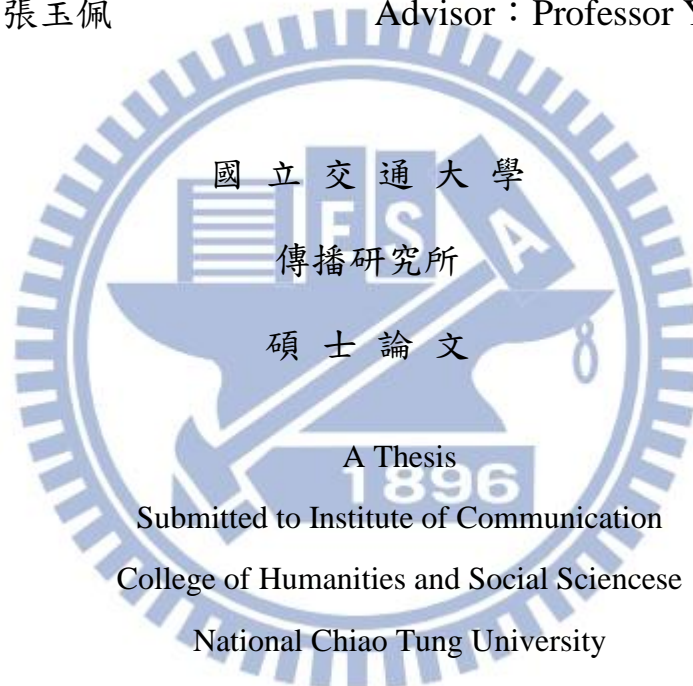
**Social capital and indigenous social movement: How
Internet affect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Orchid Island**

研究生：劉嘉偉

Student : Chia-Wei Liu

指導教授：張玉佩

Advisor : Professor Yu-Pei Chang



A Thesis
Submitted to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Art

January 2013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

中文摘要

隨著網路傳播科技的發展，其即時性與網絡化連結的特質，正逐漸改寫社會運動的集結過程；對於原住民社會運動而言，網路可以作為凝聚部落共識、擴大動員網絡、凝聚運動所需之社會資本的重要平台。據此，本文援用社會資本之「網絡」、「規範」與「資源」的概念體系，對於新舊兩代蘭嶼反核廢運動進行比較分析，試圖瞭解網路傳播科技對於原住民社會運動之社會資本的動員與凝聚。研究採取民族誌研究方法，共進行19人次的深度訪談與2次正式的參與觀察。

研究發現，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是透過教會與家族網絡進行動員，網絡同質性高，能凝聚較強的行動規範；其次，他們挪用傳統的「惡靈（anito）」符號進行抗爭，能連結族群認同、凝聚較高的反抗能量。相對於此，新世代的達悟青年則透過網際網路，克服地理限制，擴大動員的人際網絡；但由於網絡異質性較高，建立長期而穩定的行動規範則是未來重要的挑戰。最後，物質資源的缺乏，仍是新、舊世代所共同遭遇的困境。

關鍵詞：社會資本、網際網路、社會運動、蘭嶼、達悟族、反核廢運動

Abstract

This article applies social capital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aboriginal (Tao) young and the old generation, to explore how Internet affect the anti-nuclear campaign's social networks, norms, and resources. To understand Tao's life experienc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was taken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finding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old generation used church systems and the family networks to mobilize people. Meanwhile, the appropr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symbols, Anito (evil spirit), articulated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release the higher protest power. Therefore, the young generation overcame the geographic isolation, expanded the social networks and mobilized more heterogeneous groups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However, due to the heterogeneous social networks, it was much difficult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commitments among members. Finally, the old and the young generation are facing the same obstacles, which are lacking economic and material resources.

Keywords: Social Capital, Internet, Social Movement, Orchid Island, Anti-nuclear waste

致謝

如果能將時光倒退，場景拉回2010年，重慶北路炎熱的夏天。一大群研究所的考生們，在暑假週末起了個大早，手上拿著咖啡，夾份中國時報，魚貫地走進補習班的大門，開始從早到晚的暑期衝刺。這是許多傳播科系學生再熟悉不過的場景。經過長達半年的K書，囫圇吞棗般，塞進大大小小、似懂非懂的理論與學說。緊接的是一個月密集的「赴京趕考」。先考台大、緊接著是政大、師大、文化、交大、中正。一連串的考試後，又是放榜、複試、口試。我到交大念書前，就像一群沒有思想的工蟻，只會跟著部隊的指令前進。這就是考研究所的「必經之路」。多麼的公式化的流程，以及多麼扼殺每一位考生的創意。

幸好，對於創意與思想的扼殺，終於在交大傳播所與傳科系這片自由的土壤，從新找到豐厚的養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陶振超老師所教導的量化課，那是有別於以往的上課方式，讓我瞭解，原來知識是可以經過不斷地辯證而產生。如同陶老師所說：「大學是學習知識；研究所是創造知識」。我想，陶老師不論在教學或研究上，都始終如一地貫徹他所信仰的典範。

當然，研究所最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老師—張玉佩老師。玉佩老師不論在研究、書寫或做事情的態度上，都是我學習的目標。玉佩老師真的就像媽媽一樣，對我們這群「臭孩子」，總是給予最大的包容。我想，最適合老師的形容詞應該是「豆腐口；豆腐心」吧！

再來，不免俗地要謝謝研究所的最佳夥伴：醒宇、筠駿、小羊。永遠的「大馬蘭嶼四人幫」。好的、壞的、開心的、難過的，都有你們一起分享，一起承擔。生命中有你們這群知心的朋友，真好！

目錄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致謝.....	III
目錄.....	IV
表目錄.....	VII
圖目錄.....	VIII
第一章、前言	1
第一節、傳播科技在蘭嶼.....	3
第二節、反核廢運動相關文獻.....	8
第二章、社會資本、網際網路與原住民.....	11
第一節、社會資本的起源與定義.....	11
壹、Putnam: 公民參與及社會信任.....	11
貳、Coleman: 社會網絡鑲嵌的資源.....	15
參、Bourdieu: 再製不平等關係.....	19
肆、網絡、規範、資源.....	22
第二節、社會資本與網路傳播科技.....	23
壹、時間／空間壓縮.....	24
貳、去疆域化.....	25
參、網絡化連結.....	27
肆、小結.....	30
第三節、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	30
壹、網路的賦權潛能.....	32
貳、網路社會運動.....	34
參、網路的侷限.....	35
肆、網路與原住民社會運動.....	37
第三章、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41

第一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41
第二節、研究源起.....	43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	45
壹、深度訪談.....	45
貳、參與觀察.....	48
參、小結.....	50
第四章、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分析	51
第一節、反核廢運動之社會網絡.....	51
壹、舊世代之社會動員.....	51
貳、新世代之社會動員.....	56
參、小結.....	59
第二節、行動規範與世代規範.....	63
壹、舊世代行動規範.....	63
貳、新世代行動規範與世代規範.....	65
參、社群規範的衰退.....	67
肆、小結.....	71
第三節、反核廢運動之資源.....	71
壹、文化資源.....	72
貳、物質資源.....	78
參、人力資源.....	79
肆、媒體資源.....	81
第四節、新舊世代的比較分析.....	83
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87
第一節、網路傳播科技.....	87
壹、傳播管道轉變.....	87
貳、傳播科技賦權.....	88
第二節、社會資本的檢討.....	90
第三節、反核廢運動的實務建議.....	92
第四節、研究方法的反思.....	93

第五節、研究限制.....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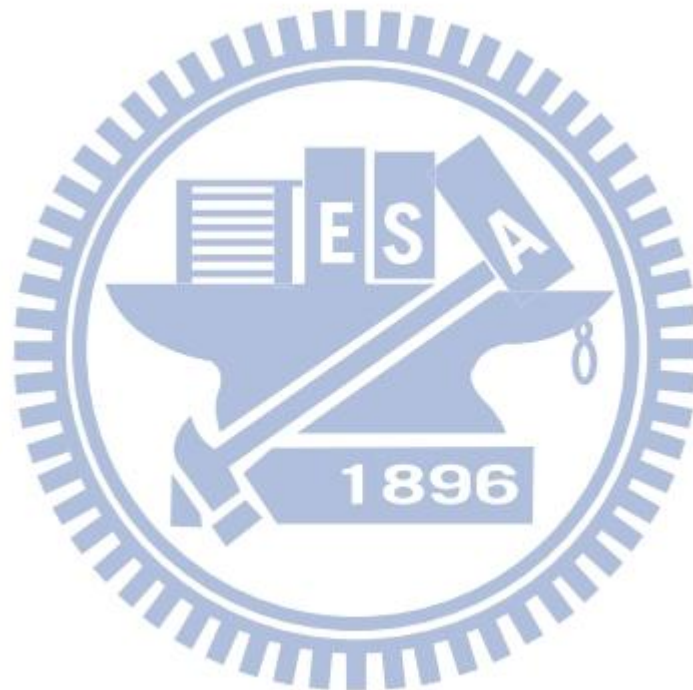
參考書目 97

附件 訪談大綱.....102



表目錄

表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46
表4-1 新／舊世代比較分析.....	84



圖目錄

圖2-1 開放與封閉性社會網絡.....	17
圖3-1 研究架構圖.....	42
圖4-1 舊世代動員過程分析.....	55
圖4-2 311反核運動社會網絡分析	58
圖4-3 新世代動員過程分析.....	59
圖4-4 核廢料儲存場外的抗議標語.....	73
圖4-5 達悟族前往抗議時的裝備.....	74
圖4-6 220反核廢紀錄片【吶喊】	76
圖4-7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311反核大遊行〉活動頁面.....	76



第一章、前言

社會運動是促進社會改革與進步的重要行動，而社會運動成形的關鍵在於有效動員與凝聚公眾的力量；因此，如何在運動當中累積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而增強運動的影響力，一向是社會改革的重要議題。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及，其即時性、網絡化連結與去中心化的特質，正逐漸改寫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產生顛覆既有權力結構的可能。對於長期缺乏資源的原住民社會運動而言，網路對內可以凝聚部落與社群的共識；對外，則能擴大動員網絡，串連全球與地方的公民組織。因此，原住民族不再是囿於地理限制的群體，而是透過網路，跨越時間與空間的距離，形成全球原住民與公民團體之間的新夥伴關係。值此，資訊社會裡新一代的原住民領袖，將透過網際網路導引原住民運動的發展，並且共同形塑出新型態的社會資本(Landzelius, 2006; Fukuyama, 1999; Lin, 2001; 李英明, 2000; 孔文吉, 2000)。

台灣島上擁有多元而豐富的原住民族，但在歷經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力量，逐漸流失原有的土地、語言與文化，進一步使得當代原住民陷入社會底層的循環之中。為了維護與保障自身的文化權益，許多原住民知青於1980年代起，揭起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例如「原住民正名運動」、「還我族語運動」與「還我土地運動」等。其中，由蘭嶼達悟族所發起的反核廢抗爭，是歷時最久，且獲得國際輿論高度關注的原住民社會運動。對達悟族人而言，反核能廢料運動是原住民對於政府無視達悟民族主體性、擅自掠奪土地的反抗運動(王顥中、陳韋綸, 2012)。或正如夏鑄九所言，反核廢運動的本質上是基於殖民歷史的空間行動。它代表達悟人對於50年代末期作為獄場，60年代中期作為觀光公園，及至70年代末期作為文明垃圾場的歷史過程中，空間自主權喪失後的一種覺醒與反抗。(夏鑄九、陳志梧, 1988)。

蘭嶼，國家放射性核廢料儲存場於1982年5月19日接受第一批10,008桶核能廢料。此後，運送核能廢料的貨船，就以每星期1航次，每航次228桶的速度送往

蘭嶼。70年代，當核能廢料儲存場在島上興建的時候，當時的施工單位聲稱小碼頭是軍用港口，而核廢料儲存廠是罐頭工廠；透過此種欺騙的方式，台電順利在蘭嶼建置第一期的儲存場工程（關曉榮，1997）。然而，當越來越多的達悟族青年接受基本教育並前往台灣求學與工作後，逐漸對於核廢料有深入的認識，知識使得政府的欺瞞政策不再奏效，於是，1987年12月於蘭嶼機場爆發了第一次反核廢抗議。始於1987年，達悟族曾發動數次的反核廢運動，其中較具規模的運動包含：1987年，由郭建平與夏曼·藍波安等青年在蘭嶼機場抗議台電收買蘭嶼鄉代赴日觀光；1988年，達悟族人發起首次之「220反核廢驅逐惡靈」運動，此後，2月20日成為達悟人發起反核廢抗爭的象徵日期；1995年，發起一人一石填港，阻止台電核廢船上岸；2012年3月11日，達悟青年首度利用網路傳播科技，成功動員上千位支持者，聲援核廢料撤出蘭嶼的訴求。值得注意的是，參與2012年抗議的人數，首度突破千人的規模，由此顯示，反核廢運動的觸角已經擴散至主流社會的議題之中。

平行於1987至2012年的反核廢歷史，蘭嶼社會也逐漸被吸納進台灣的市場經濟當中，飛機與輪船帶來大批的觀光客與現代商品，儘管小島仍保有傳統捕魚、種芋頭的生產型態，但許多新生代的達悟人已經轉型為從事觀光產業來維持生計。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網際網路也正逐漸改寫與形塑蘭嶼的不同風貌。對於現今的蘭嶼青年而言，電腦與網路已經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同於Prensky（2001）對於「數位原生者」(digital native)與「數位移民者」(digital immigrants)的討論：成長於數位時代的原生者習慣透過電腦與網路來進行溝通，他們所展現的共同特色是即時性與多元性；而成長於低科技環境中的數位移民者則擁有較強的社群規範，喜歡面對面的溝通方式。兩代之間，由於科技的轉變，因而產生許多思維上的差異。對於社會運動而言，數位原生者的接棒，將逐漸累積並展現不同形式的抗議能量。

為了釐清傳播科技與原住民社會運動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本文將以社會資本為主要概念，討論網路對於社會資本的動員與凝聚。因為社會資本指涉行動者

藉由社會網絡近用資源的能力，其中，網絡內所蘊含的互惠規範將影響行動者能否有效取得資源（Portes, 1998）。簡言之，社會資本可以從網絡、規範、資源三大構面進行探討。對於舊世代與新世代反核運動者而言，透過網路的介入，使得凝聚社會資本的方式產生鉅大的差異：舊世代的反核運動由於缺乏網際網路，因此凝聚社會資本的方式是透過傳統的家族系統與文化規範，並且主要的發聲管道是透過主流媒體；屬於新世代的反核運動，則能透過網路的協助，抹除地理上的限制，跨越異質的社會網絡，凝聚出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

鑑於「原住民」所指涉的對象並不是先驗、固定與均質的整體，相反地，它是在歷史的脈絡中，不斷與各社群互動的結果。因此，討論原住民與科技互動時，本文並不採用科技決定論的線性觀點；反之，是從科技的文化建構以及從原住民主體的角度，探討原住民如何使用、挪用與想像科技。此外，本文也將從原住民自我決定（self-determination）的方向，思索如何確保原住民的傳播權與打開跨文化交流的空間。據此，本文將透過民族誌研究方法，從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兩個面向，貼進達悟族的生活場域與生命經驗，藉以梳理反核廢運動的過程與社會資本的轉變。

第一節、傳播科技在蘭嶼

蘭嶼孤懸於台灣東南方的海域上，與恆春半島互相遙望，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曾派專人探勘蘭嶼，認為島上並無開發價值，因此將全島畫入禁區，除部分人類學家外，不准任何人進入蘭嶼。蘭嶼島上的原住民過去被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稱為「雅美族（Yami）」。然而，雅美族的稱號在經過族群正名運動後，開始以達悟人稱之（郭良文，2010）。蘭嶼共有六個部落，分別是紅頭、漁人、椰油、朗島、野銀、東清；根據蘭嶼鄉戶政事務所最新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設籍在蘭嶼島上的居民人數約為4644人，男性2384人，女性2260人。其中百分之九十為達悟族人，其餘為移居蘭嶼或是派駐在島上的公務人員（蘭嶼鄉戶政事務所，2011）。

傳播科技得以在蘭嶼發展，中間經過許多文化、殖民與資本力量的建構，特別是邁向現代性的過程中，包括西方宗教、資本主義、國民教育以及地下屋改建等外在因素，無不劇烈改寫整體民族的命運；因此，欲理解傳播科技對於蘭嶼所造成的影響，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回顧近百年來，動盪蘭嶼的事件與政策。首先，起源於西方文明的基督教與天主教，自1948年傳入蘭嶼，正逐漸融入達悟民族的泛靈信仰，並且成為雙軌並置的宗教體系。

蘭嶼在日本殖民統治的50年間，鮮少與外界接觸，生活上仍維持捕魚與種芋頭的生活模式。二次大戰後，日本戰敗，蘭嶼隨著台灣納入國民政府的管轄範圍；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的初期，蘭嶼與本島的接觸仍不頻繁，相當程度仍維持原始的生活風貌。一直到1948年，基督教傳入蘭嶼，天主教也於1954年由瑞士籍神父紀守常帶入，至此，蘭嶼的宗教信仰體系開始與外界融合（郭良文，2011）。傳道人開始在各個部落建立不同的教會系統，部落的社會型態也因宗教而有所改變：教會成為居民討論議題的場合，而牧師與傳道人也成為部落耆老之外，提供現代化資訊的意見領袖。

第二項改變蘭嶼的外來力量是1960年代，代表統治政府與資本主義的勢力開始透過教育及觀光的名義進入蘭嶼。這是個動盪年代，一方面來自國民政府的現代教育系統開始對蘭嶼孩童施行漢化教育；同時，蘭嶼與台灣的交流漸趨頻繁，商品經濟與貨幣的概念也首度進入達悟族的日常生活。1966年，《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第二次修正，增列第三十四條規定「平地人企業必須報經核准方得租用或使用山地保留地」；此後，來自台灣的民間資本開始透過觀光的名義滲入蘭嶼，小島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也開始遭遇嚴重的挑戰（黃彩惠，1990）；1972年，輪船與飛機定時通航更象徵性地打開蘭嶼長久封閉的門戶。蔡友月（2007）認為，從1960年代開始，短短的二、三十年，整個島經歷快速變遷；原本與外界隔絕的蘭嶼，受到台灣經濟體制的牽絆，開始納入「商品交易」與「市場經濟」的依賴關係中。

1968年，台灣政府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1969年，蘭嶼國中在紅頭試辦，隔年在椰油正式設校（蔡友月，2007）。此時，來自台灣的教師一方面灌輸復興中華文化的思維，另一方面也教導現代化的知識，例如認識家電用品與金錢的觀念。黃彩惠（1990）認為，在「漢化」為主要內容的教育體系下，已經徹底摧毀達悟人世代相傳的生活經驗與知識；回顧達悟族的傳統知識體系，並未包含文字的概念，因此，面對以文字為主的漢化教育，無形中將阻礙達悟孩子的學習過程。而歷經資本主義與漢化教育等雙重力量的合擊，使得蘭嶼島上的經濟模式開始改變，原有捕魚、種芋頭的生產模式已不適用於市場與貨幣經濟，使許多達悟青年放棄原有的生活型態，集體投入台灣的勞動市場以賺取生活所需。無奈的是，投入就業市場的過程，卻又受限於教育的衝突，例如數學與文字概念的缺乏，因而被迫從事低階的基礎勞動。根據蘭嶼鄉公所於198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達悟人在台灣的勞動人口總數為719人，佔全族人口的4分之1（黃彩惠，1990）；此外，由台大城鄉所（1989）的調查資料亦指出，旅台達悟青年所從事的職業大多是製鞋業、塑膠業、橡膠業、零工等勞力密集的產業。由此可知，自從蘭嶼快速進入資本主義的體系後，正艱辛地面臨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

除資本主義與漢化教育的影響外，另一項劇烈改變蘭嶼傳統文化的政策，是由國民政府補助的「示範住宅計畫」。1970年代末期，國民政府推動《改善蘭嶼山胞住宅改善計畫》，企圖以現代國宅取代蘭嶼傳統的住屋型態，截至1980年為止，兩階段的住屋改造計畫共興建566戶的國民住宅（台大土研所，1984）。由於傳統地下屋代表達悟文化的生活模式，拆除住屋，遷移至現代住宅的過程，不僅是對原生文化的摧殘，更種下達悟族日後對於國民政府興建核廢場的憤怒因子。如同夏鑄九（1988：239）指出：「國宅計畫所營造的新住宅，在空間功能、形式、意義以至於它營造時的技術與材料，都完全背離雅美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再生產的功能。」更嚴重的是，許多不良建商，使用海砂等劣質建材，造成許多房屋落成不久，就面臨鋼筋鏽蝕、水泥塊掉落等安全疑慮。許多學者皆表示，國民住

宅計畫是種下蘭嶼人不滿台灣政府的主要因素(夏鑄九、陳志梧,1988;黃彩惠,1990;蔡友月,2007)。

歷經動盪的年代後,不論達悟人接受與否,都逐漸被拉扯進現代化的過程,而象徵摩登(modern)的傳播科技,也從此時萌芽。1980年代,環島公路、公車、水、電等現代化設施相繼建設完畢;1982年核廢料儲存場完工,同年,蘭嶼開始供應電力,而收音機、電視、電腦等科技產品,則首度進入達悟族的日常生活(蔡友月,2007)。自此,許多達悟人逐漸轉型為現代家庭的生活方式:住國民住宅、聽收音機、看電視。島上收聽廣播的途徑是透過小型攜帶式的收音機;至於電視,則由於蘭嶼並未鋪設有線電視的纜線,收視的管道是透過碟盤(俗稱小耳朵),接收衛星訊號。值得注意的是,電視的進入,正改變達悟族人原有的互動型態。蔡友月(2007)提到,以往部落晚上涼台聊天的娛樂,逐漸被看電視所取代,而電視所傳達對台灣物質生活的嚮往,更使得世代間的代溝加大。

比起廣播及電視,「網路傳播科技」進入蘭嶼的時間點整整遲了20年,如同前述政策,電腦與網路的普及仍是受到政策的影響。2007年,由台灣教育部主導縮短數位落差計畫之「低收入戶國民電腦應用計畫」開始施行,此計畫補貼多數蘭嶼家庭一台電腦,並且免費附帶一年的寬頻上網;同年,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所推動的「村村有寬頻、部落有寬頻」計畫,也敦使中華電信在蘭嶼建置微波發射站,至此,蘭嶼六個部落,終於享有順暢的上網環境(翁翠萍,2007;張玉佩,2012)。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官方所主導的縮短數位落差計畫,雖能有效建置蘭嶼的基礎建設,但如同「示範住宅」,主政者或許基於善意,希望改善達悟族的生活品質,但相關政策卻未從原住民主體的思維進行擘劃,以至於原本的美意成為侵擾當地文化的原因。例如「國民電腦計畫」忽略蘭嶼屬海島型氣候,水氣與鹽分較重,許多電腦在經過一段時日後,多數鏽蝕、損壞;此時,島上又缺乏維修的據點,因而許多電腦便成為家中無用的擺設;此外,國民電腦僅是硬體的補助,缺乏軟體技能的訓練,部份家庭仍缺乏使用的能力,使得原本彌平數位落差的美意打了折扣。儘管美中不足,但自從2007年以降,蘭嶼的硬體建設已

漸趨完備，對於2012年興起的反核廢運動而言，仍欠缺的是積極運用網路傳播科技的原住民主體。以下，本文將整理新世代達悟青年的求學過程，藉以說明為何2012年所展現的是不同於以往的反核廢抗爭運動。

電力是推動現代科技的必要條件，1980年代以前，蘭嶼缺乏基礎電力設備，遑論使用科技產品。直到1982年，核廢料儲存場完工，蘭嶼開始供應電力，該年，也成為客觀條件上，區分達悟族新舊科技世代的分水嶺（郭良文，2010；蔡友月，2007）。1980年代之前出生的達悟人，對於傳播媒介的認識不深，首次接觸多來自於學校老師的介紹，或是親身至台灣求學或工作的接觸。但對於1980年代之後出生的孩子，電力帶來了現代科技，使用科技產品成為許多孩童的成長經驗，對於80後的世代而言，蘭嶼的現代化腳步有助於他們未來進入台灣求學時能相對順利地接觸新傳播科技，包括網路與電腦。以下為了方便討論，本文參考Prensky（2001）對於數位原生者與移民者的分類，將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達悟人稱為「舊世代」反核運動者；而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孩子稱為「新世代」反核運動者。

在反核廢的歷史中，新世代達悟族的童年記憶裡，交織著傳統的拼板舟與現代的科技設備。他／她們對於達悟祖先的生存技能已逐漸陌生，並且在電視播送台灣物質生活畫面的影響下，對於台灣的一切越來越嚮往。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蘭嶼當地的最高教育機構僅至蘭嶼中學，許多蘭嶼青少年在國中畢業後，須離開小島前往台灣繼續就學（蔡友月，2007；夏鑄九、陳志梧，1988）。在這群達悟青年的國中、高中與大學的求學過程，大約是1990年代的後期，此時，台灣絕大多數的國小、國中、高中都已經設有資訊教育的課程。根據教育部「資訊教育計畫」的推動時程，1996年6月即已完成台灣本島各國中小學的電腦與網路建置；因此，蘭嶼的孩子就讀國中或高中時，多數能接受完整的資訊教育（教育部，2008）。

當新世代的達悟青年順利完成高中，乃至於大學的求學過程後，再度鮭魚返鄉，時機點適逢「網路傳播科技」在蘭嶼逐漸建置完備的時期。如同歷史上的偶

然都有線索與脈絡可循：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在滿足「資訊技能」以及「資訊基礎建設」等客觀的因素後，逐漸醞釀至福島核災所激起的反核浪潮而乘勢迸發。易言之，成長過程曾接受資訊教育的達悟青年，已經可以在蘭嶼獲得基本的連網設備；因此，這些內化在認知結構中的數位知識，將化為實踐島上發聲的土壤，並於2012年的反核運動中，綻放出不同形式的成果。

第二節、反核廢運動相關文獻

本文將以「原住民社會運動與新傳播科技的影響」作為討論焦點，並且，選定蘭嶼達悟族的反核廢運動作為觀察對象。一方面，瞭解傳播科技進入蘭嶼後，對於長期的反核廢運動所產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以達悟族的案例作為基礎，重新反思並回饋傳播科技對於整體原住民族，所可能帶來的賦權與挑戰。根據年代進行梳理，關於蘭嶼反核廢運動的文章分別有黃彩惠(1990)、張桓凱(1997)、王嵩音(1998)，以及郭良文(2010)等四篇文章。以下將分別整理這四篇文章的研究目的與背景，並藉此釐清本文在後續將要執行的研究方向。

黃彩惠(1990)透過「資源動員理論」分析反核廢的動員過程，文章透過文獻與田野調查的資料進行說明，目的是要瞭解反核廢運動興起的主客觀因素，以及集體動員的過程。研究結果發現：反核廢抗爭運動糾結許多達悟族對於漢人長期的不滿，包括對於土地的侵占以及漠視達悟族的生命財產權，在多方因素的影響下，促成反核廢運動的興起。此外，在動員過程方面，是以「雅美青年聯誼會」為主體，對內結合教會與家族系統的人際網絡，對外串連綠色和平組織與黨外團體。該研究發現，教會與家族的社會網絡對於動員部落群眾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外，串連綠色和平組織等黨外團體的過程，是提供資源進入達悟社群的管道之一。然而，由於文章分析的時期屬於1987年至1988年的反核廢運動，因此相對缺乏對新傳播科技的討論。

至於張桓凱(1997)則是以「滅族恐懼」作為切入點，試圖瞭解原住民社團與新聞媒體如何建構反核廢運動的意義。作者採取兩種取徑：其一是對於反核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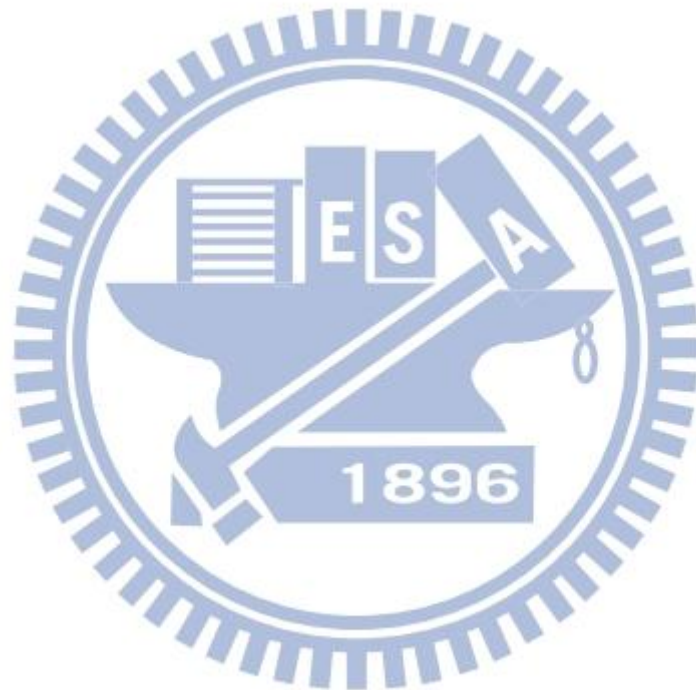
的成員進行訪談，其二是對於新聞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研究結果發現：草根組織對於族群標誌（丁字褲、飛魚）的挪用，將能有效吸引新聞媒體的注意力，進一步建構新聞議題。

王嵩音（1998）則是透過「新聞框架」的概念，探討新聞媒體如何「再現」蘭嶼的反核廢抗爭運動。研究方法採取質與量並重的內容分析，並且選取14份報紙的176篇報導作為樣本。研究的主要發現是：無論是抗爭前或抗爭後，報紙媒體在報導主題、消息來源的選擇、以及報導的方向，一律都偏向威權，充分顯示媒體支持「維持現狀」的主流意識形態。王嵩音的研究聚焦在新聞媒體的內容層面，相對缺乏對於達悟社群與田野場域的瞭解。值得注意的是，媒體在報導反核廢運動時，多傾向維持既有利益，屬於弱勢社群的聲音反而被忽略。這說明原住民社會運動當中，擁有自主發聲的平台是彰顯運動主體性的關鍵；倘若運動只能被動地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那將意味著自我詮釋與自我發聲管道的消失。

最近的文獻則是郭良文的研究，該文透過「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的概念，分析反核廢運動中的另類媒體如何進行自主發聲的過程。研究採用訪談資料與媒體內容的比較論述，企圖瞭解反核廢運動領袖如何運用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的策略。研究發現，從報刊、影像紀錄、與廣播電台等傳播媒體，示威抗爭活動的中介與大眾媒體的報導，到傳統歌謠、文學詩詞與藝術品創作等，都是建構反抗文化、散播思想的另類發聲工具（郭良文，2010）。不同於前述文獻，本文則是針對網路作為另類媒體的動員與反抗潛能。

綜合黃彩惠（1990）、張桓凱（1997）、王嵩音（1998），以及郭良文（2010）的論文，可以發現文章的主要重點在於分析1987年至1995年的反核廢抗爭運動，對於2011年之後所出現的反核廢運動則是本文可以討論的面向。從1987年至2012年，長達25年的反核廢歷程，這中間，不僅有許多達悟青年曾前往台灣接受資訊教育，蘭嶼當地的資訊基礎建設也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推動「村村有寬頻、部落有寬頻」的計畫下逐漸完備。滿足資訊教育與基礎建設等客觀因素後，新一代的反核廢運動在全球經歷日本福島核災的震撼後，正逐漸醞釀，並且以網路動員

的新面貌出現。據此，本文試圖從新傳播科技的方向進行思考，透過比較分析兩代蘭嶼反核廢運動在網路動員與構成社會資本的差異，藉以瞭解網際網路與原住民社會運動之間，將交織出哪些面向的改變。



第二章、社會資本、網際網路與原住民

社會資本是促進社會合作的共同價值觀，它能使個人凝聚成團體，共同保護認同的事物與價值，進而組織眾人支援集體的需求；因此，社會資本扮演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的基礎（Fukuyama, 1999）。對於成功的社會運動而言，社會資本將決定反抗運動能否凝聚更多具有相同共識的人群，藉以爭取權利，影響公共政策。對此，網際網路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在於能擴大既有的社會網絡，使得分享相同價值的公民與團體能夠彼此串連，凝聚更高的影響力（Lin, 2001; Howard, 2010）。據此，在本文的脈絡下，處於社會弱勢的達悟族人將可以串連全球與地方社群的力量，並進一步建構自主發聲的平台。在以下文章中，第一節將先介紹社會資本的起源與概念，並且整理組成社會資本的三大構面；第二節整理網路際網路的特性，分且分析網路對於社會資本所造成的轉變；第三節則是整理網際網路與原住民運動的文獻，藉以幫助本文後續所進行的分析。

第一節、社會資本的起源與定義

社會資本在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的領域中皆被廣泛引用，然而，學門的差異造成社會資本在定義、生成機制與效用（utility），皆有不同面向的解釋。在多方詮釋的情況下，將可能導致研究的失焦。有鑑於此，本文將回溯創始社會資本理論的Robert Putnam、James Coleman以及Pierre Bourdieu三位學者的立論，進一步整理本文所採用的三項構面。

壹、Putnam: 公民參與及社會信任

Putnam在發展社會資本理論時，是以Hanifan於1916年對於社區教育中心的研究為基礎，Hanifan（1916）發現，當個體處於孤立時，會顯現出無助的狀態。然而，當個體與鄰居進行互動時，會累積彼此的社會資本，同時能立即滿足其社會需求（social need），並改善社區整體的生活狀況。在Hanifan的討論中，已經涉及Putnam社會資本的核心概念：經由人際互動關係所形塑與累積的資產（asset），並利用資產來達成集體行動的實踐。

Putnam在《讓民主動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的書中，檢視義大利於1970年代新成立的20座地方行政區。該研究發現，有些行政區的運作並不順利，但有些卻建立起成功的參與體系（*participatory program*），進而促進社區的經濟發展。Putnam利用量化研究方法進行調查，在控制其他變項後，發現評估政府效能的最佳指標是社區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的傳統；此後，Putnam開始以公民參與做為測量社會資本的重要指標（Putnam, Leonardi, & Nanetti, 1993）。Putnam認為，在擁有良好公民參與的社區文化中，其貧窮、犯罪與失業率等都有較好的表現（Putnam, 1995）。

Putnam檢視義大利的地方行政區後，開始以「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分析美國的社會現況。在其成名作《一個人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的研究中，Putnam舉美國民眾最常從事的保齡球運動為例，說明該國的社會資本正在下滑。在該研究中，Putnam分析美國官方的社會調查數據（*General Social Survey*）發現：從1960年到1980年這段期間，全國打保齡球的人口上升了10%，然而，組隊打保齡球的人數卻下滑，此外，保齡球社團也下降了40%。透過打保齡球的變化，Putnam試圖勾勒出社會結構的變化：當社會資本下降，社群便會開始失序，並減少公民參與公眾事務的時間，甚至對社群內的成員產生不信任（Putnam, 1995）。

在1995年的研究中，Putnam認為組成社會資本的兩大要素正面臨重大的威脅。首先是家庭，家庭是社會資本最基本的形式，但許多數據卻指出家庭內的連繫（*bond*）正逐漸地崩解，形成「去社會資本化（*social decapitalization*）」。此外，鄰里關係也正面臨劇烈轉變，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數據指出，民眾在一年內跟鄰居互動的次數從1974年的72%，一直到1993年只剩61%，不到20年內就下滑11%。這種來自家庭與鄰里關係的轉變，已經嚴重影響信任（*trust*）與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等社會資本的兩大指標（Putnam, 1995）。

雖然透過許多官方的統計數據可以發現美國的社會資本正在下滑，然而，究竟是哪些因素所造成？Putnam統整出三大面向：首先是女性進入職場。從1960

年代的民權運動之後，美國婦女的自主意識抬頭，進而影響女性從無給職的家務勞動，走向追求報酬的就業市場。Putnam認為，此種女性走入職場的趨勢，降低建構家庭社會資本的時間與精力，並且實質反映在許多以女性為主的公民團體的數量下滑（Putnam, 1995）。然而，Putnam在論證女性進入職場並導致社會資本下滑的過程，陷入女性等於家庭照顧者的刻板性別分工；亦即，當女性能自主就業時，卻被視為是導致家庭社會資本衰落的因素，此種論調實忽略男性在維繫家庭社會資本的角色。

除女性進入職場外，流動性（mobility）也是造成美國社會資本下滑的主因。從組織傳播的研究可以發現，融入組織的關鍵在於居住與職場的穩定性（stability）。流動性會切斷在地連結，而個體在被切斷原有的連結後，必須再花費時間與精力去發展新的連結，社會資本因而會下滑。Putnam認為，經常性切斷在地連結並發展新連結的過程，將會傷害到該社區或是國家的社會資本。例如：經常移動者將比較不願意去投票、參加社團或教會，原因是當個體預期會再度進行遷移時，會比較不願意花費時間參與互動與社交活動（Putnam, 1995）。

最後則是科技對於人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響，Putnam認為科技介入會造成人們休閒時間的私有化（privatizing）與個人化（individualizing）。在這兩種科技所影響的趨勢中，取代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造成社會資本的衰退。Putnam討論科技時是從時間取代論（time displacement）的觀點：也就是當人們花費越多時間看電視時，自然會減少或壓縮與他人互動的時間（Putnam, 1995）。然而，Putnam對於科技所討論的對象是屬於單向接收的電視媒介，此種對於電視媒介的看法是否仍適用於強調「連結性」（connectivity）與「互動性」（interactivity）的網路媒介？仍需要更多的文獻與實證數據去證實。本文將於後續的章節中繼續探討科技對於社會資本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從義大利地方政府研究到《一個人打保齡球》，Putnam逐漸確認他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範疇。他定義社會資本是：「可以有效促進協調與合作，藉以達成共同利益的社會組織，例如人際網絡、規範及社會信任等。」（Putnam, 1995）。

隨著Putnam的論述開始成熟並且受到關注，其討論的架構也面臨許多輿論的挑戰與質疑。

美國社會學家Portes從許多不同面向質疑Putnam的理論架構：在因果關係的部分，Putnam將社會資本視為為社區與國家的特質，它同時扮演著因（cause）與果（effect）的角色。某城市因為擁有社會資本，所以帶來正向的結果（高經濟發展、低犯罪率）；反之，表現較差的城市則是因為較缺乏社會資本。Portes批評，Putnam犯了同義反覆（tautology）的錯誤。首先從社會資本的效果開始（成功 vs.不成功的城市），接著以回溯的方式去找出何種因素造成此結果。此種回溯的方法僅是暫時性，並無法排除潛在的變項。第二點則是Putnam運用太多指標來涵蓋社會資本，讓人質疑其內在效度。難道閱報率、團體參與率以及信任程度都能共同指涉到社會資本？最後，學者也會質疑觀察指標的適用性，Putnam在義大利的研究中，相關的因素（經濟發展、教育、政治偏好）都被質疑是不恰當的觀察指標（Portes, 1998; Portes & Landolt, 1996）。

針對上述批評，Putnam在2000年出版的書中，開始修正社會資本的鉅觀效果，轉而將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個人層面。從個人的角度切入，社會資本可以使個體獲得所屬網絡內的資源，包括有用的訊息、人際關係以及情感上的支持。Putnam引用Mark Granovetter強連結（strong ties）與弱連結（weak ties）的概念來說明社會資本在影響個人層面的兩個不同角度：（1）跨越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2）凝聚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跨越型社會資本也就是弱連結，個體可以透過此類的資本，連結異質性的網絡成員，因而能獲得有用的資訊或新的想法，但由於彼此間的連結較為寬鬆，因此無法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凝聚型社會資本則是指與家人或是親密朋友之間的強連結，能夠獲得情感上的支持，但由於網絡同質性高，因此較無法獲得新的資訊（Putnam, 2000）。

總結Putnam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其核心仍然放在社會資本中的信任與公民參與將如何影響社群的經濟與政治表現。不可否認的，Putnam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仍為目前學術圈的主流，吸引許多後繼學者發展量表來進行測量。然而，從

Putnam的論述架構中，卻也相對模糊社會階級（social class）對於取得資本能力的差異（Portes, 1998）。推敲原因可能為Putnam是政治學出身的學者，因此對於種族、階級與性別的差異並未投注更多的心力關注。因此，以下的文章中將繼續介紹社會學背景的Coleman，希望能進一步整理出社會資本的不同面向。

貳、Coleman: 社會網絡鑲嵌的資源

James Coleman是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的老師是社會學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functionism）的R. K. Merton。因此，Coleman的學術思維大致是承襲Merton對於社會結構的討論而來。結構功能論視社會為一整個體系，而體系中的組成單位都是彼此相互關聯的狀態（蔡文輝，2000）。因此，不同體系的單位之間會各司其職，並各取所需，以維持整個體系的平衡狀態。

從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來看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Coleman認為，過去學者在討論社會行動時，多會從經濟學與社會學對立的觀點去進行分析：社會學者認為行動者經過社會化後，一切的行動皆會受到社會規範與義務所制約（Granovetter, 1985）。經濟學者則視社會行動是以個人利益為中心，行動者會獨立完成自我設定的目標。針對此種對立的看法，Coleman發展出「理性行動理論」（rational action theory），他認可行動者可以藉自由意志進行理性行動，但在行動的過程中，卻會受到可用資源及社會脈絡的影響。而社會資本，即可決定個別行動者對於可用資源的接近性（Coleman, 1988）。

Coleman（1990）指出，社會資本是組成社會結構的特定面向，行動者可以利用社會資本滿足自身的利益。特別的是，社會資本並不存在於行動者本身，也不具有實體的形式，而是鑲嵌於行動者間的網絡關係之中。另外，社會資本是由它的功能所界定：首先，社會資本具有效益，它能達成特定的目標。此外，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將可以促進特定的行動。在此，Coleman透過實際的例子來說明社會資本所可能展現的形式。

首先是位於紐約的南非社群鑽石商，這些鑽石商會在沒有任何保險機制的情況下，先將價值數萬或數百萬美元的鑽石交由買家檢查，再進一步來協調價錢。

此種先將鑽石交給買家的做法有著高度風險，因為賣家必須承受買家可能將鑽石掉包，或是竊取的危險。Coleman進一步分析南非的鑽石商社群後發現，該社群的連結非常緊密、經常互動、並且具有種族甚至是家族的連帶關係。此外，鑽石商之間會彼此通婚，並一起居住在共同的社區（Coleman, 1988）。此種家族、社區或宗教的連帶，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並且使事前檢查的機制可以成功運作。假如有鑽石商欺騙或掉包鑽石，他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失去家族或宗教的認同。因此，在此種社會結構下，即展現出特定形式的社會資本，而南非社群的鑽石商藉以獲得快速與有效率的交易方式（Coleman, 1988）。

當社會行動者擁有特定社會結構的資源，並且該資源可以幫助行動者獲取其所需的利益時，就可以被理結為社會資本；此外，不同社會結構可能展現出完全不同形式的社會資本（forms of social capital）。對此，Coleman舉出五種可能的社會資本形式：

1. 義務、期待與信任關係：如果 A 幫忙 B，並且信任 B 在未來會有所回饋。那麼對 A 來講就有期待，對 B 來講就有義務，A 因而能累積「信用券（credit slip）」。信用券會不斷累積，進而形成 A 所擁有的資本，就如同財富一樣，當個體需要的時候就可以進行運用。此外，在一個組織中，A、B 成員可能不斷累積所擁有的信用券，並進一步形成彼此的信任關係。
2. 資訊通道（information channel）：資訊通道也是社會資本的形式之一，因為資訊是提供個體行動的基礎。例如：婦女透過朋友獲得流行服飾的資訊；不看報紙的行動者透過朋友得知社會新聞的狀況；社會科學家透過與同儕的互動來獲得最新的研究資訊等。這些社會關係都成為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因此也成為社會資本的形式之一。
3. 規範與制裁（norms and effective sanctions）：社區內的規範可以抑制犯罪與脫序行為，進而提升社區安全。另外，規範也會鼓勵個體犧牲個人利益來促進集體利益。然而，雖然規範帶來的正面效果十分顯著，但其

隱含的負面效果卻有可能抑制行動者的創新發展。

4. 社會網絡的封閉性 (closure of social networks)：社會規範的功能在於制約負面的外部效果，並且提升行動者所可能產生的正面效果。而形成社會規範的關鍵在於封閉性。〈圖 2-1〉代表網絡的封閉性，行動者 A，可對 B 與 C 產生影響。但是在圖 (a) 部分，因為 B 有 D 朋友，而 C 有 E 朋友，進而可以抵銷 A 對於 B、C 的影響力。在圖 (b) 裡面，ABC 之間是交錯影響。因此，封閉式社會結構中，A、B、C 之間的懲罰與規範是非常顯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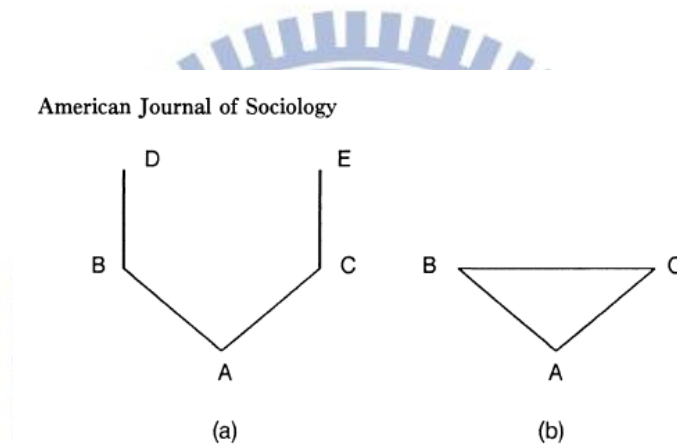


FIG. 1.—Network without (a) and with (b) closure

圖2-1 開放與封閉性社會網絡

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不只有利於進行投資 (invest) 的行動者，也連帶使整體社會結構下的行動者都能雨露均霑，當行動者之間能創造出一種以上的社會資本時，便能夠增加整體社會的運作效能。Coleman在討論社會資本時相對樂觀，然而，Portes (1998) 卻針對Coleman的立論提出下列幾點批評：首先，把資源 (resources) 與在社會結構中取得資源的能力 (ability) 分開討論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個體會處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中，假如A學生可以從他親戚那獲得就學補助，就聲稱A學生擁有社會資本；而B沒有是因為她沒有得到就學補助。此種聲稱忽略B的親戚 (社會網絡) 也許有同樣的意願或更有意願想幫助她，但卻缺乏實際的資源。因此，定義社會資本時必須能區分網絡與資源之間的差異。

再來針對資源本身的討論，Coleman認為社會資本要從它的功能去進行界定。此種對於社會資本的認定方式可能過於廣泛，究竟是那些資源？資源的品質為何？都沒有更細緻的討論。定義模糊的結果將造成辨別社會資本的困難，似乎是任何對個體有益的資源都可以被稱為社會資本(Portes, 1998; Portes & Landolt, 1996)。此外，Coleman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多傾向將社會資本認定是社會結構所帶來的正向效果。然而，這種樂觀的論調卻忽略社會資本所可能造成的負面效應。Putnam (1995) 即提到，過於緊密連結的政治與經濟組織，容易產生效率低落以及藉由操控政治來獲取利潤的尋租 (rent seeking) 現象。另外，Portes (1998) 也認為，社會資本值得關注的地方應在於其所帶來的負面結果，例如排除外來者與壓抑個人自由等。從Coleman所提出來的「封閉式網絡」為例，此種封閉的網絡即可能會形成高度的規範而壓迫到個體的創意與自由。

在組織特質的面向上，Coleman的討論多聚焦在企業與政黨等偏向目的性與利益導向的組織 (organization)。然而，許多行動者間的規範並非如組織般強而有力，反而是呈現非正式的社交網絡。此種弱化的網絡關係將造成運用Coleman概念的不足。Howard (2010) 提出社群 (community) 和網絡 (network) 的差異：他認為社群的結構相對完整，並且擁有共同的規範與儀式，因此成員可以擔負較為複雜的任務；相反地，社會網絡屬於個體對個體的關係，加上它的社會關係又相對薄弱，因而不適合處理合作與共同行動。有鑑於此，Coleman的分析架構相對不適合運用在結構鬆散與非正式的社會網絡。

最後，即使Coleman在論述中已經稍微碰觸到各個家庭在不同資本的差異。然而，這些差異卻未從階級與種族的面向去進行分析，使得我們無法瞭解不同家庭背後所代表的社會脈絡與階級意義 (Loury, 1977)。因此，本文於以下將整理Bourdieu對於經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討論，試圖釐清資本轉換的邏輯以及不同型式的資本所代表的社會意義。

參、Bourdieu: 再製不平等關係

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1986)對於資本的討論是立基於社會、象徵(symbolic)與文化資本，直指不同資本可以相互累積、投資以及轉換。Bourdieu強調，非經濟(noneconomic)資本隱含了權力關係與物質不平等的再製(reproduction)。不同的社會階級在先天上就擁有不同的資本類型，例如企業家的後代即較工人的子女擁有更多的經濟資本，他們可立基於經濟資本，進一步轉化為其他類型的非經濟資本。此外，Bourdieu(1984)認為，個體會因為出身背景、家庭經濟狀況，以及學習歷程的差異，逐漸形成特定的習癖(habitus)；因此，習癖代表的是不同階級背後的資本型態，再進一步內化為個體的舉止、儀態與偏好。此種經由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所結構(structure)的習癖，會影響諸多的社會行動。

習癖將會影響個體之間的互動情況：來自相同社會階級的行動者會因為相似的習癖而產生互相認同的效果，進而分享共同的價值、知識、與資本(Bourdieu, 1984)。在《秀異》(Distinction)一書中，Bourdieu指出，我們常覺得品味是個體與生俱來的傾向，例如聲稱某些個體天生就對於美的事物、對於藝術，就擁有異於常人的稟賦。但這種將人類品味歸於與生俱來的論述，其實忽略個體的社會階級對於他們品味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諸如對藝術、運動、烹飪與居家擺設等偏好，都有其背後的文化軌跡可循(Bourdieu, 1984)。

然而，習癖的差異如何形成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則要透過場域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行說明：社會空間是由許多不同的場域所組成，各個不同場域之間呈現彼此相斥／相吸的動態關係。不同場域的行動者，彼此也藉由不同的資本來進行互動與競爭。場域中的統治階級(dominant class)擅長運用區判性，藉以合法化其優勢權力。他們不但將其對社會的觀點強加在所有人身上，並且透過教育去合法化這些觀點(Bourdieu, 1984)。當合法文化被確立後，統治階級就可以施行所謂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Bourdieu與Passeron指出，象徵暴力發生在教育行動中，透過教育，統治階級的文化與偏好變得具有正當性，就如同社會中「客觀存在」的價值。透過教育

行動、教育代理人（老師、家長），統治階級的文化被「誤解」為主流文化價值，因此鮮少遭受其他階級的質疑（轉引自：Lin, 2001）。另外，統治階級為維持其優勢，還會進一步貶低或剝削其他階級的文化。例如普羅階級所喜好的音樂與烹飪，即可能被視為是「不入流」與「低俗」的文化。而這種區判效果，就會限制不同社會階級在進行階級流動的可能性。

在Bourdieu的論述體系中，「資本」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根據資本所具備之投資、累積、移轉、轉換的特性，Bourdieu發展出下列四種資本的形式：

1. 經濟資本：由不同的生產要素（土地、工廠、設備）及經濟財貨（現金、珠寶、有價證券）所組成。
2. 文化資本：泛指從家庭及學校教育中習得而來的知識。文化資本可以從三個面向展現：第一，內化於個體的儀態、品味與偏好；第二，以客觀的形式展現，例如名畫或是古董。第三，得到學校制度性的認可，例如學歷、證照。文化資本是階級之間進行社會區判的重要場域。
3. 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所有牽涉到名聲與認可的社會規範，它體現於個體擁有總體資本所帶來的權威感

除上述三種資本外，還有以人際網絡為基礎的社會資本：Bourdieu與Wacquant（1992）定義社會資本是一種「實際與潛在資源的總合，此種資源來自於長期而穩定的網絡關係。」除了定義之外，Bourdieu進一步討論社會資本的兩項評估標準：1.人際網絡的大小 2.網絡成員所有擁有的資本數量（包括經濟與文化資本）。Bourdieu認為，透過社會資本，行動者能獲得許多正面的效益，例如較高的家庭收入、較快獲得升遷機會，以及較好的心理與生理健康。Bourdieu在處理社會資本時，從工具性的角度去關注行動者藉由參與團體所獲得的利益，並且有目的（purposely）地為了取得資源而參與社交活動。例如小資階級（petit

bourgeois) 為了達到向上流動的目的，會致力參加許多統治階級喜好的活動，例如小職員爭取陪主管打高爾夫球即是明顯的例子 (Bourdieu, 1984)。

引述Bourdieu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時，理應回到原作者對於場域 (field) 與非經濟資本的討論去進行脈絡性的理解。然而，綜觀目前引用Bourdieu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術論文，大多未回到Bourdieu的論述脈絡，即透過二手文獻的理解方式，任意引用Bourdieu與Wacquant於1992年出版書中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 (Ellison, 2008; Valenzuela et al., 2009)。此種去脈絡式的挪用方式，將可能造成對Bourdieu理論的誤讀。

回到場域與階級抗爭 (class struggle) 的概念來詮釋社會資本：統治階級會視社會資本為鞏固合法性與領導地位的工具。例如，中古世紀的貴族會透過通婚的方式來壯大家族聲勢，並維持彼此的優勢地位。此外，對中產階級 (middle class) 而言，社會資本是向上晉身的工具：中產階級會積極參與品酒會、高爾夫聯誼會或是獅子會等，其目的多是希望藉此達到社會階層的流動。最後，對於普羅階級 (popular class) 而言，由於社會網絡受限於身處相似環境的成員，再加上網絡內的諸多資本量也相當低落。因此，對於普羅階級而言，個體鮮少擁有社會資本，因而相當難以擺脫在底層循環的命運 (Bourdieu, 1984)。

Bourdieu的立論大多以統治 (dominant)、中產 (middle) 與普羅 (popular) 階級之間的衝突與對立關係去進行辯證。此種分析角度相當於符合本研究的方向：亦即，原住民作為社會弱勢者 (minority) 的角色，將如何透過網路科技去進行社會動員，進而凝聚社會資本。然而，Bourdieu分析的場域是在階級相當分明的法國，此種以階級的分類法並不一定適於本研究探討的「族群」差異。此外，社會資本並不是Bourdieu主要的研究旨趣，所以Bourdieu本身並未實際建構研究方法來瞭解社會資本。這種方法學的遺漏，也形成後續研究者在應用Bourdieu社會資本概念的困難。

肆、網絡、規範、資源

總結Robert Putnam、James Coleman以及Pierre Bourdieu三位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討論，本文將社會資本分成以下三項構面：網絡（network）、規範（norm）、資源（resource）。

首先，社會網絡是行動者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係。Coleman（1988）認為行動者本身並無法構成網絡，社會資本是鑲嵌於行動者間的網絡關係之中。

Bourdieu與Wacquant（1992）則是在定義中，指稱社會資本是源自於長期而穩定的網絡關係。由此可知，僅有個體並不足以構成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基於人際之間所構成的社會網絡。既為網絡，則可以依據不同的連結類型進行區分：緊密的、寬鬆的、家族連帶的、網路中介的，不一而足。據此，本文將採取Putnam對於跨越型與凝聚型社會資本的觀點，分別指涉寬鬆與緊密連結的社會網絡。

Putnam認為寬鬆的社會網絡將有助於獲取新的資訊，但因為異質性較高，所以相對缺乏情感與經濟上的支持；相反的，緊密連結的社會網絡則能提供情感與經濟上的支持，但因為同質性太高，所以相對缺乏外部的資源與訊息（Putnam, 2000）。

第二，規範是指社會網絡內所蘊含的信任、互惠關係與強制性的道德約束。Coleman曾以「信用券」的概念來說明社會網絡內經由彼此幫助所形塑的互惠關係，如同實體的資本，信用券可以進行投資、累積與挪用，當團體內所形塑的互惠規範越高，將越能幫助行動者近用其所需要的資源。Putnam也曾以組織內的信任（trust）與互惠關係來描述社會資本，許多挪用Putnam概念體系的量化實證研究中，信任甚至是測量社會資本的變項。由此可知，網絡構成社會資本的結構，而結構內所鑲嵌的信任、互惠與道德約束，則是決定個體能否近用資源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當社會網絡內的規範太高時，將可能排擠網絡外的個體，並且壓抑網絡內成員的自主性（Coleman, 1990）。Boissevain（1974）的研究即指出，高密度且相互重疊的網絡，雖能將居民串連起來，並且建立強制的規範，但如此卻會犧牲個體的隱私與自主性。

第三，資源是指社會網絡內所鑲嵌的物質、文化與人力資源。Bourdieu(1986)認為物質資源指的是土地、設備、現金、有價證券等經濟財貨。文化資源是指從家庭及學校教育中習得而來的知識。人力資源則是在社會運動中，願意以實際行動進行支持的民眾。值得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的社會網絡都鑲嵌相同的資源，Portes(1998)以黑人族裔為例，指出黑人父母親會將貧窮轉移給子女的原因是(1)較缺乏物質資源與教育機會(2)年輕黑人勞工對於勞動市場較弱的人脈(connections)，並且缺乏關於工作機會的資訊。據此，社會資本是動態的競逐關係，在不同的時空脈絡與社會結構的影響下，都可能會鑲嵌不同程度與不同型態的資源。以蘭嶼為例，囿於物質資源的缺乏以及漢化教育系統的衝突，將可能限制達悟族人在凝聚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的能力。因此，資源的多寡牽涉到不同社會結構之間的影响，並且形成動態且相互競逐的情況。

第二節、社會資本與網路傳播科技

Putnam在討論社會資本衰退的原因時，將矛頭指向電視，認為電視的私有化及娛樂化特質將會取代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時間，造成社會資本的衰退(Putnam, 1995)。然而，Putnam討論傳播科技的影響時，將關注焦點放在電視媒介。這種立論在90年代的時空脈絡中尚屬合理，因為當時的電視仍然是主流的傳播媒介。這種以電視為主的媒體使用習慣在網路快速興起後，正產生巨大的轉變。根據普優研究機構2011年的調查報告指出，在18-29歲的媒介使用族群中，網路已經取代電視成為大眾獲得新聞的主要來源：2010年有65%的年輕人是透過網路獲得新聞，相對只有52%的年輕人是透過電視獲得新聞資訊(Pew research, 2011)。另外，學者Watkins(2010)也指出，電視雖然是年輕人最常使用的三大媒介之一，但影響力已經明顯下滑，以上網時數來分析，年輕人每周平均上網21小時，明顯高於看電視的14小時。因此，從最新的統計數字來檢視Putnam的論述，電視顯然已經不是造成社會資本衰退的主因。

在新傳播科技不斷更迭的情況下，Lin（2001）對於網路的快速發展提出一項疑問：網際網路是否蘊含著社會資本？他認為，假使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我們便得到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據去推翻社會資本衰退的主張，或者可以說衰退的趨勢將被網路所遏阻。Lin賦予網路高度期待：因為網路的連結特質，讓使用者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而與他人進行聯繫。Lin進一步指出，透過網路科技，行動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創造更多的網路與社會資本（Lin, 2001）。這種對於社會網路的樂觀主張，隨著網路的基礎建設逐漸完備而受到重視，知名社會學者Manual Castell也表示，全球已經逐漸進入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的時代（Castell, 1996）。Howard（2004）也指出，傳播科技已經鑲嵌在個體的日常生活當中，作為個體瞭解世界以及與他人互動的媒介。因此，隨著傳播科技的演變，個體的娛樂正從個體連向網路，而這種從電視朝向網路的轉變，也象徵閱聽人與媒介的關係已經由單向轉變為多向與網絡化的傳播型態。

在以下章節，本文將分別整理網路傳播科技在時間／空間壓縮、去疆域化與網絡化連結等三項特質，藉以說明為何網路傳播科技能改變凝聚社會資本的方式。

壹、時間／空間壓縮

在討論新傳播科技所帶來的影響時，最廣為討論的是時間／空間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概念。知名馬克思主義學者David Harvey在《後現代性的條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曾提到：

時間／空間壓縮是一種過程，這種過程對於空間及時間的客觀性質造成革命性的影響，因此，我們不得不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我用「壓縮」這個詞彙，原因在於：在描述資本主義的歷史時，其中一項特徵就是生活步調的加快，在撤除了空間方面的障礙後，世界彷彿朝我們這個方向擠壓過來（Harvey, 1989: 240 轉引自Barney, 2004）。

從Harvey的討論中，是從運輸工具的革命來增強時間與空間壓縮的看法，若將Harvey的觀點運用在新傳播科技與網路時，時間／空間的壓縮過程將變得更加劇烈。Barney（2004）指出，我們已經很習慣聽到「世界變小了」這種說法，探討此說法的原因在於網路能以極快的速度，將大量的資訊傳送到很遠的距離外。對於社會資本而言，伴隨著社會、經濟和政治網路在網路空間形成，其凝聚與串連的過程將不再受到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因而開啟了全球連結的可能。學者Lin以法輪功在大陸受到壓迫為例，指出法輪功透過網路在全球各地之間串聯，促使在地的宗教組織，逐漸轉型為去時間與空間的全球連結（Lin, 2001）。

然而，透過傳播科技所產生的時間／空間壓縮，並非全帶來正面的結果。黃厚銘（2009）表示，在即時性電子媒介所主導的時代，新傳播科技的即時性（real time）正逐漸壓縮真實空間（real space），並促成全球化趨勢，如此將擴大風險的規模，也可能危害人類的本質。亦即，透過傳播媒介所產生的連結，可能擴大風險所產生的危害範圍。

循此，本文將視野放回蘭嶼，思考網路進入蘭嶼社會之後，將如何壓縮居民原本對於時間與空間所建構的關係？特別是在空間上，孤懸於台灣東南方40海浬的物理距離幾乎不構成影響蘭嶼與台灣本島在網路溝通的阻礙。此時，蘭嶼原住民將如何透過壓縮的空間去近用本島的資源；抑或，在壓縮的距離下將被吸納至台灣主流的社會體系中，進而失去蘭嶼原有的空間與部落意識。在此，本文將更於以下更細緻討論「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概念。

貳、去疆域化

去疆域化是延續時間／空間壓縮的討論架構而來，基本觀點是認為：當時間與空間被壓縮之後，原本因為地理或民族所建立起的疆域範圍將會被打破，形成全球一體的狀態。Barney（2004）認為，網路具有去疆域化的本質，雖然在網路出現之前，電話、電報、廣播都有此種跨越疆域的特質；然而，電報與電話卻無法像網路可以提供大量與即時的訊息傳遞。因此，在網路基礎建設逐漸成熟、家

戶連網比率顯著提升的情況下，可預見的是透過電腦所中介的傳播行為將逐漸成為現代生活的風貌。Lievrouw及Livingstone也指出，透過網際網路進行互動的兩個人，不論是位於地球的兩端或身處一棟建築中，皆不構成影響。這種情形造成一種無空間的鄰近性質。在非同步的電腦中介傳播中，個人可以依自己的時間接收並回應訊息，此特性將有助於拓展人際接觸的潛力（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6）。

雖然在網路空間中，新傳播科技將重構地理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而距離也將不再扮演決定性的要素。但這並不代表實體空間不重要，物理距離仍在人際互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如同Castell認為網路有其透過網絡與節點所組成的「流量空間」，此種流量空間是一種新形式的空間，也是資訊時代的特徵。然而，流量空間並不代表「無地點」，它僅是將實體「距離」重新定義，而不是將地理抹除（Castell, 1996）。再次重視實體空間的原因在於，本體論的層次上，人類仍然唯實存在於物理空間中，社會結構、脈絡與情境都會拉扯人們在網路空間的行動。因此，雖然去疆域化的網路特質似乎可以將行動者拉進無所限制的網路世界中，但現實的情況是實際的社會空間仍然扮演拉扯的一端，形成相互糾葛的狀態。

Barney（2004）以「數位落差」為例，解釋網路基礎建設在富裕與貧窮國家間仍有相當大的鴻溝。對於能上網的行動者而言，網路可以帶來通訊方面的去疆域化；然而，對於無法連網的個體來說，卻仍受限於地理或經濟的區隔，再度形成線上與線下之間的另類疆域。此長彼消的情況下，將擴大富國／窮國、優勢／弱勢之間的落差。從全球來看，白人和亞洲黃種人，比起黑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相對有較高機會接觸資訊科技（轉引自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1）。此外，檢視台灣研考會於2011年所發表的〈個人家戶社會機會調查報告〉也能發現：非原住民鄉鎮的家戶擁有電腦比例為87.7%，對比山地原住民鄉鎮的電腦擁有率僅有69.9%。由此可知，不論是擁有電腦的比例、連網的能力、以及使用電腦的技能等，許多實存的社會結構仍扮演相當程度拉扯的角色。

參、網絡化連結

網路傳播科技的另外一項主要特徵在於能夠串聯使用者之間的聯繫。Castell (1996) 曾以網絡 (network) 的概念來描繪現代社會的特徵。他說，網絡主要由三項元素所組成：節點 (node)、紐帶 (ties) 與流量 (flow)。「節點」是網路上的使用者，他可與其它使用者進行聯繫；節點與節點之間的聯繫則為「紐帶」。「流量」則是在節點之間，藉由紐帶所傳輸的內容。而由節點、紐帶和流量所共同組成的結構即可被稱為是網絡。Barney (2004) 提出評估網絡社會的兩項特徵：第一，社會擁有成熟的網絡通訊科技；第二，網絡是作為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社會結構。當社會擁有上述兩項必備的條件時，即是邁入網絡社會的時代。

Jones (1999) 認為，電腦通訊不只是工具，它還可以作為社會關係的科技。換句話說，網路傳播建構個體之間的社會關係，並且使該種關係能以網絡化的結構存在於網路與現實的空間中。臉書 (Facebook) 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 也提出相似的看法，他表示，在臉書中，我們建立工具幫助人們聯繫彼此，並且讓個體傳遞想要分享的訊息。因此，臉書加強人們建立與維繫人際關係的能力，並且發展出更緊密與更多元的人際網絡 (Zuckerberg, 2011)。Zuckerberg 以臉書為例，說明該公司在2011年於全球擁有8.45億的註冊用戶，並且用戶與用戶之間已經形塑近一兆的社會關係 (connection)。此種高度交織的網絡結構，說明網絡社會已經是進行式而非未來式。〈圖2-3〉是臉書全球用戶的連結情況，點與點之間各有白色細線作為代表，每個區塊越亮表示聯繫越密集。



圖2-3 臉書全球用戶的連結情況

當網路社會來臨之後，促使我們思考的是網路科技對於社群（community）的影響。如先前所討論，部分學者對於電視媒介是抱持悲觀的看法，認為電視的私有化與娛樂化本質，將會使社群分崩離析，甚至造成社會資本的衰退（Putnam, 1995）。然而，過去對於媒介單向傳播的預設在邁進雙向與網絡化的新科技時代時，勢必將重新調整。部分學者認為網路科技的普及，其互動性的特質將為社群重拾活力與並帶來重新凝聚的願景。互動性（interactivity）對於新傳播科技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概念：不同於電視是人與機器的互動；相反地，網路允許個體與個體之間進行社交互動（Barney, 2004）。網路空間是多重指涉的概念，不只涉及人與機器，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動者可以藉由非同步的e-mail或同步的即時通訊、視訊進行傳播。循此，網路與實體空間將會彼此交織，而社交互動也會在不同的空間中發生。

針對社群的概念，杜威（John Dewey）曾經指出，人之所以形成社會，並非因為實體生活的鄰近距離。個體就算居住於遠離人群的地方，但一本書或一封信，就可以為人與人之間帶來更親近的聯繫。這種親近，可能更勝於住在同一個屋簷下（Dewey, 1964 轉引自Barney, 2004）。從杜威對於社群的解釋可以發現，地理的鄰近並不是構成社群的主要因素，當人與人之間因為網路科技而產生聯繫時，挪用杜威對於社群的解釋，我們即可以預期網路將更能有效地維繫社群的延續。Bakshy等學者（2012）以臉書為例，說明社群網站之中將包含兩種連結：第一種是屬於親密朋友或家人的強連結（strong ties）；第二是屬於點頭之交的弱連結（weak ties）。因此，當每個人的臉書帳號都包含各種的連結形式時，社群即可以在此種互動方式下產生與延續。〈圖2-4〉的最內圈代表每一位使用者，各個使用者以自己為中心去建構社會網絡。越靠近使用者的內圈為強連結，強連結之間的互動相對頻繁。強連結之外是屬於弱連結，若連結之間的互動較不頻繁。在網路空間中，強與弱連結之間都是透過電腦進行中介傳播（Bakshy, 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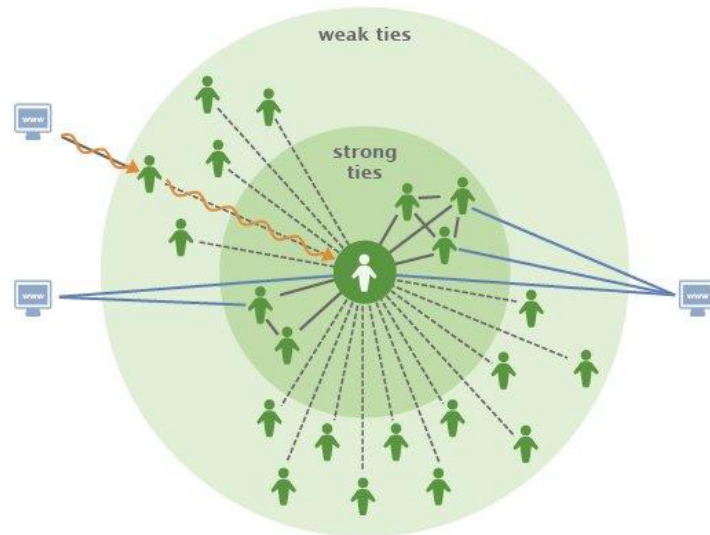


圖2-4 社群網站的強連結與弱連結

針對網路空間所發展出來的人際網絡型態，Hampton等學者在2009年針對新科技與社會疏離（social isolation）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研究結果指出：使用新傳播科技（例如網路、手機）並不會造成人際疏離；相反地，網路與手機的使用者比起非使用者擁有更廣且更具異質性的社會網絡（Hampton, et al., 2009）。Hampton的研究結果相當程度呼應Wellman的觀點，他認為網路在面對面及電話的互動方式外，提供了另一種可選擇的傳播管道，因此網路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社會資本，而是補充了社會資本（Wellman, et al., 2001）。此外，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社群的概念逐漸由地理連帶中解放，人們互動的對象不再限於附近的鄰居，網絡成員之間的連結可以跨越空間的限制，電腦中介傳播（CMC）提供另一種傳播型式來解決面對面溝通（face-to-face）及「講電話」（phone）的不足，如此將能有效幫助使用者維持原本的社會聯繫與社會支持（Hampton, et al., 2009; Wellman, et al., 2001）。

承續網路連結特性的討論，Wellman提出：社群不必然受到地理位置的束縛，成員之間的連繫才是構成社群的核心。一個成功運作的社群應包含散置在各個空間中的節點，以及依據節點形塑強弱不一的人際紐帶（Wellman, et al., 2001）。如果以此種觀點來檢視網路社群，可以發現網路將會是構成社群的完美工具（Barney, 2004）。Wellman提出「網絡化的個人主義（network individualism）」：

社群是位居網絡核心的行動者所建構強弱不一的連結關係，在此連結關係中將可以提供社交、資訊、支持與認同。此種以個人為核心的概念與Castell的立論相似（Wellman, et al., 2001）。Castell認為：「網際網路在建構社會關係時，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它能提供物質的支持，藉以促成網絡個人主義的形成」（Castell, 1996）。循此，網路傳播科技對於社群建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藉由網路，人們可以跨越不同時間／空間進行聯繫。此外，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在不同的節點發展強弱不一的聯繫，因此每個人都能形塑出各自獨一無二社群。

肆、小結

經上述文獻的整理後，本文發現網路與社會資本互相形塑的過程中，有三項關鍵問題必須探討：首先是「時間／空間壓縮」，在資訊科技的中介下，壓縮個體原本所感知的時間與空間距離，帶來一種即時性的溝通形式。緊接著，延續時間／空間壓縮的討論，本文提出網路去疆界化的特性，個體在連網溝通的過程中，地理所扮演的決定要素將逐漸退場，形成一種去地理限制的溝通環境。然而，本文也發現，地理的影響要素雖逐漸淡化，但實存的社會結構（例如數位落差）仍然在另一端扮演拉扯的角色。最後，本文依據Castell所提出網絡社會的概念，提出網路科技的第三項特色－網絡化。亦即，個體與個體在傳播科技的中介下，逐漸相互聯繫，形成一種網絡的社會結構。此種社會結構不同於大眾（mass）的概念，個體與個體之間不再是原子化的個體，相對地是一種持續連結與互動的社群關係。

第三節、網際網路與社會運動

隨著臉書（Facebook）與推特（Twitter）在全球迅速普及，對於社會運動而言，它象徵著「新型態的社會反抗」。新一代的網路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以極快的速度傳遞訊息，進一步實踐社會改革的理想（Theocharis, 2011）。將視野放到埃及，行動電話世代（mobile phone generation）推翻長達數個世紀的威權統治政府。轉到菲律賓，簡訊世代（text-message generation）趕走貪腐的Estrada政

權。至於英國，網路曾串連全國上萬名的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刪減高等教育的預算。知名的墨西哥Zapatista運動，網路也促進當地原住民與國際社群之間的合作，形成跨國之間的「賽伯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再將焦點再轉回國內，2011年，反旺中、反美麗灣、文林苑都更、華隆罷工等，都能發現網路與社會運動之間的交互影響與挪用（Van Laser & Van Aelst, 2009; Theocharis, 2011; Stein, 2009; Cottle, 2011）。

自從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大多出現年輕人對政治冷感與投票率下降等現象，Putnam（2000）將這種公民參與降低的情況稱之為社會資本的衰退。然而，伴隨著實體政治參與的下滑，來自世界的年輕人透過新科技去組織政治行動的比例卻越來越高（Theocharis, 2011）。從抗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到反抗極權政府，多數學者都同意年輕世代是運動的主要發起者與實踐者。對於年輕的社會改革者而言，他們一方面接受現代民主教育的洗禮，另一方面也受到網路自由與開放文化的薰陶；因此，年輕人有理想，也有能力去實踐社會改革。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群科技世代逐漸成長之後，勢必對於原有的社會與政治結構帶來相當大程度的轉變。

Cottle（2011）分析「阿拉伯之春」成功的原因時指出：年齡與人口結構的轉型是相當重要的原因。根據統計，中東大約有65%的人口是位於30歲以下，這群熟稔網路的使用者（technology-savvy），逐漸掌握新型態的傳播方式，並且能突破極權政府的監控，向外傳播重大的訊息。藉由社群媒體，年輕人建立了對話與參與公共事務的場域，對年輕的使用者而言，透過網路進行溝通與參與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網路空間將形成各種社群，並且從各個面向（環保、人權、媒體改革）去監督政府的表現。

除了人口結構的轉型，網路傳播科技也是重要的推進因素。蘇鵬元（2012）指出，第一代的網路社會運動是透過電子郵件傳送訊息，屬於點對點的溝通；第二代則是以部落格、電子佈告欄為平台，雖然擴大成多點之間的傳播，但匿名的設計常會導致網路戰火與不負責任言論的產生；到了第三代的臉書社群媒體，因

為奠基在實體的人際關係，因此相關議題的擴散速度更快，並且更容易進行社會動員。Theocharis (2011) 將社群媒體的出現稱之為「後2.0時代」，此時期所展現的特色是：網路使用者除了從「媒體消費」轉型到「媒體產製」，同時，網路平台是以每位使用者為核心去建立社群、並分享知識與訊息。Bennett (2003) 認為，網路所帶來的改變是媒體民主 (media democracy)，原本的運動者從媒體消費者轉向產製者。例如由運動者所自製的紀錄片、報導與懶人包等，都是顛覆過去的社運思維；由此可知，在網路科技與社會運動之間，已經交織著整體社會結構的轉型。

壹、網路的賦權潛能

來自世界許多的個案研究都指出，網際網路能支持特定的社會改革運動，並且在直接與間接的層次上，促成運動的成功 (Van Laser & Van Aelst, 2009; Theocharis, 2011; Stein, 2009; Cottle, 2011)。在以下的段落中，本文將列舉網路賦權的三項特質，藉以說明社會運動與網際網路之間的相互挪用。

首先，網路能擴大社會運動的網絡。Theocharis (2011) 分析網路動員時指出了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 與自我組織 (self-organized) 兩項特質，在此特質的影響下，社會運動所形成的是相對寬鬆的異質性網絡。Bimber (2000) 認為，藉由網路，社運團體可以擴大行動的範疇，並且建立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夥伴關係。如此，不僅可以獲得不同團體的協助，也能讓社群內部的觀點更加多元。Bennett (2003) 表示，網路具有多中心 (polycentric) 與展延 (malleable) 的特性，使得原有的網絡能包含更多的異質成員，因而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

發生在墨西哥的Zapatista運動，是透過網路進行社會改革的經典案例。Zapatista運動的成員多來自於契亞帕斯 (Chiapas) 地區的原住民社群，他們在殖民歷史的脈絡中，不斷被剝奪與驅逐，一直到1994年，墨西哥政府將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屆時將會取消對特定穀物 (例如玉米與咖啡) 的關稅保護。由於這些穀物是維持原住民生計的重要作物，取消關稅保護無疑是抹除Zapatista原住民的生計來源；因此，反對團體開始透過網路，串連主流與邊緣族群的支持，進一

步迫使墨西哥政府與反對團體展開協商，並且簽署有利於原住民的協議（Landzelius, 2006; Belausteguigoitia, 2006）。

Belausteguigoitia（2006）分析Zapatista成功的關鍵在於運動者發展出跨越種族與階級的協作模式（collaborative）：藉由網路，實體與虛擬的社群都能策略性地介入運動。Landzelius（2006）也認為，Zapatista能技巧性地透過網際網路來散布訊息，進一步形塑跨國網絡的支持。除Zapatista外，1999年在西雅圖所展開的反WTO運動，則是利用網路「開放網絡（open network）」的特色，藉以連接不同的異質成員，例如學生、環保、農民與左翼社團等。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成員，透過網路，直接串起實體與虛擬的行動網絡，並且從各個場域發起抗爭。

第二，網路傳播具有低成本與高效率的特性。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表示，網路無論是在時間或金錢的層次上，都比傳統媒體的成本更加低廉，對於長期缺乏資源的社運組織而言，無疑是一大吸引力。此外，當社會運動必須要即時動員，接觸大量潛在的支持者時，相較於傳統的電話或傳真，網路無論在聯繫速度或所需的經費而言，都具有高效率與低成本的特性。Theocharis（2011）研究英國學生抗議高等教育學費調漲的運動中發現，學生團體利用網路，大量展開各種的抗議策略，例如：線上連署、請願、訊息分享等。這些學生充分利用網路成本低廉的特性，以小成本，達到訊息擴散與社會動員的效果。

第三，社運團體掌握自主發聲的平台，不需透過主流媒體的中介，對主流媒體的依賴程度也因此會降低。主流媒體礙於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故在報導時，很難完全依照社運組織所設定的議題框架去進行報導；因此，對於社運組織而言，一方面要生產對立框架去反制主流論述，另一方面也要有平台與管道去傳遞這些訊息。網路，即是最佳的自我發聲平台。根據Theocharis對於英國學運的研究，在抗爭期間，網路共成立33則臉書頁面、33個網站上線、33個新增的推特帳號，以及共散佈超過15,000則訊息。這些在網路大量傳遞的資訊，成功吸引BBC與《衛報》等主流媒體加入報導。由此可知，學運可以利用網路來建構議題框架：一方面與主流媒體保持聯繫，確保議題能在全國與全球性的媒體曝光；另一方面，根

據主流媒體的報導，即時作出回應，假如有扭曲或誤解的地方，即可以在線上提出進一步修正。從該案例中可以瞭解，來自網路的資訊將能成功溢散至主流媒體，新聞在線下與線上之間，已經呈現「混雜(hybridity)」的情形(Theocharis, 2011)。

綜合上述，本文針對網路對於社會運動的賦權潛能，整理出三大面向，分別是：1.網路能擴大社會運動的網絡，使得網絡更具異質性，進而包含來自全球各地的社運組織。2.網路使得動員的過程更具效率，並且節省動員過程中所可能耗費的成本。3.網路能建構自主發聲的平台，並且生產對立論述，讓更多民眾能瞭解運動的訴求。

貳、網路社會運動

奠基於前述所整理之網路對於社會運動賦權潛能的三種面向，本文於以下將進一步依據線下／線上的分類，分別列舉出實際的抗爭方式。根據Van Laser 與 Van Aelst (2010) 的說明，所謂的「線下」是指：藉由網路輔助或支持的社會行動，透過網路，將使得實體社會空間的動員速度更快、規模更大。至於「線上」則是指：以網路為基礎(internet-based)的虛擬抗爭行動。線上與線下之間的區分，雖有利於釐清網路所扮演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線下與線上並非兩個獨立的場域，事實上，線上的活動會發展至線下，例如爭取網路自由的遊行；線下的社會運動也會發展至線上，例如Zapatista運動與本文所關注的蘭嶼反核廢運動。

首先，是由網路所輔助的線下社會運動。當社運團體要發起遊行時，組織幹部可以透過網路平台來傳遞相關的訊息。特別是關於遊行的訴求與目標，藉由網路，參與者可以明確瞭解遊行時間、集合地點、行動守則等(Van Laser & Van Aelst, 2010)。在網路尚未普及的年代中，訊息的傳達相當不容易，假如社運團體沒有建立組織化的動員體系，欲達成大量的社會動員幾乎是不可能。相反地，在社群媒體迅速普及後，社運組織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建立活動頁面，並起透過網路平台的交互分享與轉貼，迅速將訊息傳遞出去。

除了促進線下的集體行動，網路也在線上場域中，開創不同於以往的抗爭型態。常見的手法有信箱轟炸（e-mail bombing）：集合眾人的力量，將電子郵件寄到特定的信箱，藉以癱瘓該信箱的伺服器。另外，也會在特定的時間內，一同點擊某個網站，或者按下重新整理鍵（F5），此種瞬間的流量也能達到癱瘓伺服器的效果。上述兩種抗爭的策略於1999年11月在西雅圖所舉辦的WTO高峰會曾經採用。藉由癱瘓伺服器的手段，將能成功阻撓會議的進行，並且吸引主流媒體的目光（Van Laser & Van Aelst, 2010）。

此外，網路也賦與社會運動更多發揮創意的空間。例如社會運動者可以藉由更改企業的圖像或商標，達到改變圖像之象徵意義的效果。例如在文林苑都更案中，網友們就曾經kuso郝龍斌市長「台北好好玩」的文宣，將該文宣改成「台北好好拆」。Van Laser與Van Aelst（2010）認為，這是一種挪用符號，以達到諷刺或對立論述的策略。除了惡搞的創意之外，臉書也是一項進行訴求的平台，諸如個人頁面的「封面（banner）」與「大頭貼（profile）」等，都是能以視覺圖像去呈現訴求的空間。

總結以上，本文列舉出數種網路的正向賦權潛能，然而，為避免落入「科技決定論」或「科技樂觀主義」的窠臼中，本文將於以下反思網路的侷限性，希望能更全面地瞭解網路科技在當代社會中的使用脈絡。

參、網路的侷限

首先，網路仍面臨數位落差的困境。比較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於近用（access）網路的機會仍然有相當大的鴻溝，根據Lee（2006）的研究，全世界只有5.4%的世界人口能使用網路，其中44%是來自於美國及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另外，Latukeyu（2006）也提醒，網路無所不在的特性似乎是第一世界所呈現的表象：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的調查顯示，全球約有百分之80的人口仍未接觸到電信服務。以澳洲為例，它目前仍有「城市—鄉村」的數位落差，此落差使得鄉村地區的民眾在近用網路資源的能力受到侷限。直到近幾年，數位落差的情形仍然相當嚴重，根據Van Laser 與Van Aelst

(2010) 的研究指出，北美洲約有75%的民眾能夠近用網路，相對於非洲僅有5%。由此可知，在不同區域、種族、階級與性別的界線中，能否近用資訊科技仍然有相當大的門檻。

由於社會運動大多是弱勢者與政府及大企業之間的抗爭，當各式的抗爭逐漸轉往線上時，社會運動必須要注意弱勢者是否有機會近用其所需的資源。否則，一味強調科技賦權的潛能，有可能因此排擠弱勢者的發聲權利 (Van Laser & Van Aelst, 2010)。特別是對於原住民而言，處於社會結構的弱勢，可能會使得他們缺乏設備與技術去實踐線上的抗爭。Belausteguigoitia (2006) 在檢視Zapatista運動之後發現：儘管網路讓Zapatista能夠與國際社群進行串連，但主要的使用者大多以墨西哥大學生，以及來自西方世界的高知識份子為主。許多農民、女性等不具備網路使用技能的族群，反而失去發聲的管道，被迫成為弱勢之中的弱勢。

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曾對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進行研究，他們發現，社會運動的主要訴求對象—弱勢族群，接觸網路的機會仍遠遠落後於資源豐沛的群體。諸如上網的成本，偏鄉基礎建設落後等，都對於缺乏資源的弱勢團體形成屏障的效果，使得原本應該是運動主體的群眾，反而被排擠在資源之外。特別是對於經濟資源極度匱乏和技術門檻無法跨越的原住民社群而言，網路在2001年的時空脈絡下，幾乎無法對原住民運動產生正面幫助。

第二，網路所產生的弱連結與異質性高的影響。透過網路的輔助，雖能快速擴大社會運動的規模，並提高參與的人數。但長期而言，可能會因為組織鬆散及社群的承諾程度低，而造成負面的效果 (Van Laser & Van Aelst, 2010)。以線上連署為例，使用者只要點「讚」或填寫名字，就可以完成參與，降低參與門檻之後，相對不需要社群成員高度的承諾。如此，將可能削減連署的影響力。Van Laser 與Van Aelst (2010) 表示，當鍵盤參與 (cyber activism) 取代實體行動時，市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基礎可能會因此被動搖。

網路是建立弱連結 (weak ties) 的工具，它能在很快的時間內，集結大量的群眾進行抗爭；然而，快速集結的代價卻是運動能量消散的速度也會加快。如同

Earl與Shussman（2003）指出，在網路行動主義（e-activism）的年代中，原有的夥伴（member）變成使用者（user）。成員之間缺乏承諾與情感歸屬，如此將造成群眾在短暫支持後又轉往他處；因此，許多學者認為在網路平台中，相當難以建立信任與強連結的社會關係。Bennett（2003）也認為，網路高度流動的特性，使得進入與離開的門檻都降低，如此將難以控制及凝聚集體認同。

最後，即使網路作為自主發聲的平台，但不可否認的是，主流媒體的報導仍是左右運動成敗的重要因素。Van de Donk（2004）等學者認為，主流媒體對於社會動員或議題設定，仍然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因為網路去中心化的本質，相當程度會影響訊息的可信度（credibility），對於閱聽人而言，主流媒體的報導仍是相對值得信賴的消息來源。因此，對於社會運動者而言，不能僅仰賴另類媒體，而是必須思考如何透過網路平台去影響主流媒體的報導。以Zapatista運動為例，即使該運動成功運用網路動員全球的支持，但，運動其中一項很重要的策略仍是吸引國際媒體的報導。因為唯有透過國際媒體，才能給予墨西哥政府最直接的壓力（Belausteguioitia, 2006）。

肆、網路與原住民社會運動

隨著資訊社會的來臨，國際上有許多的政府、企業與非政府組織都逐漸將資訊建置與存放在數位平台時，科技近用對於原住民而言，儼然成為重要的議題。澳洲知名的原住民權利倡議者Nugget Coombs曾提出「原住民機制（aboriginal mechanism）」的構想，他試圖透過此機制，串連地方行動，並且轉化為全國的影響力（Latukefu, 2006: 44）。原住民學者Landzelius（2006）也指出，原住民需要一個能提供文化與政治賦權的平台，藉以對抗過去殖民歷史所建構的他者印象，並且確立原住民土地、語言與生活方式的自治權。網路提供全球原住民自我再現的空間，對於實際或虛擬的社會運動而言，網路皆能提高運動的能見度，在此，原住民的世界因為網路而擴大，並且透過全球串連（articulation）的過程，重新形塑自我的定位。台灣原住民學者孔文吉（2000）也表示，全球化的原住民資訊

網站，使得資訊流通與取得更為簡潔快速，不但聲息互通，無遠弗屆，更能建立跨國原住民之間的友誼、合作與行動。

對於原住民而言，發展資訊科技的同時，也是朝向政治賦權與整體的自主性前進（Latukeyu, 2006）。國際原住民領袖倡導資訊科技的思維是，透過資訊科技，使不同的原住民團體可以相互溝通、協調，並且接觸不同形式的資源。如同澳洲內地數位網絡計畫（Outback Digital Network）的主席曾說：「只有透過網絡，我們才可以在資訊時代中運用經濟與社會資源」（Latukeyu, 2006: 45）。

在蘭嶼長期進行田野研究的學者郭良文與林素甘（2010）也表示，自從網路科技發展之後，逐漸改變原住民的劣勢，許多先進國家的原住民族，已經懂得利用網路來促進文化發展或獲得商業機會，甚至可以幫助原住民進行「去殖民化運動」。新傳播科技可以讓蘭嶼當地人展現自己的觀點，也是相當好的文化保存工具，更是讓外界正確瞭解當地特殊文化的一個新興媒介；因此，協助蘭嶼原住民社群建立對外發聲的媒體管道是一件有意義、重要的工作（郭良文、林素甘，2010）。

研究加勒比海原住民的文化復興運動的Forte也指出，這群加勒比海的原住民，企圖扭轉主流論述中的滅族說法，進而告訴社會大眾：「我們沒有滅絕（We are not extinct）」。Forte透過網路民族誌法，針對加勒比海的原住民網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網路使得被視為是滅絕的原住民，提高能見度（visibility），並且對於線下不被接受的原住民而言，是具體化（embody）其形象的工具。當原住民的形象具體化之後，便能促進不同族群在線上及線下的認可（recognition），最後則是增加原住民在線下的主體性（authenticity）。當原住民社會運動者經歷四個循環之後，其主體性就逐步從線上轉往線下扎根（Forte, 2006）。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對於資訊科技的採用也不應該落入過度樂觀的期待當中。原住民學者Latukeyu（2006）鑒於過去殖民的黑暗歷史，對於原住民應當如何運用資訊科技仍然採取審慎的態度。2003年於日內瓦召開的資訊社會高峰會（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就針對原住民與資訊科技的議題做出以

下結論：原住民進入資訊社會的代價不應該是犧牲自身的權利與文化認同，相反地，應該是原住民自己決定何時以及透過何種方式來近用與使用新科技（轉引自 Latukefu, 2006）。對於蘭嶼的原住民而言，研究者對於科技應該採取更全面的視野、以及站在達悟族主體的角度進行觀察，而非僅是以採用新科技即代表賦權的單向思維。

Latukefu（2006）進一步指出，欲瞭解網路對於原住民的影響，必須要透過歷史的軌跡、知識與權力在當代的互動脈絡去理解。對於原住民族而言，資訊傳播一方面扮演政治啟蒙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它同時也造成原住民被取代、奴役、剝削與迫害的角色。儘管有許多原住民領袖主張利用網路傳播科技來進行自我賦權，然而，這些主張也因為過去的殖民歷史而被質疑。因此，對於原住民與新科技的辯證過程，研究者不應該假設所有原住民族都是具有相同臉孔的同質社群，反之，應該檢視特定文化背景的行動者，如何在變動的溝通環境自處，進而找尋自我認同，建立社群形像（Latukefu, 2006; Landzelius, 2006; 孔文吉, 2000）。

檢視台灣的脈絡，有關原住民社會運動與網路的文獻並不豐富。其中，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在初探台灣社會運動的網路經驗時，曾討論原住民運動與網路應用。作者發現，原運在網路上並不活躍，許多原住民運動的相關網頁，大多不是由原住民自行建置，網頁更新的情況也相當緩慢，時常在運動過後就漸消沉寂。在2001年的時空環境中，原住民運動者連e-mail的使用並不普遍，即使是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原住民知青，經常使用網路的也相當少見。對於此種情形，林鶴玲與鄭陸霖指出，網路一方面給原運帶來無限希望，另一方面又遙不可及：不論是經濟資源的缺乏，或是基礎建設的不足，都限制台灣原住民進行線上發聲的可能。

台灣原住民社群的資源相當缺乏，許多原住民礙於經濟因素，經常散居於各大都市謀取生計。在溝通不易的情況下，網路的即時和便捷，正好能提供原住民運動者一個聯繫與動員的溝通平台。如同紐西蘭學者Sissons（2005）討論都市（urban）與部落（tribal）的原住民問題，他說：部落與都市原住民所遭遇的共

同困境是，對土地的異化以及失去民族自決的能力。在此種情況下，對於提倡改變的原民運動而言，首要的策略是維持部落與城市之間的連結關係。然而，對於如何維持長久的連繫關係，Sissons並未於傳播科技的面向中著墨太多，但本文以為，網路在滿足特定的前提後，將可以積極作為連繫部落與都市原住民的平台，而其中一項前提是：必須克服數位落差的阻礙。

從林鶴玲與鄭陸霖2001年的文獻到2012年，中間經過近10年的時光，不僅傳播基礎建設逐漸完備，就連參與社會運動的主要成員也逐漸由數位原生者(digital native)完成接棒。對於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而言，網路能否增強原住民運動，並且提昇原住民族的社會資本，是本文欲於後續章節試圖回答的問題。回到蘭嶼反核廢運動的脈絡，達悟族在日治與戒嚴時期，鮮少與現代化社會進行接觸，因而能保有傳統的文化與習俗；直到1980年代，飛機與輪船帶來大量的觀光客與物質商品，不到幾年的時間內，蘭嶼快速被拉進現代的商品經濟當中。原有的部落文化在短期間被迫轉型為現代文化，其中所面臨的糾葛與衝突不可謂不鉅大。因此，對於網路傳播科技的採用，本文並不採取「科技即賦權」的單向思維，而是基於達悟族的文化傳統與特殊的歷史脈絡進行整體性的詮釋。

第三章、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經過文獻回顧後，本研究的概念框架已逐漸清晰。從歷史的角度思考：1982年，核廢料儲存場完工，蘭嶼開始供應電力，此時間點象徵蘭嶼正快速從「前現代」的部落社會，進入「現代」的科技社會。這段期間，諸如貨幣經濟、現代商品、觀光發展等，無不劇烈改變蘭嶼的社會風貌。其中，本文所關注的傳播科技，也在此時介入蘭嶼居民的日常生活，並且在緩慢的過程中，逐步改變蘭嶼社會的傳播型態：例如電視的進入，改變蘭嶼的夜間娛樂，許多人捨棄在涼台聊天的習慣，轉而在家裡收看八點檔。在傳播科技介入的過程，本文選擇以「網路」作為討論核心，特別是持續30年的反核廢運動，網路如何介入、形塑，甚至是改變運動的型態，皆是本文所關注的範疇。以下，本文將進一步闡釋研究問題與方法。

第一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為了幫助本文釐清網路與反核廢運動之間的相互形塑，本文援引社會資本的概念架構，檢視網路對於反核廢運動之網絡、規範、資源所形成的改變。〈圖3-1〉為本文的研究架構圖。在最外圍的三角，是社會資本的三項構面，環繞在中心的是網際網路。網路將會對社會資本的各個面向產生影響，而三個構面亦會彼此牽扯，進而造成整體社會資本的變化。

首先，網絡是基於反核廢運動所形成的人際關係，此人際關係包括蘭嶼當地的達悟族人、旅台達悟族人、以及所有支持反核廢運動的民眾等。網絡關係可以區分為同質性較高，屬於緊密型社會網絡；以及異質性較高，屬於寬鬆連結的社會網絡。

第二，規範是反核廢運動的社會網絡內所蘊含的信任、互惠關係，以及強制性的道德約束。規範來自於傳統的達悟文化，但同時也包括其他參與反核廢抗爭的公民團體或網路社群的行為規範。

第三，資源是達悟族人在反核廢運動所能挪用的物質、文化與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包括運動所需的經費與設備；文化資源則包含達悟族傳統的知識、現代知識以及數位知識；人力資源則是籌畫社會運動的工作人員與參與抗議的民眾。

除了組成社會資本與網際網路的三角，還有另外一條軸線切出1980年至2012年，現代傳播科技進入蘭嶼的時間線；據此，1980年代以前所出生的達悟族人，曾發起舊世代的反核運動；而1980年代以後出生的達悟青年，將帶領新世代的反核運動。兩代之間，涉及網際網路的進入與普及，因此將會形塑出不同風貌的反核廢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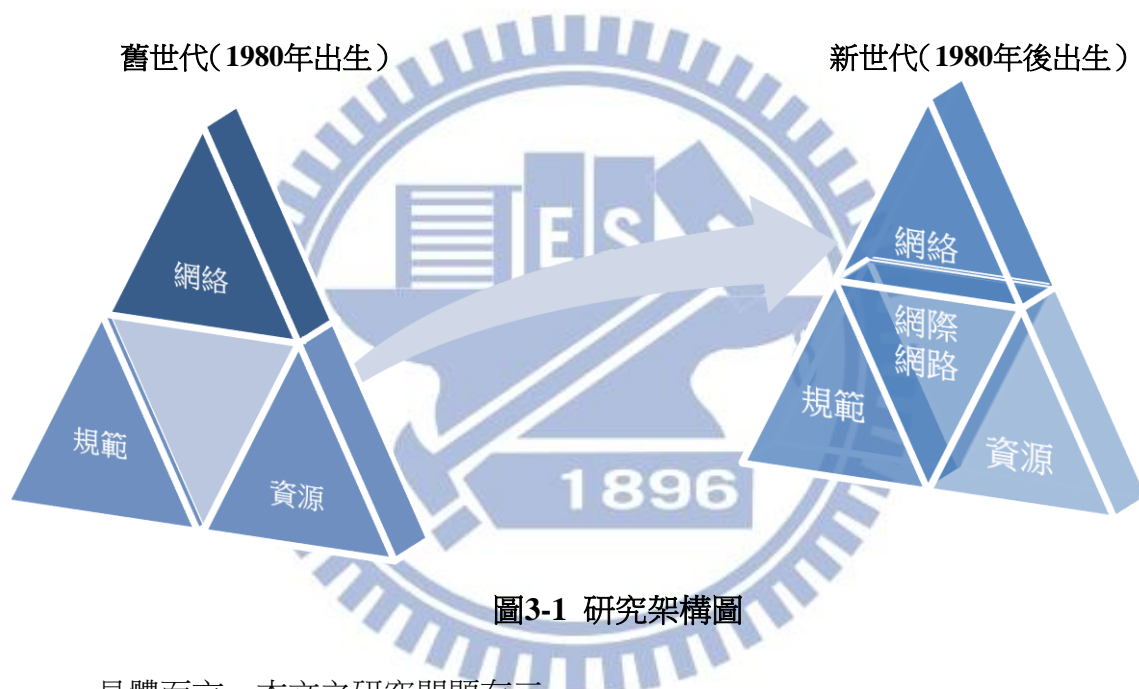


圖3-1 研究架構圖

具體而言，本文之研究問題有三。

1. 蘭嶼反核廢運動的網絡關係，將如何受到網際網路的影響？在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的人際動員方式為何？受到網路影響的新世代反核廢人際串連，將產生什麼影響？兩代之間，如何交織出哪些不同型態的社會網絡，是本文探討的第一個面向。
2. 蘭嶼反核廢運動的規範，將如何受到網際網路的介入而產生變化？透過網路而擴大網絡的新世代反核廢運動，如何影響到社會運動的規範與互惠關係？此為本文探討的第二個面向。

3. 蘭嶼反核廢運動的資源，在網際網路進入之後，將如何重組不同的物質、文化、人力與媒體的資源型態？本文將比對新世代與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的資源運用狀況，探討網路傳播科技對於社會運動之資源影響。

第二節、研究源起

2011年春，國立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擴大舉辦「台灣海洋文化研討會」。邀請「傳播與科技學系」之研究團隊，針對蘭嶼宗教、媒體、網路與災難進行多面向的田野調查，並且將研究成果集結為《蘭嶼族群的媒體與認同：西方、漢族與原住民文化的交會》之會議論文集。在此為期兩年的研究計畫中，筆者以研究助理的身分，從2011年到2012年，前後共參與5次的田野調查。

參與田野調查的過程，由於擔任不同老師的研究助理，故有機會對蘭嶼的教育、醫療、資訊教育等，進行大量的訪談及觀察。筆者發現，核廢料對於達悟民族的影響，已經達到根深蒂固的程度，這些影響，從內而外地彰顯在不同的議題範疇。譬如在採訪教育議題時，許多受訪者皆不約而同提到他們如何透過教育，教導下一代的達悟孩子，有關反核廢的歷史。此外，在醫療的篇章中，更是有大量的受訪者會提到他們對於輻射外洩的恐懼，包含憂心癌症比例上升、不良基因遺傳，以及當地生態的傷害等。透過受訪者的分享，不難體會，達悟族對於核廢料的不安、焦慮、無助。此時，筆者發現，要關心蘭嶼，核廢是研究者不能迴避的議題。要瞭解蘭嶼近30年的發展，就必須要從整體民族的反抗史談起。

隨著接觸機會的增加，每一次造訪都改變筆者對於蘭嶼的認知。這段過程，筆者結識許多蘭嶼朋友，除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外，也多了一層作為朋友的情誼。回到台灣後，筆者仍與蘭嶼朋友保持良好的連繫，除電話的關心，也會在臉書新增為好友。網路的連繫幫助筆者能持續關注蘭嶼所發生的大小事，包括最新的反核廢動態。

雖然筆者持續關注反核廢的相關議題，但在思考研究論文時，卻始終無法連結新傳播科技與反核廢運動之間的關係。直到2011年12月31日，「部落文化基金

會」帶領達悟耆老前往台灣總統府抗議。這場抗議不同於以往的地方在於：部落文化基金會首次透過臉書，向外發出動員的訊息。在台北的抗議現場，聚集超過一百名的旅台蘭嶼青年前往聲援；同時，蘭嶼島上也有部分青年在臉書發起儲存場前的跨年靜坐活動。2011年冬，蘭嶼島上的年輕人逐漸透過臉書作為社會動員與訊息傳遞的工具。

核廢料儲存場前的跨年活動，獲得許多達悟青年的認同，乘著這股趨力，2012年2月20日，由部落文化基金會與達悟青年，在島上又發起另一波抗議活動。220的活動更進一步展現網路賦權的潛能。首先，在智慧型手機與數位相機逐漸普及的情況下，許多參與抗議的達悟青年，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傳抗議的影像，並且留下反核廢的訴求。此外，在社群網站相互轉貼的情況下，反核廢的活動照片，甚至是紀錄片，都大量出現在各個網路平台，使得該活動獲得一定的議題能見度，並且吸引主流媒體跟進報導。延續220的能量，3月11日在台北舉行的「重新思考零核電，311 告別核電遊行」，更是充分利用網路媒體的動員潛能。由部分蘭嶼青年所發起的「蘭嶼青年行動聯盟<311反核廢大遊行>」，共累計有上千人參加。

以2012年為開端，蘭嶼的反核廢運動正逐漸轉型，從線下的實體抗爭，一直延續到線上的網路空間。這段轉型的過程，正好提供筆者於進行研究的思考角度：藉由蘭嶼達悟族運用網路的過程，可以提煉並萃取相關的經驗，作為後續整體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借鏡。

帶著相關的問題意識，本文開始進行書寫與資料蒐集的工作。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

達悟民族與主流社會之間有許多思維上的差異，因此研究者必須發展多重方法，一方面貼近當地的生活脈絡，另一方面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與分析。對此，本研究採取民族誌法，分別於2011年1月、5月、8月，以及2012年5月、9月，前往蘭嶼，進行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及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每次停留在蘭嶼的時間點約為一至兩個禮拜。以下，將分別對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的執行步驟進行說明。

壹、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是一種「有目標的對談」（a conversation with purpose），研究者依據特定的問題結構，以對話的方式，在提問與回答的互動過程中，蒐集研究所需要的訊息（Marshall & Rossman, 1999）。使用深度訪談的優點在於能快速獲得大量的資料，特別是針對龐大而複雜的現象，深度訪談能使問題聚焦，並且歸納出特定的問題根源。

步驟一：設計訪談大綱

本研究援引社會資本與新舊世代等概念框架，設計「半結構式」的訪談。〈附件1〉為本研究設計之訪談大綱。值得注意的是，訪談大綱僅是大方向，實際的研究執行仍會依據受訪者的背景、職業與身分等，作出不同程度的調整。例如訪問反核廢運動的意見領袖時，即會著重在如何研擬運動策略的部分；而在訪問一般居民時，則著重在訊息如何獲得，以及參與運動的想法等。

步驟二：徵求受訪者

研究期間，筆者共有5次機會前往蘭嶼進行田野調查，在來回接觸的過程，同時建立當地的人際網絡。此種對於蘭嶼人際網絡的熟悉度，相當能幫助筆者在特定的議題上，找到合適的人選進行訪談。譬如在舊世代的反核運動中，教會牧師和部落知青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新世代的反核運動中，則以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為主體。因此，針對新舊世代的分野，筆者各自約訪該時期的運動領袖進行

訪談，透過與內部幹部的對話，使本文能瞭解運動的動員策略，以及相關媒體議題的操作。此外，為使訪談的意見趨向多元，並且避免菁英取向，本研究也以滾雪球的方式約訪旅台青年、家庭主婦、民宿業者等。從2011年到2012年，本研究共執行19人次的深度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請見〈表3-1〉。編號“O”代表舊世代反核運動者；編號“N”代表新世代反核運動者。

表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反核廢運動角色	個人學歷與職業	新／舊世代
O1	男	意見領袖	神學院畢；教會牧師	舊世代
O2	男	意見領袖	神學院畢；教會牧師	舊世代
O3	女	參與者	國中畢；家庭主婦	舊世代
O4	女	參與者	國中畢；家庭主婦	舊世代
O5	男	參與者	高中畢；文史工作者	舊世代
O6	男	參與者	警察學校畢；警察	舊世代
O7	男	參與者	高中畢；民宿業者	舊世代
O8	男	參與者	大學畢；小學校長	舊世代
N1	女	意見領袖	高中畢；咖啡店業者	新世代
N2	男	意見領袖	專科畢；原民台	新世代
N3	男	意見領袖	高職畢；民宿業者	新世代
N4	男	意見領袖	高職畢；民宿業者	新世代
N5	女	意見領袖	大學畢；咖啡店業者	新世代
N6	女	意見領袖	研究所畢；NGO	新世代
N7	男	參與者	專科畢；蘭嶼機場員工	新世代
N8	男	參與者	高職畢；蘭嶼機場員工	新世代
N9	女	參與者	高職畢；民宿業者	新世代
N10	男	參與者	中學畢；旅台青年	新世代
N11	女	參與者	大學畢；中學教師	新世代

19位的受訪者中。男性12位，佔整體訪問人數的63%；女性7位，佔整體訪問人數的37%。若以1980年作為新舊反核世代的分水嶺，則訪談對象中有8位（42%），屬於舊世代的反核運動者，而有11位（58%），屬於新世代的反核運動者。

無論新舊世代，反核領袖都是本研究訪談之對象對象之一；作為反抗運動的籌畫者，反核領袖必須思考如何動員部落群眾，擬定相關的媒體策略，因此，意見領袖的訪談資料對於本研究相當重要。

在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與職業方面，舊世代的意見領袖多為教會牧師，顯見教會系統對於舊世代的反核運動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對於新世代而言，由於蘭嶼於1980年代開放觀光，在進入現代經濟的脈絡下，許多蘭嶼青年已經轉型從事觀光業來維持生計；因此，本研究有5位受訪者是在經營民宿或咖啡店。不同職業會直接影響到反核廢運動的推行，特別是在暑假觀光旺季的時候，民宿和咖啡店幾乎都是客滿的狀態。面對應接不暇的情況，使得年輕一代在組織反核廢的運動時，將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若以教育程度作為基準進行分析，舊世代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有2位國中畢業、3位是高中畢業、2位畢業於神學院，僅有2位分別畢業於警察和師範學校。教育程度偏低情形在新世代中已逐漸改善：有1位成員擁有碩士學歷，另外也有2位畢業於國立大學，除N10之外，大多是專科或高職畢業。由於反抗運動需要一定的知識去生產對立論述（counter-discourse）；因此，教育程度的提高對於後續反核廢運動也將產生影響。

再以受訪者的電腦與網路使用技能及教育程度來檢視，多數舊世代受訪者仍不會使用電腦與網路，少數受訪者因從事教育工作或警察工作，而自學電腦、可上網與製作簡報或處理公文等。相對於此，新世代的反核廢者均相當熟悉電腦與網路，他們都擁有個人電腦與臉書帳號。對於新世代的反核青年，電腦與網路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透過網路與民宿的客人進行聯繫或運用臉書更新反核資訊等，都是生活裡必要的技能。因此，對於新世代的達悟青年而言，非但沒有缺乏資訊設備與技能，相反地，多數都具備運用網際網路的能力。

步驟三：執行訪談與資料謄寫

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執行地點位於蘭嶼，訪談過程進行全程錄音。本研究在招募受訪者時，會說明本次的研究目的，並且詢問受訪者是否可以進行錄音，待受訪者瞭解並同意後，才會進行正式訪談。

訪談時間大約從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不等，訪談內容會先瞭解受訪者的成長背景、家庭狀況、人際關係等，上述有關受訪者生命經驗的背景資料，一方面有利於後續的訪談，另一方面也能幫助本文從整體性的角度去瞭解反核廢運動。

訪談結束後，本研究會將錄音檔轉換成文字檔，以利後續所進行的分析工作。另，本研究也會根據訪談後的感受與想法，書寫各個受訪者的田野筆記。

貳、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是從人類學門所挪用的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場域，觀察並瞭解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Jorgensen (1989) 認為，參與觀察的最終目的是「紮根在人類每天的生活事實，適時地發掘實踐和理論的真理」。因此，參與觀察可說是深入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企圖瞭解文化現象與社會行動的意義。

蘭嶼達悟族與台灣主流社會之間，不論是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等，都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本文除採用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外，也大量參與達悟族的日常生活。參與的範疇相當廣泛，基本上不限與反核廢運動相關，只要是當地朋友邀請，而研究時間又許可的情況下，筆者就會參加。從2011年至2012年，5次前往蘭嶼的過程中，筆者共參加以下活動：與達悟家庭共進晚餐、與達悟孩子到海邊釣魚、到網咖玩遊戲、擔任蘭嶼居家關懷協會的志工、參加蘭嶼衛生所的巡迴醫療、參加教會禮拜、參加婚禮、讀書會、村民會議等。

參與上述活動，雖不能幫助本文直接獲得反核廢運動的相關資料。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量參與能進一步瞭解達悟族的日常生活，使筆者在進行正式訪談時，更能貼近受訪者的生活脈絡，並從中去理解各項社會活動的文化意義。另一方面，長期參與達悟族的公共事務，也能與當地社群之間，建立信任關係。這層信任關

係，有助於本研究進行更深入的訪談與觀察。其實，蘭嶼在近幾年有許多學術團隊進駐，多數研究者在採集完研究所需的資料後，即會離去。對達悟社群而言，這些研究者是「拿完想拿的東西就離開」。長久下來，學術團隊和蘭嶼社群之間，常會形成緊張的關係。參與各項活動，目的是要告訴蘭嶼社群，研究者並不是短期採集，而是有心要重新建立平等與互惠的研究關係。

針對本研究關注的反核廢運動，本研究共進行2次正式的參與觀察。分別是2012年9月21日，由部落文化基金會主辦之「天秤颱風募款後會議」以及2012年12月13日，由清大人類所主辦之「蘭嶼反核廢講座」。這兩項參與觀察都是由部落文化基金會在臉書公布訊息，而筆者獲得該資訊後，即會以研究者的身分前往。抵達會議現場後，筆者皆主動告知主辦單位關於研究者的身分，並且在徵詢主辦方的同意後，進行全程錄音，並在活動結束後轉成文字檔。

參與場次一：天秤颱風募款後會議

2012年8月，天秤颱風重創蘭嶼，島上的NGO—部落文化基金會，在第一時間就透過臉書，向台灣社會發出募集物資及募款的訊息。此場會議的目的，即是邀請各部落的村長、社區發展協會會長、教會牧師等相關的意見領袖，向他們說明經費募集的情形，以及後續補助的比例規畫。

分析本次會議，參加的人員多是地方的政治菁英，例如部落的村長、發展協會理事長、教會牧師等。這群人負責地方事務的決策，同時也是意見領袖。由此可知，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仍是左右經費分配的關鍵，傳統家族與教會的影響力仍相當鉅大。在參加的人員之中，多以中年人為主，幾乎沒有年輕人列席。唯一參與的年輕人是野銀部落的青年，但他也只是旁聽，並無實際參與討論。就性別上的觀察，男性明顯高於女性，比例大約是3：1，發言次數則是以男性佔絕大多數，女性發言雖少，但仍然非常強勢。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對話的語言是以達悟的母語為主，談到激動處，幾乎都用母語進行溝通。此種藉由社區的語言，討論社區自身的事務，相當能彰顯達悟族的主體性。

參與場次二：反核廢講座

第二場會議是由清華大學人類所主辦，邀請部落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與秘書長與學生進行對談。本次參與的成員多以清華大學的學生為主，參加人數大約有30人。演講從部落文化基金會的秘書長介紹蘭嶼反核廢的歷史開始，一直討論到近期所出現之核廢場不當管理的外流照片。此外，部落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則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台灣在選取核廢料儲存場時，所展現的中心與邊陲思維。此場會議的重要性在於，部落文化基金會開始走出小島，進入台灣校園與學生進行對談，並且尋求學生的支持。

參、小結

經歷30年的反核廢運動是相當複雜的文化現象，中間牽涉到種族、階級、歷史、科技等不同因素的辯證；因此，本研究採取民族誌研究方法，透過為期一年半的參與觀察與大量的深度訪談，試圖在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釐清網路科技對於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的凝聚與建構。在以下的章節，本研究將綜合與歸納研究發現，並嘗試回答本文於前述所提之三項主要的研究問題。

第四章、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分析

蘭嶼核能廢料儲存場設置至今，反核廢運動經過30年。這段期間，不僅部落生活型態受到現代經濟相當大的衝擊，就連反核廢運動也在科技的介入下，對整體運動的社會資本—網絡、規範、資源，造成相當大的改變。為釐清網路對於反核廢運動之社會資本的形構，本文將依序檢視新舊世代在各項構面的改變。最後，本文將回到整體社會資本的觀點，從全觀的視野，反思傳播科技對於反核廢運動所帶來的影響。

第一節、反核廢運動之社會網絡

依據前述文獻的整理，本文所定義之網絡係指：基於反核廢運動所形成的人際關係，此人際關係包括蘭嶼當地的達悟族人、旅台蘭嶼人、以及所有支持反核廢運動的民眾等。網絡關係可以區分為同質性較高，屬於緊密型社會網絡；以及異質性較高，屬於寬鬆連結的社會網絡。以下，本文將根據新舊世代的動員系統與人際網絡，進行完整的介紹與分析。

壹、舊世代之社會動員

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的動員過程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相當大，整體而言，是由部落的知識青年與牧師作為運動發起人，再進一步透過教會系統與家族網絡進行社會動員的工作。

(一) 教會系統

第一代反核運動從1987年延續到1995年，在這段期間，達悟族展開大規模的自救與抗爭活動，除了在蘭嶼核廢料儲存場前示威，也組織族人到台北進行抗議（郭良文，2010）。回顧當時的反核廢運動，主要串連人物是部落的知青與牧師，他們動員族人的方式是透過教會系統與部落的家族網絡。作為舊世代反核運動領袖，同時也是東清部落牧師的O1提到：「當時就是透過幾個傳道人在部落告訴老一輩，核廢料是毒藥、惡靈，所以要驅逐它。」此外，參與2012年的反核廢運動，現任原民台記者的N2也指出：

反核廢在這麼多年以來，之所以能夠凝聚這麼多族人的原因在於宗教因素的介入。譬如說當時的郭建平，他的身分就是傳道人，所以就有一種宗教的魅力存在。

基督教與天主教分別於1948與1954年進入蘭嶼，並且成為多數達悟人的主要信仰。許多達悟人會在周日進教會，聆聽牧師的教誨，牧師也因此成為部落中的意見領袖（郭良文，2010）。分析牧師能成為當地意見領袖的原因：一方面是宗教信仰所建立的權威感，另一方面則是牧師所接受的是現代化教育。要在蘭嶼擔任牧師，必須前往台灣接受神學院的教育，此段在台灣接受教育的過程，使得牧師比起族人更瞭解核能廢料對於人體造成的傷害。因此，待牧師回到蘭嶼後，便將其在台灣所接收的最新訊息告訴蘭嶼當地的耆老和居民。對於過去訊息封閉與不流通的蘭嶼而言，牧師是引進資訊與知識的中介者。如同舊世代的反核領袖O1表示：

1986年，俄羅斯發生車諾比事件，因為我在台灣就讀神學院的關係，神學院就有介紹輻射線外洩造成人體危害的照片，我們就比較瞭解，同時也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所以我們就把這些照片和訊息帶回蘭嶼，告訴部落的族人，核廢料是有害的毒藥。

除了O1外，現任朗島牧師的O2，在1987年也以《從蘭嶼核廢料儲存探討基督徒對生態危機的態度與責任》作為玉山神學院的畢業論文。從上述兩位牧師的例子可以發現：反核廢運動的推行，實與當時神學院的教育有關。透過牧師和傳道人作為知識引介者，將反核廢的知識動能，導入當地社群，而相關傳道人與牧師，也作為驅動反核廢運動的中樞。

除了以牧師和傳道人作為意見領袖外，另外一項動員族人的重點則是教會所扮演之「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角色。如前所述，許多達悟人會在週日進教會禮拜，教會也因此成為族人之間交流訊息與社交互動的重要場域。筆者曾參與紅頭部落的教會禮拜，從中不難發現，多數達悟人會穿著稍正式的服裝出席。

聚會的過程，可以討論日常生活的瑣事，也可以討論影響社區的重大議題。因此，各部落的教會可以說具體地展現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由於教會在每個周末都能聚集多數的族人，因此，若有公共議題需要討論或傳遞時，多透過教會去進行。如同擔任朗島國小校長的O8提到：

之前的反核廢運動都是透過教會系統去發動，再由各村落的教會或長老去進行連結。教會把抗爭的訊息丟出去，確定時間後，各村再一起出動去進行反核廢的抗爭。因為在教會在社區之中，可以比較快的傳遞訊息，禮拜天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會上教會，那在聚會的時候就可以把訊息告訴村民。可以說，教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擔任新世代反核廢運動領袖的N3也提到教會所扮演之訊息傳遞的角色：

過去主要就是事前有開會，找一些年輕人和長輩來討論，另外就是有把訊息發給教會，因為蘭嶼有很多訊息都是從教會那邊得知。

教會在舊世代反核廢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歸納出兩個面向：第一個面向是教會牧師。由於教會牧師作為當地社群的宗教領袖，藉由宗教所賦與的權威感，相對能有效地動員部落族人；此外，成為正式牧師前，必須前往台灣接受神學院的教育，經由教育訓練，牧師可以作為當地社群的知識引薦者，以族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族人有關核廢料的危害，進一步使族人在瞭解議題的嚴重性後，願意起身進行反抗。第二個面向則是，教會作為定期聚會與討論的場域，使得教會成為在地的公共領域。因此，當有任何重要的訊息需要發佈時，教會就成為公共訊息的傳遞站。

（二）家族網絡

除教會系統外，傳統家族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達悟家族是由共同家庭的兄弟姊妹、配偶，以及父母的兄弟姊妹及其子女與配偶所組成，這個親屬團體稱為"zipos"，該群體向心力及凝聚力皆相當高（李亦園，1992）。屬於相同"zipos"

的成員彼此互動頻繁，例如婚喪喜慶、建屋造船、捕捉飛魚時，"zipos"的成員都是主要的幫手（蔡友月，2007）。此種以"zipos"為中心所延伸的家族網絡，在反核廢運動時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動員角色。在各個村落當中，通常有數個家族體系，彼此透過通婚與勞動力的交換，形成錯綜複雜的交互關係，藉由此種關係網絡的運作，不難達成大量動員的效果。

不同於台灣原住民部落有世襲頭目或貴族的階級制度，蘭嶼當地屬於平權社會，決策權力多掌握在島上年紀較長的「耆老」手中。在召魚祭或分享農作物收成的典禮中，都是由耆老來決定家戶所能分得的飛魚及芋頭的比例。在此種「尊老」傳統的影響下，蘭嶼許多公共事務的決策，都是掌握在耆老手上。因此，對於要推動反核廢運動的蘭嶼青年而言，爭取耆老的認同，並且由耆老出面召集家族與部落的支持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對此，在1987年，蘭嶼機場爆發第一次抗議後，當時反核的主要領袖—郭建平與夏曼·蘭波安，便奔走在蘭嶼六個部落，目的就是希望反抗運動能獲得耆老的支持。如同當時曾參與遊說的O2指出：

部落的默契就是說，年輕人不能高過我們的長輩，我們是一個平權社會，但是我們要請教我們的長輩，這樣子可不可以，所以召開會議的時候我們不能先講話，這是我們知道文化很重要的一個倫理

發起新世代反核廢運動的N3，也指出耆老在當地社群中所扮演的決策角色：

耆老很重要，我們這邊的文化就是要尊重老人家，所以長輩講的話，我們晚輩都比較會聽。在蘭嶼的組織文化系統裡面，最後要決定事情的，都是老人。譬如說要分飛魚，就是由老人來分。總之，最後的決策是由耆老去作決定。

從歷史的觀點分析，蘭嶼是從「部落社會」快速進入「現代社會」；因此，進行社會動員時，仍會延續過去的權力架構。亦即，當部落面臨重大的挑戰時，

部落青年會請示長老，並且爭取他們的支持，進一步由長老出面帶領整體達悟族的抗議行動。從第一代反核運動可以發現，透過「耆老」所發起的社會動員模式仍然被沿用。

(三) 小結

蘭嶼孤懸於太平洋外海，地理區隔的優勢使得蘭嶼仍保有相當完整的文化體系。直到1946年，國民政府的勢力進入蘭嶼，雖然帶進現代的官僚體系，例如設立蘭嶼鄉公所與各警察分駐所。然而，關於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卻不是由鄉公所等現代官僚系統為主；相反地，是透過民間（教會）以及部落（家族）的組織系統，由下而上進行社會動員。由此可知，傳統的權力結構仍牽扯舊世代的動員模式。如同長期參與反核廢運動的O7所言，針對反核廢運動，蘭嶼已經建立完整的組織動員模式。

反核廢經過這麼多年，族人間已經建立一個動員機制，只要一有輻射外洩或需要抗爭的場合時，就可以很快動員。

〈圖4-1〉為本研究所整理之舊世代的動員模式圖：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的發起者是部落知青與牧師，他們主要是透過家族與教會系統去動員當地的達悟族人。值得注意的是，透過上述兩大系統所動員的對象皆以達悟人為主，至於來自台灣、非達悟族的外部網絡成員則相對少；因此，抗議的人力有限，每回抗議大約僅能集結200-400人左右，幾乎沒有達到千人以上的抗議規模。人力資源的缺乏，很大程度限制舊世代反核廢運動所能發揮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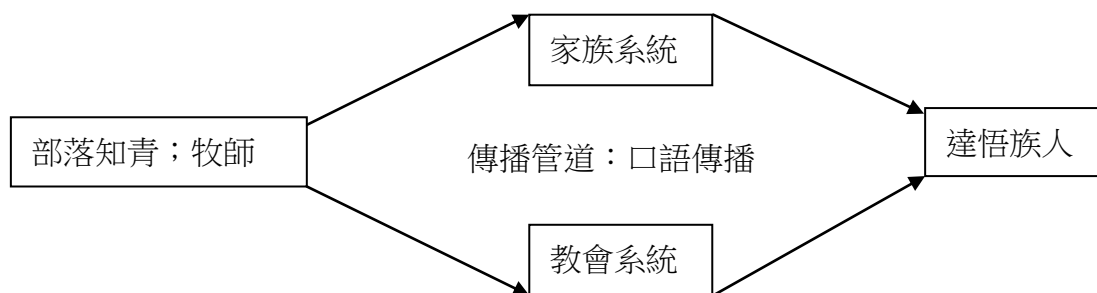


圖4-1 舊世代動員過程分析

為了突破人力資源缺乏的困境，並且擴大運動的影響力，舊世代的反核領袖也會向外尋求台灣本島的學者、記者、甚至是綠色和平組織進行結盟。O2提到：「當時有找綠色和平組織來調查儲存場，希望透過國際組織的報導，增加台灣政府的壓力。」除了國際組織外，學者與黨外團體亦是重要的支持力量，對此，O1表示：「學者、黨外人士、村長、民意代表、耆老不斷開會，並且形成抗爭。」由於舊世代反核運動的社會網絡是以蘭嶼的在地社群為主，因此，尋求黨外與國際組織的結盟，是增加議題能見度、彌補物質與人力資源缺乏的重要策略。針對此點，過去的文獻也認為，對資源匱乏的達悟族人而言，外界團體是提供金錢、人力與媒體宣傳管道的支援（黃彩惠，1990）。

貳、新世代之社會動員

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者於2012年的2月20日、3月11日分別在蘭嶼及台灣發起大規模的抗爭活動。隨著網路世代的接棒，達悟青年開始透過社群媒體的影音分享功能與活動串聯的力量，建構不同型態的反核廢運動。

由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與N3等達悟青年所共同發起的220反核廢抗議，正逐漸展現網路賦權的潛能。首先，在資訊基礎建設完備的情況下，達悟青年將不再受限於地理的阻礙，直接將反核的相關訊息傳達到台灣社會。野銀部落青年N4在220當天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自己與家人參加遊行的過程，隔天，他以【吶喊】為名上傳到YouTube，讓許多關心蘭嶼核廢的網友交互轉貼，進而創造13,688人次的點閱率。透過網路自主發聲的過程，使得許多記者、學者與網友因為網路轉貼的影片與文章，開始關注反核廢的發展。

同年在台北舉行的「重新思考零核電，311 告別核電遊行」，正是延續蘭嶼220的熱潮。N3表示：「透過網路，我們在臉書上丟出訊息，開始有很多人按參加，透過眾人轉貼，越來越多人注意到這件事，行動聯盟也開始成形。」N4對於臉書的串連力量也指出：「透過臉書把訊息散布出去，包含傳給一些旅台的年輕人。以往旅台的年輕人，都很難接觸到，這次都有出現，所以我覺得這次臉書

真的幫很大的忙。」從N3與N4的訪談可以瞭解，透過網路去中心與高度連結的特性，將迅速連結並擴大新世代反核廢運動的人際網絡。

由N3、N4、N5等青年在臉書所發起的「蘭嶼青年行動聯盟〈311反核廢大遊行〉」，共累計有1500餘人參加。分析網路活動頁面的參加成員：有住在蘭嶼的達悟人（包含老中青三代）、旅台達悟人、支持環保的群眾、長期反核的社會運動人士。這些在過去無法直接促達的異質人際網絡，因為網路空間而共同集結，來自小島蘭嶼的反抗聲音，也在擴大了社會網絡之後，獲得廣大的響應。

對於網路集結眾人的潛力，似乎超出N3當初的預測，他表示：「實際參加的人數已經突破我們的預期，原本預期只有三、四百人，後來衝到上千人，也有很多台灣的朋友、旅台的達悟青年都共同響應。」N4也指出：「一開始只是在臉書上開活動，根本沒有預期會有這麼多人參加，有些多年不見的老同學，竟然都出現在會場。」若以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的核心社群約30人進行計算，透過網路集結的力量，使得在台北舉行的311大遊行增加近50倍的支持群眾。

從220或311的反核廢運動可以發現，網路媒體不管是在訊息傳遞或組織動員，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同於過去的社會動員需要經由實體的接觸，新世代的網路動員則可以透過低成本與高效率的特性，在短時間內，集結離散在台灣各處的旅台青年。網路的便利性，讓舊世代的反核廢領袖O2也相當認同：

蘭嶼現在有許多年輕人在台灣，並且分散在各地，從前是透過信任的人，奔走在不同縣市，聚集各地的年輕人。不然就是透過電話，但也因為沒有全部人的電話，那時候又沒有手機，所以很難聯繫全部的人。但現在不一樣，有了網路之後，年輕人只要在網路發布訊息，很快就可以傳給不同地方的蘭嶼人，那有蘭嶼人知道後，又再告訴更多鄉民，所以說網路很方便。

對於旅居台灣的達悟族人而言，網路使得他們可以不用長期關注，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快速瞭解情況。對此，O2繼續表示：「對於學生而言，他們不可能天天去抗議，這時候，透過網路去關心，應該是最好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反旺中或反美麗灣等社會運動，蘭嶼反核廢的人際網絡仍是奠基在達悟社群的基礎上。此時，臉書等社群媒體，是在既有的人際網絡中，進一步發展成線上的關係。因此，分析「分析311反核廢大遊行」的好友群集，將可以發現地緣與血緣仍是組成網絡的主要成分。在此種情況下，臉書是促進社群內部之訊息流通與凝聚共識的重要平台。然而，要發展為成功的社會運動，不能只有內部社群的力量，對於蘭嶼而言，全島人數僅三千餘人，即使全島都加入抗爭，人數上仍然不足。因此，爭取台灣社會的支持，就變成是重要的策略。以311反核運動而言，青年行動聯盟一方面搭上全球反核的浪潮，另一方面則是和「綠色公民聯盟」合作，在多方條件的配合下，才能聚集如此多的支持群眾。

分析311的人際網絡，核心社群是青年行動聯盟，人數約30人；向外擴一圈則是基於地緣與血緣的達悟族人，人數約500人，在這500人當中，又可以區分為旅台與居住在蘭嶼的達悟人；最後則是主流社會的聲援群眾，人數約1000人。詳見〈圖4-2〉。



圖4-2 311反核運動社會網絡分析

網路在蘭嶼青年行動聯盟和達悟族人之間，扮演內部溝通的平台；至於在達悟族與主流社會之間，則是扮演對外發聲與集結公民力量的媒介。如同N5表示：

「前往台灣抗議的達悟族人，應該是歷年來最高。許多散居在台灣各地的達悟人，透過網路與電話的聯繫，彼此聚集。」由此者可知，網路對於人口稀少與高度離散的達悟社群而言，是成本低，但效率高的聯繫工具。〈圖4-3〉是本研究整理之新世代動員過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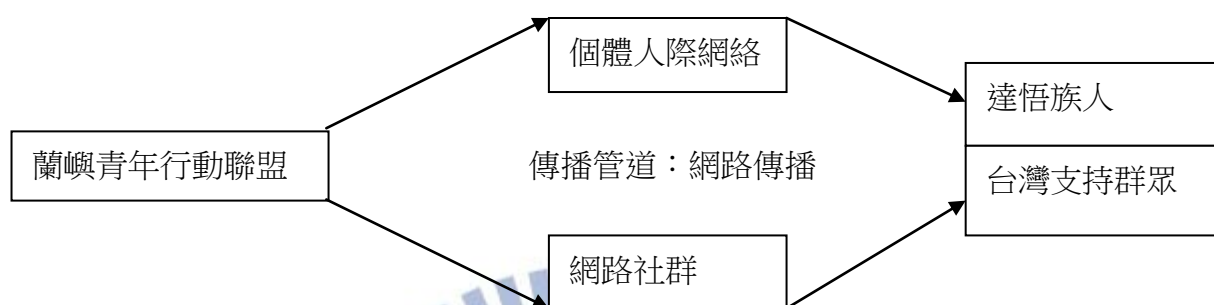


圖4-3 新世代動員過程分析

新世代的反核運動，是以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為中心，透過網路社群與個體的人際網絡，跨越地理限制，向外集結來自四面八方的異質社群。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220或311的反核廢運動，多數受訪者皆提到，他們得知此訊息的管道多來自於臉書的活動邀請，幾乎沒有受訪者是從教會與家族獲得訊息。由此可知，在網路傳播科技的介入後，已經使得傳播管道與社會動員的型態產生轉變：傳播管道逐漸轉往線上，傳統的社會連帶逐漸退位，取而代之的是相對異質的網路動員。值得注意的是，藉由網路所建構的社會網絡較為寬鬆，雖有助於團體獲得外部的訊息與資源，但也因為異質性高，相對缺乏社群成員間的承諾與規範；因此，如何透過網路整合長期而有效的行動規範是後續相當重要的工作。針對行動規範的凝聚，本文將於後續章節進一步討論。

參、小結

不同於環保或人權等以議題為導向的社會運動，蘭嶼反核廢是高度以種族（ethnic-based）及地域（location-based）為基礎的社會運動；因此，抗爭的主體是以達悟人為主。然而，從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經驗可以發現，參與運動的人數

一直無法突破千人，在人數稀少的劣勢下，自然無法撼動政府遷移的決心。對於新一代的反核運動者而言，如何在確保以達悟族作為運動主體的前提下，兼納更多異質社群，並擴大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應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對此，參與2012年的反核廢運動，目前在蘭嶼中學擔任老師的N11表示：

我覺得可以尋找漢人學者的協助，但他只是一個輔助，而不要是一個主體。幫蘭嶼做事的漢人就會很辛苦，因為他不是這邊的人，那外面的人會罵他，裡面的人也會罵他，但他是真心想為這邊奉獻。我覺得位置很重要，可能出頭發言的就給當地人，但漢人可以當智庫或是顧問。

N11的觀點不失為一種思考角度，亦即：新世代反核廢運動者可以廣納更多台灣的學術社群或有心幫助蘭嶼民眾的支持。因為，當既有的人際網絡擴大後，反核運動將能導入更多資源；此外，也能透過更廣泛的人際網絡，提昇議題的能見度。然而，擴大網路的過程，卻必須要注意，核心社群仍然要以達悟族為主體，如此方能確保運動的方向不會失焦。

另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社會運動者不能再將運動範疇限縮於本地，而是必須要從全球的視野中，思考如何進行在地實踐。如同墨西哥的Zapatista運動，當時的策略就是希望透過網路的連結力量，進行全球與在地之間的串連，並且匯聚成一股全球性的「賽伯行動主義（cyber-activism）」。對於蘭嶼社群而言，重要的問題就落在：如何將反核廢的議題框架，從種族與地域基礎的限制中解放，以一個相對高層次的框架，重新定義運動的基調，進而連結台灣主流社會與國際社群的支持。對此，在蘭嶼當地屬於高知識分子的O7和O8都認為可以從「人權」或「社會正義」的角度來重新定調反核廢運動：

未來，反核的基調需要重新定義，達悟人不止是反核，更是爭取國際的人權。如果從人權的角度出發，反核就只是整個大架構的其中一項，只有立基在這個層次上，才可以把蘭嶼目前遇到的各種問題，譬如說生態、醫療，作一個整體性的思考。

----O7

其實，我們可以將反核廢運動提高到更高的層次，就是社會正義的層面。我們身為中華民國的公民，理應受到平等的對待，但政府在這件事情上，並沒有作到公平、公正，以及比例原則。蘭嶼人的反核，除了從環境正義的角度去思考之外，社會正義也是我們需要去追求的，我們需要受到平等的對待。

----O8

擴大論述框架之後，目的即是要連結國際社群的支持，對此，許多達悟族人已實際在進行國際串連的工作。現任朗島國小校長的O8，曾在2012年9月，邀請日本學者中生勝美與加藤洋到蘭嶼的朗島國小進行輻射線檢測。由於檢測的學者是國際第三方，因此容易吸引台灣主流媒體的關注（報導的媒體有：蘋果日報、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等）；此外，也因為議題提昇到國際矚目的焦點，相對能給予台灣政府更大的壓力。對此，O8繼續表示：

因為中生勝美是日本第三方的學者，他領的是日本的研究經費，跟台電和蘭嶼之間又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所以他的研究報告，對於台電的殺傷力就會越大。當有第三方的研究數據和你不一樣時，你如何去說服國內的民眾？從這次的經驗可以發現，原本已經冷下來的議題，透過新聞報導之後，可以增加台電更多壓力。

從O7和O8的訪談中可以瞭解，目前蘭嶼反核廢運動的首要任務是提升議題的論述高度，例如連結「核電歸零」、「非核家園」或「社會正義」等。如此才會使台灣社會的民眾能意識到反核廢運動也是切身相關的議題，進而加入聲援的行列。此外，連結國際學者與非政府組織（NGO），一方面能增加台灣主流媒體的關注，另一方面也能透過國際社群的支持，給予台灣政府更多的壓力。

關於蘭嶼反核廢運動的社會網絡，尚有一點可供思考：今年所成立的「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究竟要保持非正式與相對寬鬆的社群關係，亦或是要訂立組織規範與分工體系，朝向建置化的方向。對此，蘭嶼青年之間尚未有共識，有成員認為不要走向建置化，要持續保有彈性與機動的角色；也有人認為，為使運動能

長遠走下去，設立正式的非政府組織會是最好的辦法。對此，在部落文化基金會擔任義工，同時也是青年行動聯盟成員的N1表示：

非正式組織的優點就是機動性與行動性，成員只要在網路上丟出訊息，或是透過手機連絡，都可以在很快速的時間內達成動員的效果。但成為正式的組織，就有可能會受到組織的控制，行動上就相對綁手綁腳。

青年行動聯盟成員，目前在紅頭部落經營咖啡店的N5則認為，成員都有自己的工作，假如聯盟正式成立，有了明確的分工後，會讓其他的年輕人反而卻步：

還是要顧慮到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如果變成一個組織，那就要分工，擔的責任也比較大，怕會因此讓更多有志趣的年輕人卻步。所以，目前還是傾向維持相對鬆散的結構。

對於是否邁向制度化的非政府組織，參與成員和核心幹部之間的看法有些許的不同。目前擔任青年行動聯盟發起人的N3，從經費與組織延續性的方向去分析聯盟目前的處境，N3表示：

目前島上加入的年輕人大約有50幾位，但是定期參與的也不會超過30位，因為還是沒有明確的組織規範出來，所以我們還是比較鬆散一點。以長遠來看，還是要有組織和經費，所以立案是必要的。不然會變成有活動才出來，就好像點綴性的，我覺得是沒什麼作用。

由於蘭嶼青年行動聯盟是在220與311運動之後才逐漸形成的社群，可以說是先有活動後有聯盟。在此種情況下，因為活動機緣所結合的成員，目前仍然在思考是否要將「青年行動聯盟」朝非政府組織的方向前進。值得注意的是，新世代的成員已經能積極地利用網路去傳遞訊息，並且維持社群的運作。目前青年行動聯盟在臉書有成立不公開的社團，主要是發佈訊息和提供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動。由此可知，網路不只能對外（out-reach）動員聯盟外部的達悟族人以及主流社會

的群眾，就連對內（in-reach）也能促進社群內部的訊息流通，並且維持社群的正常運作。對此，N5指出：

青年行動聯盟之間有在臉書開一個不公開的社團。相關的訊息會發布在社團，並且藉由討論頁面，先行在網路上彙整彼此的初步共識，例如集會地時間、地點、討論的議題等。當在網路上有初步共識時，在會議前會再用手機通知每一位青年來參加。

總體而言，網路對於新世代的反核運動者而言，帶來四項正面效益：首先，網路使得新世代的反核運動可以跨越地理限制，直接聯繫到離散在台灣旅台青年。第二，網路可以增加反核廢運動的異質性，使得運動得以從種族中心（ethnic-based）解放，成為一般台灣民眾也能關切的議題。第三，網路可以促進跨國網絡的形成，促使反核廢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第四，網路對於青年行動聯盟的內部社群而言，則是能促進訊息的傳遞，作為彙整初步共識的平台，並且維繫社群的運作。

第二節、行動規範與世代規範

除網絡之外，本文所關注的第二個面向是社會資本的規範。依據前述文獻的整理，本文所定義之規範是指：反核廢運動的社會網絡內所蘊含的信任、互惠關係與強制性的道德約束；規範來自於傳統的達悟文化，但同時也包括其他參與反核廢抗爭的公民團體或網路社群的行為規範。此外，基於達悟族傳統「尊老」的習俗，本文將在行動規範的範疇之外，另外討論「世代規範」對於反核廢運動的影響。

壹、舊世代行動規範

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的主要領袖是教會牧師與部落耆老，反抗運動受到宗教與傳統文化的雙重影響，因而能形塑較高的行動規範。分析宗教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發現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是以教會為核心，進一步凝聚族人進行抗爭；因此，

基於宗教連帶的互惠與信任關係是相當緊密的。對此，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同時也參與反核廢運動的O4就表示：

教會去整合。一些有知識，有信仰的人會站出來統整大家的意見，如果今天我們沒有信仰，我們就會散成一堆，因為有信仰，島上才容易形成共識。

從O4的觀點中可以發現，信仰能夠凝聚島上的共識。而信仰之所以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實與蘭嶼對於舊有社會結構的羈絆有關。由於地理區隔的特性，使得蘭嶼島上大多依循傳統達悟族的生活方式。如同涂爾幹對於「機械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的分析。機械連帶是基於相似性（similarity）的連結，主要的特徵是，社會成員間的個別差異小、集體的成員有類似的特質；社會成員的情緒感受相似，價值觀相似，具有相同的道德規範，重要的是，整體社群完全受到集體意識的支配。根據涂爾幹的分析，屬於「機械連帶」的社會文化，將能凝聚高度的社群規範（蔡文輝，200）。循此，蘭嶼達悟族基於部落相互分享的文化，相當程度影響成員之間對於反核廢運動的共識。對於文史有研究的O7從捕飛魚和種芋頭的文化傳統進行分析：

達悟族的傳統是彼此分享，因為捕飛魚是以家族為單位，抓到的飛魚要共同分享...種芋頭也是，有慶典的時候，芋頭要拿出來分送給部落的成員。因此，反核運動大多依照傳統的文化規範，當族人都在努力時，其他人也要站出來盡一己之力。

綜合以上，針對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由於發起者是部落耆老與教會牧師，在家族與信仰的雙重影響下，形成高度封閉與階層關係鮮明的社會網絡，因而能凝聚相當高的行動規範。值得注意的是，教會扮演整合當地居民的重要角色，透過教會，使舊世代的反核運動者能更有效地進行集體動員。然而，也因為社會網絡高度重疊，使得集體意識的主宰力量太過強大，如此將有可能回頭壓制每一位個

體的自由意志。受限於傳統規範的影響，使得許多新一代的年輕人，不敢直接在長輩面前表達意見，進而阻礙整體達悟社群採納新想法的可能。針對此點，本文將於後續進一步討論。

貳、新世代行動規範與世代規範

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是透過網路迅速集結人群，群眾之間所形成的是短暫而有效的行動規範，特別是311反核大遊行，眾人在約定的時間走上街頭，提出共同的訴求，顯示網路在相當程度能整合高度異質的群眾，並且促成集體行動。然而，長期的社會運動需要社群成員的承諾及參與，網路雖能在短期內集結大量的群眾，但由於彼此缺乏承諾，相對難以建立長期而有組織的規範。對此，N3表示：「青年行動聯盟只在網路上，還沒有正式成立，不具組織性，後續還有經費等許多問題。」

組織鬆散確實是新一代反核廢運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回顧第一代的反核運動，由於支持力量是教會系統與家族網絡。因此，相較於立即但鬆散的網路動員，過去的反核運動從擬定媒體策略、挪用文化符號到國際組織的結盟，都有進行完整的規畫。即使當時的時空脈絡缺乏自主發聲的媒體資源，但卻以長期抗戰的姿態，努力不懈地進行抗爭。反觀先有活動再形成組織的青年行動聯盟，相對缺乏長程規劃、明確的組織章程、以及更重要的經費挹注，因此能否凝聚高度的社群規範，進而持續推動反核廢運動，仍有賴未來持續觀察。

除了行動規範外，另外則是達悟新舊世代之間所共同協調的「世代規範」。在蘭嶼的傳統文化中，非常重視長輩的意見，因此對於年輕人而言，即使曾到台灣接受教育，帶回最新的知識，但礙於傳統文化，青年的意見仍很難被採納，眾多新世代的受訪者皆提到「年輕人相當難出頭」的想法。對此，擔任新世代反核廢領袖的N3認為：

在部落裡面，非常尊重長幼有序這個觀念，許多話題、公共議題，年輕人聲音的份量較輕，不容易被長輩所接受。

在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中，「尊老」的傳統仍被當時的運動領袖所接受，因此，他們會花時間與耆老進行溝通，並且希望由長輩出面帶領整體的達悟民族。然而，此種「尊老」的傳統，遇上接受現代教育與網路文化薰陶的年輕世代時，卻逐漸產生扞格，甚至是世代間的矛盾情結。對於達悟青年而言，他們想要承接反核廢的腳步，但，礙於傳統文化，實際上並無法一展長才，只能默默等待時間的推移，等待他們也變成「老一輩」的時刻。對此，作為蘭嶼青年行動聯盟核心幹部的N5悲觀地表示：

我們年紀太輕，說的話、表達的意見比較難被老一輩的接受。所以青年還在等待，希望有更好的時機點可以發揮。

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目前在蘭嶼中學擔任老師的N11，對於世代之間的矛盾情結也是相當悲觀：

島上有尊重老一輩的傳統，就是在抗議現場的時候，他會覺得你不要插手，因為你還不懂事。那年輕人心底就會有顧忌，所以也不會主動去干預一些事。可能要有一個正式的場合，大家老中青一起來對話。曾經有過這個場合，原本的用意是要凝聚島上的年輕人來解決一些共同的問題，可是到現場之後，還是分老一輩的場和年輕一輩的場，實際上並沒有解決兩代之間的問題。

呼應N11的論點，反核廢運動在新舊世代之間，應該要有更多對話與互動的場合，藉以銜接世代間的鴻溝。對此，部落文化基金會已經意識到這項問題，並且也透過臉書的活動頁面，趁著春節，多數旅台青年都回到蘭嶼的機會，舉辦「島嶼論壇」。目的就是希望新舊世代可以有對話的場合。雖然N11在受訪時表示，該場合還是會分成「老一輩」與「年輕一輩」的場；儘管如此，世代間的對話至少跨出第一步，至少蘭嶼已經緩慢開始世代交替的工作。對此，N3表示：

從一些老照片可以發現反核前輩年輕的模樣，然後再看2011年12月30號那次北上，從電視畫面就可以發現，這些長輩老了，也累了。作為30多歲的年輕人，是時候要站出來幫忙了。那他們也很欣慰，看到有一些年輕人開始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許多蘭嶼的議題仍無法以面對面進行溝通，因而會轉往網路進行抒發。對於達悟青年而言，網路空間是強調長幼有序的部落文化之外、年輕人討論與形塑共識的平台。N3繼續提到：「在網路上，年輕人可以比較強勢，因為中生代接觸電腦的機率不高，因此在網路上公共議題的討論，參與的大部分是年輕人。」從2012年的反核運動來看，許多青年的想法與意見多是在網路上提出、討論、匯整共識、展開行動；在此，網路是另類的公共領域，藉以形塑新一代的反核訴求。

參、社群規範的衰退

蘭嶼達悟族受到國民政府諸多錯誤政策的影響，因而導致整體社群規範的衰退。例如，1966年，政府修訂「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增列「平地人企業必須報經核准方得租用或使用山地保留地」的條文。隨著此條文的修訂，等同於打開漢人「錢進」蘭嶼的敲門磚：貨幣經濟的介入，迫使越來越多達悟人為賺取生活所需的貨幣，捨棄原有捕飛魚和種芋頭的生產型態；同時，因為島上並未有穩定的「就業市場」，使得許多達悟青年必要前往台灣，以基礎勞動，換取微薄的薪水。因外部因素而高度離散的達悟社群，除了不利反核廢運動的推行，更嚴重的是，不斷擺盪在台灣與蘭嶼之間，也造成蘭嶼青年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異化

(Alienation)，進一步形成整體民族的「去社會資本化(social decapitalization)」。

除此外，隨著蘭嶼與台灣的互動越來越頻繁，許多不屬於蘭嶼原生文化的「壞習慣」（例如香菸與酒）也順勢進入蘭嶼社會。許多令人尊重的耆老，都染上菸癮與酒癮。以筆者自身的觀察，不論是在蘭嶼的農會超市前，或者是各部落的雜貨店，都可以看到菸酒不離手的老人家。這種情形，著實與訪談中，多數蘭嶼居

民所尊重的耆老形象有所出入。或許正如一位匿名的受訪者分析，相關文明產物的介入，不僅摧毀老人家的尊嚴，同時也削弱反核廢運動的能量：

耆老還是很重要，但文明生活進來之後，就產生很大的改變。過去的日子很有秩序，日作而作，日落而息，可是現在，菸和酒影響了耆老，他們再也不上山工作。每天渾渾噩噩過日子，過去讓我們很尊重的耆老，現在竟然變成這個樣子。所以我們都很懷念過去，老年人讓我們很尊敬、很景仰的時日。

從「前現代」進入「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必須面臨許多認同與價值觀的衝突。例如：傳統達悟文化並沒有文字系統，造成許多達悟孩子在進入現代教育體系學習文字時，遇到相當大的挫折。比起漢人，達悟孩子在學習時，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主流社會那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遊戲規則並不見得適合達悟社群。在學習意願普遍低落的情形下，達悟族很難在就業市場中謀得相對有利的位子，遂造成整體族群在社會結構的底層徘徊。

處於社會結構的弱勢，為何會影響到反核廢運動的互惠與信任關係？這就必須要回應到台電公司的「補助金」政策。

台灣電力公司為了爭取蘭嶼居民同意核廢場繼續留置，提供大量的補助津貼：除匯入每一位鄉民戶頭的「回饋金」外，尚有電費減免、教育津貼與醫療補助等。諸多的補助，使得許多蘭嶼居民在長期享有之後，對台電形成依賴。部分居民，例如民宿業者N8在訪談的過程中即表示：「為了繼續享有補助金，希望在確保核廢料安全無虞的情況下，同意儲存場繼續留存。」因為補助金的發放，使得原本對於反核具有共識的達悟族，逐漸出現歧見，並且進一步削弱族人之間的共識。補助金所影響的範疇，已經擴及到許多的面向，就連積極反核的O7，也在抗爭始終未有斬獲的情況下，有條件同意核廢場繼續留置：

核廢料在蘭嶼既然搬不走，那乾脆大家坐下來，針對這一件事情，討論出一個結果。我個人覺得第一個條件是，台電必須百分之百確定沒有輻

射外洩的疑慮。第二，3800多名達悟人，每兩年作全身性的健康檢查。第三，由台電出資，在蘭嶼成立綜合型的大學。第四，由台電和全體蘭嶼村民進行簽約，以十年為基準。這十年，提供地方硬體與軟體的經費需求。

針對補助金所引發的爭議，作為舊世代反核領袖的O1就感嘆地說：「現在要反核就反不起來了。因為大家都沒有錢繳電費，台電就用補助金來塞住反核的力量。」無獨有偶，部落文化基金會的秘書長N6也表示：「現在已經不再有人反核，很大的理由是，如果沒有台電，我們就什麼補助都沒有，我們可能會退到40年前的生活方式，繳不起電費，也繳不起健保費。」由此可知，達悟族人在快速進入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後，囿於教育與文化的衝突，被迫徘徊在社會結構的底層。結構上的弱勢使得原本具有高度共識的達悟社群開始產生分歧。正如同原民台記者N2的分析：

我們過去的經濟作物是地瓜和芋頭，可以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後，主要的收入來源變成『孫中山先生(貨幣)』，台電這邊又介入去發放補助金，所以部分族人就會慢慢鬆懈。有些族人就會說，就讓它繼續留在這邊，這些人主要都是因為經濟收入比較差。可是比較差的原因又是文明社會進來之後，導致傳統的勞動能力下降。

N2的分析指出一項重點：那就是蘭嶼在進入文明社會後，因為諸多衝突，導致傳統勞動力的下降。新一代的蘭嶼人已經無法再單純依賴捕魚和種芋頭來維持生計。現實的情況是，需要「貨幣」來維持生計。台電公司即是針對此項結構的弱勢，以補助來爭取核廢場繼續留置。在此項政策的介入後，不僅影響反核廢運動的共識，就連達悟社群，也在長久的影響下，逐漸分裂，進一步形成族人之間彼此的不信任感。如同N11指出，島上目前已經分成「擁核」與「反核」兩派：

今年220以前，島上其實分成兩派，一派是贊成核廢料留下來，因為有錢。那另外一派就是強烈要求核廢料必須遷走。一旦內部有分歧，其實要做事很難。

至於目前在部落文化基金會擔任秘書長的N6則是發現，補助金的爭議已經造成島上的不信任關係，根據她表示：「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彼此之間的不信任感非常強烈」。另外，這種不信任感對於推動反核廢運動的主要成員而言，也會面臨來自社群內部的質疑，許多族人甚至會當面問反核運動的領袖：「台電公司走了之後？你要養我們嗎？」對此，N3感嘆地說：

一講到錢，大家又會依賴，有人就會認為，核廢料帶來好處，為什麼要把他趕走。其實在年輕人之間，也有一些歧見，住在台灣的人幾乎都是堅決反核；但住在島上的，可能經濟比較弱勢，所以就會需要回饋金和補貼來維持日常生活，所以說相當矛盾。

同樣身為幹部的N5也有相似的感觸：

現在最大的顧慮就是回饋金，一扯到錢，島上很多傳統的想法或價值，就會受到改變，很多居民對於政府就會產生依賴和不勞而獲的心態。所以回饋金這個東西，對於島上真是很傷！像我們站出來反核，可是島上就很多人會質疑我們，覺得核廢場遷走之後，是不是就少了工作機會和生活補助。

蘭嶼反核廢在社群規範的面向，遇到許多結構上的阻礙：由於經濟資源的缺乏，因此部分弱勢的居民是高度倚賴台電公司所提供的補助金。藉由補助金引起內部社群的對立，長遠下來，將削弱反核廢運動的共識，甚至侵蝕整體達悟族的信任關係。而這種分裂，對於達悟族而言，實為不可承受之重，畢竟在國家錯誤政策的影響下，不僅失去民族的健康權，就連原本所自豪的分享與信任的文化，也面臨著相當大的衝擊。

肆、小結

總結上述，在行動規範的面向中，對於舊世代而言，由於發起者是部落耆老與教會牧師，在家族與信仰的雙重影響下，形成高度封閉與階層關係鮮明的社會網絡，因而能凝聚較高的行動規範；然而，對於新世代的達悟青年而言，傳統規範在現代教育及資訊教育的影響下，鮮明的階層關係已逐漸式微，平權思想正緩慢興起。值得注意的是，網際網路帶來的聯繫管道，使得達悟青年得以集結眾多四面八方的支持群眾、提高議題能見度，但成員的異質性卻不利於凝聚長期而穩定的集體行動規範。

至於世代之間的規範，本文發現，蘭嶼「尊老」的傳統仍深層地影響不同世代的反核廢運動。對於舊世代反核運動者而言，即使他們相對於當地的耆老更瞭解核廢料的議題，但，他們還是會透過各種方式，說服長老出來帶領全達悟族的抗爭，由此可知，早期反核廢運動的社群規範仍受到部落的權力結構所影響。對於新世代的領袖而言，即使他們所接受的是相對平權與開放的現代教育，但是他們在面對部落的長輩時，仍然拉扯在傳統文化的限制之中。許多年輕人都有想法，但始終不敢在面對面的場合中與長輩討論。如何在新舊世代之間協調出集體行動的共識與規範，是未來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第三節、反核廢運動之資源

根據前述文章的脈絡，本文已經分別整理網絡與規範兩項構面。對於社會資本而言，每一項構面的變化，都將牽動整體的資本的改變。例如：舊世代反核廢運動是透過教會與家族系統進行社會動員，因此整體的社會網絡相對封閉，並且高度以種族及地域為核心。在此種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的社會網絡之中，將能形塑高度的社群規範。相對的，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則在網路的輔助下，能夠跨越地理侷限，直接連結到台灣的社會網絡。從311反核廢運動中可以發現，參與抗議的人數為歷年最高，達到一千五百人，而這個數字，是舊世代從未達到的規模。當原有的社會網絡擴大之後，血緣與地緣的影響力就會逐漸被稀釋，使得新世代

的反核廢運動所能凝聚的社群共識相對薄弱。從上可知，網絡與規範之間是相互連動的狀態。

相同的邏輯，資源的變化也會牽扯到其他構面的變動。如同前述，達悟族長期處於經濟資源的劣勢，再加上補助金的介入，更使得原本具有高度共識的反核廢運動，開始產生歧見，並影響到整體達悟社群的信任關係。由此可知，資源的多寡也牽引著反核廢運動的改變。

單就社會運動而言，資源所指涉的範疇並不只是經濟資源，尚有其他類型的資源也相當重要。根據本文的整理，所謂的資源泛指：達悟族人在反核廢運動當中所能挪用的文化、物質與人力資源。文化資源則包含達悟族的傳統知識、現代知識以及數位知識；物質資源包括運動所需的經費與設備；；力資源則是籌畫社會運動的工作人員與參與抗議的民眾。以下，本研究將根據不同世代所運用的資源型態，進行詳細的介紹。

壹、文化資源

反核廢運動需要挪用各種型態的文化資源進行對抗，大抵而言，可以將文化資源區分為傳統知識、現代與數位知識兩個範疇。

（一）傳統知識

蘭嶼孤懸於太平洋外海，在地理區隔的影響下，鮮少與文明世界有所接觸。因此，對於老一輩的達悟族人而言，文字，甚至是科技產物都是相當陌生的概念。相對於低度發展的蘭嶼島，「核能」是位於科技光譜的另一端，屬於高度工業發展下的「文明產物」。當核能工業末端的核廢料，遇上遺世獨立的達悟族時，其中所面臨的溝通阻礙與衝突，實不難想像。

1980年，當核廢料儲存場在島上興建時，當時的施工單位對達悟居民聲稱他們要蓋的是罐頭工廠，而運送核廢料的港口是軍用碼頭。由於老一輩的達悟族人並未有足夠的知識去判斷政府所言是否屬實，因此也只能被動地接受。然而，隨著有越來越多的達悟青年前往台灣接受現代教育，知識使得蘭嶼青年開始瞭解核廢料對人體所可能產生的侵害，因此在1987年爆發了第一場反核廢抗議。

對於舊世代的反核領袖而言，由於他們所接受的是現代教育，因此在相當程度上仍可以理解核廢料對人體的傷害。但，對於多數未曾接受現代教育的達悟族人而言，如何以族人能懂的語彙進行溝通，便是相當重要工作。由於達悟傳統文化並未有「核能」或「核廢料」的詞彙，當時所使用的策略是挪用（appropriate）傳統信仰的「惡靈（anito）」向部落耆老進行溝通，透過連結既有的文化資源，賦與核廢料在地的意義。對此，擔任舊世代反核廢運動領袖的O1表示：

核能廢料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困擾，因為這是高科技的名詞，我們講不清楚，你跟你阿公阿嬤講，他也不懂。所以我們就把它轉換成惡靈、毒藥。蘭嶼人知道什麼是惡靈、毒藥，所以就容易形成群體抗爭。

藉由挪用達悟母語中的「毒藥」與「惡靈」，將能有效進行內部溝通並動員部落群眾。而透過連結傳統文化，也使得反核廢運動逐漸內化到達悟民族的核心思維。直到1990年，反核廢運動開始突破科技語彙的侷限，轉而由內而外地喊出屬於達悟母語的「不要核廢料（都夏 咕蘇力！）」。「都夏」翻譯成中文可以理解成「不要」；而「咕蘇力」則是泛指對人體會產生不良影響的化學物質。〈圖4-4〉為本文作者在蘭嶼核廢料儲存場外所拍攝的照片。



圖4-4 核廢料儲存場外的抗議標語

如同知名社會學家 Manuel Castell所言：「語言是文化的直接表現，也是文化抗戰中的戰壕、自我控制的堡壘、以及可識別意義的避難所。」（轉引自Lee,

2006) 本研究發現，當達悟族開始透過自身的語言進行抗爭，確實是彰顯整體民族自主性的重要策略。除語言之外，達悟族男性在特定的場合中，會穿著藤甲編織的「戰服」，一同振臂搖拳，並且面露猙獰的表情，目的就是要驅除惡靈，並且提昇同伴之間的士氣。此種文化傳統，也進一步被挪用至反核廢的抗議現場之中。

〈圖4-5〉擷取自關曉榮《國境邊陲》紀錄片片段。分析這幅圖像，抗議的族人會拿一支類似漁槍的木棒，木棒本身並不是用於戰鬥，而是在象徵意義的層次上，用來驅逐惡靈。此外，參與的男性會頭戴藤帽，身穿藤甲，這套「戰服」同樣具有象徵的意義，目的是要連結達悟族豐富的文化傳統。最後，達悟男性之間會振臂搖拳，表情猙獰，目的即是在驅逐惡靈（核廢料），並且提昇同伴之間的士氣。



圖4-5 達悟族前往抗議時的裝備

本文發現，不論新舊世代，都會挪用傳統文化的符號，並且進一步運用在反核廢的抗爭之中。此種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連結關係，相當有助於提升反核廢運動的能量；對此，參與今年311反核廢運動的N3也表示，雖然要到台北去抗議，舟車勞頓，但他還是會將部落的傳統服帶去，因為穿著傳統服可以帶給他很大的力量：

藤帽和盔甲我就帶了兩套上去，穿上戰服，就感覺很有使命感，彷彿背後有一股力量在支持你，它讓我知道，這是文化延續很關鍵的戰役。

儘管達悟傳統文化能夠給予族人在精神上的鼓舞，但單有傳統文化的支持仍然不足。社會運動需要論述，不論是科學證據，或是族群正義，這些在建構「對立論述（counter-discourse）」的背後，仍需仰賴扎實的現代教育支持。對此，不同於豐沛的文化資源，達悟族囿於教育的衝突（對文字與數字的不熟悉感），因此相對缺乏建立論述的人才。對此，本文將於文化資源的第二部分，繼續討論現代教育的影響。

（二）現代教育與數位知識

蘭嶼的現代化教育，可以回溯至1924年，日本殖民政府在紅頭村設立「番童教育所」，此教育機構的設立，可以視為蘭嶼進入現代教育體系的開端。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台灣。隨著國民政府的勢力進入蘭嶼，執政當局開始推行六年的國民義務教育。一直到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1969年，蘭嶼國中在紅頭試辦，隔年在椰油正式設校。此時，完整的漢化教育，一方面帶給達悟孩子現代化的知識，但另一方面卻摧毀達悟族長久以來的知識體系。交織著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在1960年代以後出生的孩童，將能接受九年完整的義務教育，而現代知識的提升，也供應他們未來在台灣求學時所需要的養分。

分析第一代反核廢運動的領袖，年紀大約在50多歲左右，從時間軸的概念回溯，正好是1960年代，接受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學生。現代知識的培養，使得他們有能力可以到台灣繼續接受神學院或大專院校的教育。儘管學習相當辛苦，但教育的成果仍然具體地展現於舊世代的「達悟知識青年」身上。例如：舊世代反核領袖可以運用族人能懂的語言，解說核廢料所產生的傷害；或者，他們也可以透過文字投書，爭取在主流媒體曝光的機會。這些社會行動，都不能單純仰賴傳統，而是要兼容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知識。

除現代教育外，1990年代初期，網路風起雲湧，逐漸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對於台灣教育家而言，他們看到網路是未來必然的趨勢，因而著手推動全國，包含離島地區的「資訊教育計畫」。根據教育部的資料顯示，1996年6月即已完成台灣本島各國中小學的電腦與網路建置；因此，蘭嶼的孩子就讀國中或高中時，多數能接受完整的資訊教育（教育部，2008）。

對於新世代的達悟青年而言，他們所接收的是現代教育及資訊教育的洗禮，因而相當程度改寫原本所擁有的資源型態。文化資源即是其中一項轉變：有別於傳統捕魚及造船的知識，21世紀的達悟青年更能掌握基礎的數位知識，例如N4能透過基本的錄影設備，製作反核廢運動的紀錄片〈參見圖4-6〉；N3也能透過臉書進行社會動員〈參見圖4-7〉。由此可知，達悟青年的文化資源已經逐漸從傳統轉往數位知識。不同於舊世代反核廢運動，數位思維將能幫助新世代的反核運動者能深化、甚至開創更具有創意的反抗運動。



圖4-6 220反核廢紀錄片【吶喊】



圖4-7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311反核大遊行〉活動頁面

值得注意的是，數位知識雖能幫助新世代的達悟青年開創不同型態的反核廢運動。但運動不能只有訴求，還要有更高層次的運動論述，例如從環境汙染的角度，質疑台電管理不周；或是，從族群正義的角度，要求政府公平對待達悟民族的生存權。惟有提高論述的框架，才能增強整體運動的正當性（legitimacy）。對此，擔任新世代反核廢運動主要幹部的N5表示：

反對運動不能只是上街頭抗議，那樣人家只會把我們當暴民，更重要的是要提出證據。我目前在閱讀人為輻射估60與癌症的直接關聯。因為島上有許多民眾，直接把近年來癌症增加的原因怪罪在核廢料上。但我覺得不能只是空泛地指控，更重要的是直接的證據，找出哪些病因確實是因為核廢料而造成。

此外，在部落文化基金會擔任志工，同時參與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的N1也表示：

去街上隨便問一個人，什麼是「核廢料」？它的成分是什麼？一般人可能都很難回答你。因為知識不夠，什麼是鈷60，我們也沒辦法講清楚，只知道那是對人體不好的輻射。當務之急就是要加強知識的厚度，因為有了知識之後，我們的抗議才會有後盾。

儘管有許多受訪者皆表示，加強知識的深度是目前反核廢運動中，相當重要的工作。然而，從與受訪者的互動中，不難察覺他們對於艱深科學知識所產生的焦慮。對於許多達悟族人而言，礙於語言上的轉換，能流暢閱讀一般的文章即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何況是閱讀艱深難懂的科學文獻。如同朗島國小校長O8分析：

要抗爭，就必須要有確實的數據，當我們能證明台電有輻射外洩，並且在長期中導致嶼癌症比例的升高，當我們有這些數據之後，講起話來就

是鏗鏘有力。但以我是雅美人來講，我不是核能專家，所以我需要有專家來幫我進行判讀。

就連從小在蘭嶼的成績都是第一名，後來如願考上台東女中，並且進入台灣師範大學就讀的N11也有相同的想法。她表示：文化的差異，使得她在與漢人互動的時候，相對缺乏辯論與據理力爭的自信：

要我跟著主流社會的那套遊戲規則玩，我就怕被質疑，畢竟我的文字駕馭能力沒有漢人那麼好。因為我們時常要在母語和漢語之間轉換。

總結以上，在文化資源方面，舊世代缺乏解釋「核廢料」的溝通詞彙，因此策略性地挪用傳統的惡靈符號進行抗爭。對於新世代而言，成長過程中所學習的數位知識，使得他們能開創有別於以往的動員型態與抗議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新世代反核廢運動者多表示他們要加強論述的深度，但實際的執行上，卻礙於文化資本的門檻，而產生集體性的焦慮。就連屬於當地高知識分子的國小校長和中學老師，也都表示他們對於學習相關科學知識的障礙。對此，作為新世代的反核運動領袖應該思考，如何導入國際與台灣具有相關知識背景的學術團體的支持。畢竟，社會運動應該是分工的體系，而不能只依靠達悟族人去負擔所有的工作。

貳、物質資源

對於長期的社會運動而言，不僅要有文化資源作為後盾，從實際的層面觀察，運動仍然需要設備與經費的挹注，如此才能成功地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然而，如同本文在其他章節對於社會結構的討論：蘭嶼在快速進入資本主義的社會後，礙於文化衝突與生產型態的改變，因而長期處於經濟資源的劣勢。除此之外，蘭嶼也受制於地理區隔，多數商品都需仰賴台灣進口，因此高度缺乏運動所需的物質資源。對於舊世代反核運動而言，相關物資的缺乏，在很大的程度上都限制運動的推行。例如台灣抗議場合常見的標語、海報，在蘭嶼幾乎買不到材料，蘭嶼

甚至沒有書店和文具行可以購買。面對此種情形，舊世代的反核運動幾乎是在極度缺乏物質的情況下推行。對此，參與舊世代反核廢運動的O4就指出：

其實大家都很想參加反核廢運動，可是有些族人需要上班，要到台灣賺錢，那再來就是，我們的大台車輛也是有限，如果他可以來的話也是可以，但車子會不夠多。

至於新世代反核廢運動，雖然物質資源相對不缺乏；但，推行運動的組織是否有穩定的經費支持，仍是影響運動持續的關鍵。對於新成立的青年行動聯盟而言，「錢」的問題仍考驗著新世代領袖的智慧。對此，擔任核心幹部的N3認為：

抗議還是要有組織和經費，我認為，可以設計反核的衣服來義賣，如果有些資源的話，我們會盡量爭取。假如每次都要大家自掏腰包，加上大家收入都不是很穩定，連續幾次抗爭，大家就會受不了，失去熱情。

從N3的訪談中可以瞭解，推行社會運動需要熱情，但只有熱情仍然不足，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仍要有穩定經費的挹注。對此，反核廢運動可以向大眾尋求募款，或是設計反核的衣服來義賣，這些都是可行的方式。假如每次都要成員自掏腰包，長久下來，成員就會失去熱情，進而影響整體運動的凝聚力。

參、人力資源

除物質資源外，人力資源也是影響運動的關鍵。根據蘭嶼鄉公所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蘭嶼的達悟族的總人口數約為3200餘人，該人口數相對於台灣的多數族裔，例如閩南人或客家人，實屬人口相當稀少的族群。然而，對於社會運動而言，不論是在抗議的現場，或是長期投入組織運作的幹部，都是需要大量人力的支持，對此，達悟族先天就受到人數稀少的限制。除此之外，由於蘭嶼島上並未有穩定的就業市場，因此許多青壯年人口必須要到台灣謀取生活。例如居住在朗島村的青年N10，就因為家庭的經濟因素，在國中畢業後就要前往台灣工作，一

待就是三年。對於N10而言，即使想要投入反核廢運動的行列，但礙於工作，並無法以實際的行動支持。對於青年人口外流的情形，N10表示：

蘭嶼有人口外移的問題，現在年輕人大部分都跑去台灣工作了，朗島甚至一半以上的年輕人都這樣。因為老人家會希望年輕人出去，蘭嶼這裡的工作機會太少了。

蘭嶼當地缺乏就業市場的情況，產生蘭嶼當代的離散社群，N10的例子並不是單一個案，從他的生命經驗中，著實反映數個世代的蘭嶼青年的經歷。此種不斷擺盪於台灣與蘭嶼之間的情況，不但會造成個人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斷裂，甚至，會影響到整體達悟民族的社會資本。對此，在東清村經營咖啡店的N1有很深的感觸：

蘭嶼就這麼幾千人，扣掉老的、小的、不能用的，剩下的人就不多。何況，我們要處理的問題也很多，核廢、生態、獨居老人，人根本不夠用。而且，這中間有很多問題還不是我們自己造成，很多都是台灣帶給我們的。

在缺乏就業市場的影響下，蘭嶼多數的青壯年人口必須離散到台灣賺取薪水維持生計。儘管島上在觀光業興起後，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因而能支持有心的年輕人留在家鄉打拼。然而，留在島上的年輕人卻也囿於觀光季時，要接待大量的觀光客，而無法專心而持續地推動反核廢運動。不少受訪者皆指出，觀光季時，青年行動聯盟幾乎停擺，在大家都忙碌的情況下，只能希望淡季時能再度聚集年輕人一起討論。對此，N1繼續表示：

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戰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特別是在觀光季時，忙碌的生活更增加青年的負擔。畢竟，又要負擔日常生活的瑣事，又要撥時間開會，又要閱讀相關的資料，根本是為難我們。我們會出來，就是基於使命感，可是也要餵飽肚子阿。

總結以上，基於人力資源可以歸納出三項重點：首先，達悟族的總人口數僅有三千餘人，因此在先天的條件上，限制能參與反核廢運動的總體人數。第二，在島上缺乏就業市場的情況下，許多達悟族的青壯人口必須離散到台灣各地謀取生計，如此將削弱參與反核廢運動的青壯年人口。最後，留在島上的年輕人，即使有心參與，但在觀光旺季時，又會面臨分身乏術的情況，造成青年行動聯盟能討論與推行運動的時間點多侷限在觀光淡季。

若從人力資源的角度檢視，反核廢運動面臨許多結構的劣勢。然而，情況並不見得如此悲觀。網路，作為賦權的工具，將能幫助新一代的反核運動者，跨越地理與種族的限制，進一步擴大參與者的社會網絡。簡言之，網路能降低參與的門檻，使得旅台青年與更多有心參與的台灣民眾，可以透過網路平台接收最新資訊。另外，網路也可以幫助原住民可以建立自我發聲的平台，而不需要完全透過主流媒體的中介。

肆、媒體資源

媒體資源對於社會運動而言，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從墨西哥Zapatista運動中的經驗可以發現，社運團體一方面與主流媒體保持聯繫，確保議題能在全國與全球性的媒體曝光；另一方面，也會根據主流媒體的報導，即時透過網路作出回應，假如有扭曲或誤解的地方，即可以在線上提出聲明與修正。然而，對於孤懸外島，同時又缺乏媒體資源的達悟人而言，由於缺乏獨立發聲管道，因此與主流媒體之間呈現不對等依賴關係。對此，O1指出：

我們一直希望媒體多報導蘭嶼，核廢也好、地方發生的事情也好。但是，一定要抗爭的時候媒體才會來，時期過了，也沒有人關心。

即使主流媒體願意報導蘭嶼的相關議題，但報導的角度礙於許多政治與經濟的壓力，相關新聞的處理並不一定會依循著社會運動者所需求的方向。過去的文獻也支持相似的看法：王嵩音（1998）透過「新聞框架」的概念，探討新聞媒體如何「再現」蘭嶼的反核廢抗爭運動。她的研究結果指出，「報紙媒體在報導主

題、消息來源的選擇、以及報導的方向，一律都偏向威權，充分顯示媒體支持『維持現狀』的主流意識形態。」由此可知，處於弱勢的社群必須確立自我發聲的管道，如此方能建立社會運動的主體性，並且進一步對抗政府與台電公司的政治宣傳。以台電為例，在反核的潮流逐漸興盛的此刻，他們大量在主流媒體購買版面，進行「核能安全」的反宣傳。反宣傳是既得利益者慣用的手段，藉由他們背後所掌握的資源，從各種方式去壓制社會運動者的訴求。對此，O8認為台電與反核廢運動之間，處於高度的資訊不對等的狀態：

政府和當地之間，存在著很高的不對等，包括資訊的不對等。政府有很多管道去散佈核廢料場是很安全的訊息，去說服大眾，這樣的輻射劑量對人體是沒有傷害。政府可以透過電視、透過網路、透過報紙，透過大量的訊息，告訴民眾核能是安全的。

為了弭平資訊的不對等，社會運動者不能只仰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對於主流媒體之外，諸如原住民電視台、獨立媒體、社群媒體等，都可以彌補主流媒體的不足。對此，擔任原住民電視台記者的N2分析：

原住民電視台的成立，就是要平衡商業電視台的報導不足。譬如說反核廢這件事情，我們可以多花一點篇幅在報導歷史與達悟族人的訴求，那麼商業電視台就只能著重在肢體暴力的部分。原民台就比較會奠基在蘭嶼在地的觀點去進行新聞的報導。

除了公共廣電媒體的原住民電視台外，達悟青年也可以尋求網路獨立媒體的支持。例如《苦勞網》與《新頭殼》就長期關注蘭嶼反核廢議題，並且寫出許多相當深入的報導。對此，O8認為：

面對政府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網路就是很好的工具。我們可以把我們所知道的東西，透過網路去散佈。其實網路有一些獨立媒體，像新頭殼

或苦勞網，像這些小眾媒體都可以達到深度報導。透過這些網站，我們可以傳遞屬於達悟的聲音。

除了網路的獨立媒體，另外則是智慧型手機與數位相機的普及，所以許多達悟青年能利用低成本的優勢，製作相關的媒體內容，例如紀錄片或創意短片。而免費的網路平台（例如臉書與YouTube），也成為發佈媒體內容的傳播管道。分析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與主流媒體之間，正逐漸擺脫單向依賴的失衡關係。對此，過去曾擔任公共電視台記者的O7樂觀地表示：

現在很多智慧型手機，都可以拍照和攝影，只要簡單的剪接，就可以利用臉書、部落格等，將這則故事分享出去。

以筆者多次前往蘭嶼網咖的觀察，許多蘭嶼的孩童，都有臉書帳號，並且會在臉書分享各種訊息。整體而言，蘭嶼孩童的網路使用技能並不會落後於台灣。另外，對於達悟青壯年世代而言，更是有非常多的人口使用智慧型手機，而他們也會透過文字與照片記錄生活，並且上傳至臉書的平台。可以說，科技產品與網際網路已經成為多數蘭嶼青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網路科技逐漸交織於日常生活的情況下，相當有利於反核廢運動在線上的發聲與串連。從上可知，另類媒體確實可以補足主流媒體在報導時的不足：諸如原住民電視台、網路獨立媒體、YouTube與臉書等，都可以作為原住民族自我發聲的工具。

第四節、新舊世代的比較分析

本文採取民族誌研究方法，進入蘭嶼場域，以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兩種方式，試圖剖析網際網路進入蘭嶼後，對於達悟族反核廢運動的社會資本所產生的改變。在前述的文章中，本文從網絡、規範與資源等三項構面，分析不同構面在新舊世代的轉變。在逐項拆解之後，本文將回到整體的視野，從分析結果進一步回應網路對於蘭嶼反核廢運動所帶來的轉變。〈表4-1〉將透過比較分析的方式，詮釋新／舊世代的差異。

表4-1 新／舊世代比較分析

	舊世代	新世代
網絡	傳統社群 教會與家族網絡 同質性較高	網路社群 跨地的人際網絡 異質性較高
規範	傳統與教會信仰 階層關係 社群承諾：高	傳統混合網路文化 趨近平等關係 社群承諾：低
資源	文化資源：傳統與現代知識 人力資源：以達悟族為主 媒體資源：缺乏 物質資源：缺乏	文化資源：數位知識 人力資源：加入異質群眾 媒體資源：擁有網路平台 物質資源：缺乏

首先，在人際網絡方面，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是透過傳統社群的教會與家族網絡進行動員，社群同質性高，並且擁有共同的規範，相對容易促進成員之間的集體行動。舊世代的社會網絡較為緊密，鑲嵌著高度的共識與承諾，因而能夠凝聚較高的行動規範；然而，該網絡卻也因為同質性過高，缺乏來自團體外部的訊息與資源；對此，舊世代尋求綠色和平組織與黨外學者的結盟，應可視為是突破既有的人際網絡的具體行動。

新世代的反核運動則是以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為中心，透過網路傳播科技，跨越地理限制，向外集結來自網路空間的異質社群，以311反核大遊行為例，活動頁面僅5位發起人，竟集結接近1500名的支持群眾，網路的動員能力可由此觀之。然而，新世代藉由網路所建構的社會網絡較為寬鬆，雖然有助於抗爭行動獲得外部的訊息與資源，但也因為異質性較高，相對缺乏社群成員之間的承諾與規範。對此，組織青年行動聯盟的主要幹部，正在思考如何透過網路整合長期而有效的行動規範。

至於抗爭運動所形成的「行動規範」與協調世代衝突的「世代規範」。在行動規範方面，由於舊世代反核廢的動員者是部落耆老與教會牧師，藉由家族與信仰的雙重影響，形成高度封閉與階層關係鮮明的社會網絡，因而能凝聚較高的行

動規範；然而，對於新世代而言，經歷現代教育及資訊教育的洗禮，即使仍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但鮮明的階層規範已逐漸式微，朝向更為平權式的行動思維。此外，達悟青年透過網路，集結眾多異質的群眾，儘管能增加近用資源的管道，但卻不利於建構長期而穩定的集體行動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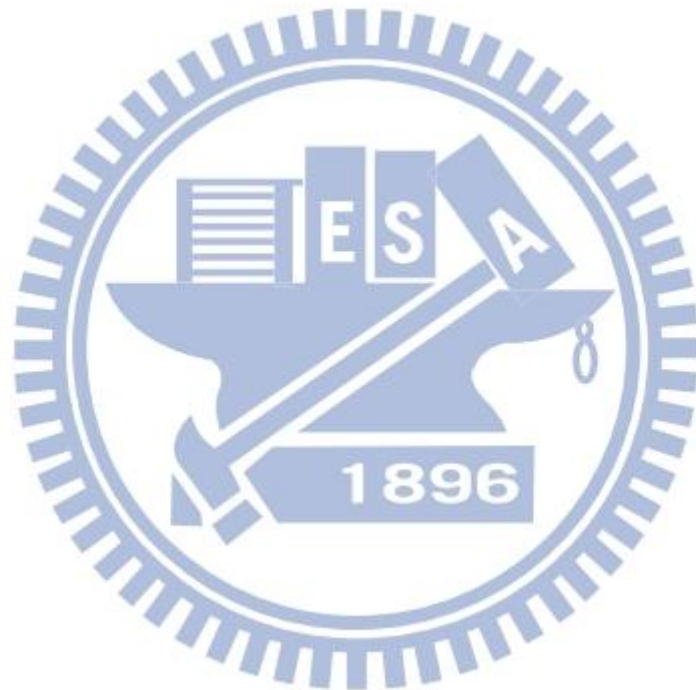
至於世代規範。現今的達悟族仍然保有尊重長老的習俗，即使新世代的反核領袖逐漸抬頭，但礙於傳統習俗，許多年輕人仍不敢直接在討論中表達自己的想法。因此，網路就成為達悟青年在討論與形塑反核廢共識的平台。如同Landzelius（2006）說明加勒比海原住民Tonga的例子：網路空間促進Tonga的年輕人開始討論現實世界所不能提的禁忌話題，例如性與政治腐敗等。對照Tonga與達悟族的例子，可以發現不同的時空脈絡下，卻共享相同的經驗：新一代的原住民青年將在網路空間中，挑戰與改寫傳統文化的疆界。

最後，在資源的面向，由於成功的社會運動需要豐沛的物質、人力、文化與媒體資源，分析兩代蘭嶼的反核廢運動，各自都基於不同的時空脈絡，組織最適合的資源型態進行抗爭。首先是文化資源，舊世代缺乏解釋核廢料的詞彙，因此策略性地挪用傳統的惡靈符號進行抗爭，如此將能有效與族人進行溝通，並且抓住主流媒體的注意力；但對於新世代而言，傳統知識已逐漸流失，取而代之的是成長過程中所學習的數位知識。而這些數位知識，將能夠幫助新世代的反核運動者開創更具有創意與爆發力的反核廢運動。

至於人力資源的型態，舊世代是以部落成員為主，參加群眾約為三百至四百人；而新世代則在網路的輔助下，迅速動員近1500人的支持群眾。兩相比較，似乎是新世代享有的人力資源較豐，然而，應注意的是，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僅是開端，能否長期累積如此高的支持群眾，仍然有待觀察。

至於媒體資源方面，舊世代缺乏自主發聲的工具，因此與主流媒體之間呈現權力不對等的依附關係；然而，對於新世代而言，達悟青年能透過網路進行自主發聲，並且主動尋求輿論與國際團體的支持，分析達悟青年與主流媒體之間，正逐漸擺脫單向依賴的失衡關係。

最後，物質資源的缺乏仍是新舊兩代所共同遭遇的困境，顯示在宏觀的社會結構中，原住民仍然是處於邊緣的弱勢族群，即使網路帶來賦權的潛能，但以蘭嶼長達25年的反核廢運動進行檢視，網路仍無法顛覆既有的社會困境。



第五章、研究結論與建議

在國家現代化的建構過程之中，人數稀少、文化與經濟雙重弱勢的原住民社群，經常是最容易被犧牲的一群。核廢料儲存在蘭嶼，不只是凸顯台灣在工業化過程對於原住民社會的犧牲，政府運用欺瞞手法將核廢料潛入蘭嶼核廢場的作法，亦突顯出達悟原住民自決（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權力的流失。透過蘭嶼反核廢社會運動之社會資本的分析，本文發現，網路作為新興傳播科技，隱藏著弱勢原住民社會運動賦權的可能，其可以從科技（technology）與結構（structure）兩個面向進行討論。

第一節、網路傳播科技

隨著網路傳播科技進入蘭嶼達悟族的日常生活，其與達悟社群之間的相互形塑，可以從「傳播管道轉變」與「傳播科技賦權」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壹、傳播管道轉變

早期台灣原住民並沒有文字，部落裡的傳播主要是以「口語」的形式，直接透過聲音語言來傳遞訊息與表達情感。延伸聲音和肢體的傳播形式，原住民各族的傳統社會，發展出非常豐富的樂舞傳統和祭儀活動。各種文化訊息的傳遞、人際的情感抒發，經常透過吟唱與祭典儀式，達到訊息溝通與傳遞的效果（孫大川，2010）。如同台灣地區的原住民，口語傳播對於達悟族而言，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是以教會與家族作為聚會場所，進行訊息的散播與傳遞。經由此種面對面（face-to-face）的傳播，相當容易達到溝通與說服的效果。諸如教會與部落會議等場所，更是具體展現哈伯瑪斯對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想像。

然而，上述以口語為主的傳播型態，在網路科技逐進入達悟族的日常生活後，正逐步產生傳播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的轉變。本研究發現，2012年的反核廢運動，多數受訪者皆表示，他們是從臉書的活動頁面，得知抗議的相關訊息。由此可知，儘管部落的主要溝通型態仍是以口語為主，但在網路傳播科技的

介入下，訊息的傳播管道正逐漸轉往線上，形成雙軌並置的傳播系統。此種雙軌並置的傳播系統，實與網路社群逐漸由「線下」轉向「線上」；由「虛擬」轉向「實體」的社群連帶有關。諸如臉書等社群媒體，是以每位使用者的線下社會網絡為基礎，再進一步發展至線上。易言之，線上與線下的社會網絡，逐漸呈現高度重疊的狀態。在此種情況下，使用者從臉書社群所關注的動態，實際也是線下生活所發生的大小事。

對於達悟社群而言，由於大多數的達悟青年都有臉書的帳號；因此，在臉書的平台之中，正逐漸發展成「線上達悟社群」。如同Howard（2004）指出，傳播科技已經鑲嵌在個體的生活當中，作為個體瞭解世界以及與他人互動的媒介。本研究發現，網路科技正逐漸鑲嵌至達悟族的日常生活，諸如部落文化基金會、蘭嶼青年行動聯盟、居家關懷協會等實體的組織都有臉書帳號。不論是達悟青年或是各種NGO團體，都會透過網路平台，進行訊息的傳遞與議題的討論。對於21世紀的原住民族而言，達悟族非但沒有被排擠於數位化的浪潮之外，相反地，他們能積極地挪用網路，並且使網路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貳、傳播科技賦權

如前所述，網路傳播科技的介入，造成達悟族傳播管道的轉變。然而，當部落的傳播管道逐漸轉往線上時，對於反核廢運動的社會資本而言，所帶來會是正向或負向的影響？過去的文獻對於網路有著高度期待，認為網路的連結特質，讓使用者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而與他人進行聯繫（Lin, 2001）。另也有學者從實證研究中發現：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社群的概念逐漸由地理連帶中解放，人們互動的對象不再限於附近的鄰居，網絡成員可以跨越空間的限制，進而有效幫助使用者能維持原本的社會聯繫與社會支持（Hampton, et al., 2009; Wellman, et al., 2001）。

本研究從新世代的反核廢運動中發現，網路確實具有建立社會連結（social ties）的特質，如此將可以擴大社會運動的範疇，並且建立跨越時間與空間的異質社群。此外，對於經常散居於各大都市的達悟族人而言，在溝通不易的情況下，

網路正好能提供原住民運動者一個低成本，並且可以進行聯繫與動員的溝通平台。具體而言，網路對於新世代的反核運動，能夠帶來四項正面效益：首先，網路使得新世代的反核運動可以跨越地理限制，直接聯繫到離散的旅台青年。第二，網路可以增加反核廢運動的異質性，使得運動得以從種族中心(ethnic-based)解放，成為一般台灣民眾也能關切的議題。第三，網路的全球特性，可以促進跨國網絡的形成，促使反核廢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第四，網路對於青年行動聯盟的內部社群而言，則是能促進訊息的傳遞，作為彙整初步共識的平台，並且維繫社群的運作。

從新世代的反核廢經驗中，本研究發現：網路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在於能擴大既有的社會網絡，使得分享相同價值的公民與團體能夠彼此串連，進而凝聚更高的影響力。

此外，從媒體資源的角度進行分析，網路可以作為原住民自我發聲的平台，平衡主流傳播媒體所挾帶的漢人勢力與詮釋觀點；換言之，網路的連結效應，可以增加獲取媒體資源的可能。傳統大眾傳播媒介的時代，是以「媒體產業」（如報紙或電視台）為核心的訊息傳播方式，「一對多」的傳播使得媒體產業擁有絕對的媒體資源。然而，在網路傳播世代的來臨，以「個別主體」、「多對多」的訊息傳播方式，分散媒體權力。當傳遞的訊息獲得興趣相投、關心人士的共鳴與迴響時，便能發揮強大的人際網絡連結功能，迅速累積人氣，反過來吸引主流傳播媒體進行相關報導。2012年於台北市舉辦的「311反核廢遊行」，網路社交媒體平台的人際連結即發揮相當大的效應，連帶地影響主流媒體如報紙與電視台給予媒體空間、進行報導。

網路除了能使運動者擺脫與主流媒體之間的不對等依賴關係，更是可以積極的作為發聲的主體。本研究發現，諸如《苦勞網》、《新頭殼》等以網路為主的獨立媒體，對於蘭嶼的關注都比主流媒體還要多。此外，諸如個人的臉書專頁、或是影音分享網站等，也是可以讓原住民近用網路媒體，並且獲得自我發聲的工具。對此，本研究結果呼應長期在蘭嶼進行數位典藏工作的學者郭良文與林素甘

的看法：新傳播科技可以讓蘭嶼當地人展現自己的觀點，也是相當好的文化保存工具，更是讓外界正確瞭解當地特殊文化的一個新興媒介（郭良文&林素甘，2010）。

至於網路所形成的規範。當達悟青年透過網路迅速集結人群，群眾之間所形成的是短暫而有效的行動規範，特別是311反核大遊行，眾人在約定的時間走上街頭，提出共同的訴求，顯示網路在相當程度能整合高度異質性的群眾，並且促成集體行動。然而，透過網路動員所凝聚的網路社群，來自四面八方，因共同興趣或價值觀的連結，仍無法克服因彼此連結程度低所帶來的挑戰，包括組織動員的系統、社群規範的遵守、或有效資源的運用等。換言之，迅速累積的網路社群，因為異質性高、人人皆平等的社群位階，使得持續性的動員較為困難；相對於此，傳統社群因為蘊藏著家族體系的階層關係，組織結構已成，分工與執行命令的體系較為明確。相對於此，網路社群的組織結構不穩，不利於日後長期社會運動的進行，如何有效凝聚社群規範也成為另一個原住民社會運動待解的難題。如同Earl與Shussman（2003）的研究結果：在網路行動主義（e-activism）的年代中，原有的夥伴（member）變成使用者（user）。成員之間缺乏承諾與情感歸屬，如此將造成群眾在短暫的支持後又轉往他處；因此，在網路平台中，相當難以建立信任與強連結的社會關係。

第二節、社會資本的檢討

儘管網路能突破部分的社會困境，使得達悟族的反核廢運動能夠跳脫地理的限制，直接與台灣主流社會建立連結。然而，本研究發現，網路對於社會資本的影響多限於社會網絡（network）的層面。至於社群的規範與資源，則仍受限於既有的社會結構的宰制，網路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相當有限。

首先於巨觀社會結構的層面。蘭嶼在快速進入資本主義的體系後，被迫放棄原有的生產型態，轉而投向台灣本島的就業市場。然而，投入就業市場的過程，又礙於文化與教育的衝突，因而相對難謀得收入較高的職業。整體而言，達悟族

相當缺乏經濟資源。囿於經濟資源的缺乏，將會使得部分弱勢的居民高度倚賴台電公司所提供的補助金。因補助金所引起之內部社群的對立，長遠下來，將削弱反核廢運動的共識，甚至侵蝕達悟族內部的信任關係，形成整體民族的「去社會資本化（social decapitalization）」。

除錯誤的國家政策導致信任關係的衰退外，也因為達悟族的人口相當稀少，如此將造成投入社會運動的人數相對缺乏。基於人力資源，本研究歸納出三項主要的發現：首先，達悟族的總人口數僅有三千餘人，因此在先天的條件上，限制能參與反核廢運動的總體人數。第二，在島上缺乏就業市場的情況下，許多達悟族的青壯人口必須離散到台灣各地謀取生計，如此將削弱參與反核廢運動的青壯年人口。最後，留在島上的年輕人，即使有心參與，但在觀光旺季時，又會面臨分身乏術的情況，造成達悟青年能討論與推行運動的時間點多侷限在觀光淡季。

不論是缺乏就業市場所導致的離散社群，或是處於經濟劣勢的情況下，使得補助金分裂原本具有高度共識的反核廢運動。這些結構上的弱勢，並無法透過網路進行扭轉。許多結構上的阻礙，仍然需要回到族群正義的角度，敦使政府在政策上進行改革。網路，在社會改革的運動中，僅能作為運動的手段，而不能作為運動的最終目的。

對於以社會資本的概念框架來檢視蘭嶼社群的反核廢運動，本研究綜合過去學者的討論，將社會資本的概念分成網絡、規範、資源等三項構面進行探討。儘管三項構面大抵能有效觀察並分析蘭嶼社群在挪用社會資本的情形；然而，將社會資本細分成三項構面卻也有其侷限之處：例如在處理宏觀的社會結構時，屬於相對微觀，關注在社群的面向即有未逮之處，需要另闢篇幅處理。對於後續的研究者而言，如何立基在這三項構面的基礎上，發展出適合達悟族，甚至是台灣原住民社群的「社會資本」框架，將是後續可以發展的方向。

第三節、反核廢運動的實務建議

本文從社會資本的概念框架，分析蘭嶼新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以下，本文將從實務的方向，提出四點建議，作為後續反核廢運動所能參考與採取行動的策略。

首先，反核廢運動必須突破以地域及種族為核心的既有思維。由於達悟族的人口相對稀少，整體所能發揮的影響力有限。作為新世代的反核廢領袖，必須思考如何透過網路，串連主流與邊緣社群的支持，如此方能擴大社會運動的人際網絡，進而提高運動的影響範圍。為獲得主流與邊緣社群的支持，就必須重新定調目前反核廢運動的論述框架，使運動能連結「原住民人權」與「核電歸零」等社會思潮，讓更多民眾瞭解：蘭嶼反核廢運動所關乎的，不僅是達悟族的利益，更是整體社會能朝向平等、正義與永續發展的關鍵戰役。

第二，作為推動反核廢運動的核心幹部，必須要納入更多學術社群的支持。如同許多受訪者提及，目前反核廢運動的科學論述仍相對薄弱。然而，對於許多達悟人而言，他們又缺乏閱讀科學文獻與執行實證研究的能力。在缺乏相關人才的情況，自然會形成運動論述的薄弱。對此，反核廢運動的核心幹部，就必須要納入更多知識分子的協助。以目前而言，即需要有核能專業背景的學者來協助蘭嶼人進行全島輻射值的平行監測。除科學背景的學者外，達悟社群也需要更多熟稔各國語言的人才，如此方能串連如中生勝美等國際學者與非政府團體的支持。此外，具備多國語言能力的人才，也可以將反核廢運動的訴求，翻譯成外文，提供給國際媒體，藉由國際媒體的能見度，給予台灣政府與台電公司更多的壓力。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社會運動者不能再將運動範疇限縮於本地，而是必須要從全球的視野中，思考如何進行在地實踐。

第三，多方面利用網路的發聲潛能。儘管許多達悟青年已經意識到網路的賦權能力。然而，從國外的社運經驗可以發現，達悟青年仍然未完全發揮網路的潛能。諸如建立專屬頁面，定期更新反核廢的相關資訊；惡搞創意；或是更激進地

透過信箱轟炸，癱瘓台電公司的伺服器，都尚未被運用。目前達悟青年在使用網路時，多屬「一次性」的社會動員。例如311反核廢大遊行的活動過後，該社會網絡就告消失。本文建議，可以透過實體活動的機會，將參與的成員，移往正式與長期經營的網路平台。如此可以使得一次性的社會網絡能夠持續，並作為長期參與反核廢運動的固定班底。

第四，建立達悟族內部彼此對話與形塑共識的平台。達悟人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對於很多敏感議題都有所顧忌，大多不敢直接挑戰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族人。因此，許多公共議題都失去理性辯論的機會。例如新舊世代之間，年輕人多不敢在面對面的場合中，向長輩表達自己的看法，因此很多事情並無法進步，形成停滯的狀態。補助金的爭議也是，即使島上已經隱晦形成「擁核」與「反核」兩派。但這兩派之間，並沒有討論與對話的場合，只能在街頭巷尾的閒聊中，猜測彼此的想法。對此，本文建議，不論在線上與線下，都需要建立穩定的對話空間，如此才能進一步彙整達悟民族的集體共識。

推動蘭嶼反核廢運動，是台灣社會能否公平對待每個民族，進一步實踐轉型正義的關鍵。對於後續的反核廢運動而言，雖然擁有網路這項強而有力的傳播工具，但運動同時也受到許多社會結構的宰制。對此，本文所提的四點建議，將可以作為新一代反核廢運動的參考的依據。

第四節、研究方法的反思

得天獨厚的蘭嶼，蘊涵豐富而獨特的文化與生態體系，自日治時期開始，即吸引許多學者前往田野調查，直到今日，已經累積為數可觀的研究資料。然而，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素材，雖成就大量的研究史料，並留下許多珍貴的紀錄，但也因為依賴非蘭嶼社群之研究者代為訴說的歷史記憶，而未能完整建構屬於蘭嶼的主體觀點（林嘉南、謝來光、夏曼·藍波安，2012）。紀駿傑（2005）也批評，諸多原住民研究將關注焦點放在考古、祭典儀式、宗教與物質文化的研究，忽略原住民現實生活的處境，使得原住民被「博物館化」，並忽略日常生活的脈絡。

有鑑於此，當代原住民研究，應思考如何彰顯原住民主體，促使原住民扭轉被觀察的客體位置，同時，研究者更應實際參與社群，瞭解當代原住民的生活脈絡，如此方能達成學術上的「去殖民（decolonized）」。

本研究採取民族誌法，進入蘭嶼場域，試圖瞭解達悟族的生活脈絡。然而，在多次前往蘭嶼的過程中，卻觀察與聆聽到達悟社群對於研究者的反彈與不耐。如同一位匿名的受訪者表示：

很多學者來蘭嶼做研究，然後回台灣發表，其實這是有問題的，因為他消費了蘭嶼，然後用來彰顯自己的學術地位。我其實滿頭痛這件事情，所以我在過來的時候（指接受訪問），我也是考慮了非常久。

其實，當筆者越是瞭解蘭嶼，越是發現學術團隊與當地社群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此種緊張關係，某種程度也影響到本研究的執行，很多值得訪問的受訪對象，一聽到「研究」兩個字就直接拒絕訪問。可以說，大量的關注讓蘭嶼人感受到研究帶來的打擾與不便，進而逐漸形成抗拒學術研究的思維。然而，關注，是一種壓力，也是一種資源。蘭嶼，雖然受到這麼多的關注，但許多問題卻一直沒有解決。假如，台灣的媒體與學術圈都不再關心蘭嶼時，台電的勢力是否會越龐大？而政府是否會越不重視蘭嶼人的訴求？本文認為是肯定的。有關心、有曝光才能對執政者帶來壓力。目前，蘭嶼遇到的議題，許多都是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必然遭遇的困境與挑戰。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扎實的學術論述來導引公眾的支持。

如何在研究主體與研究方法之間取得平衡，本文試圖提出三個方向供後續的研究者參考。

首先，研究者與研究社群之間須建立彼此信任的研究關係，而建立信任的基礎在於長期的互動。研究不能只是短期的資料蒐集，而是要長期「蹲點」，從達悟族日常生活的脈絡中，發現值得分析的文化現象。如此方能確定研究問題是扎

根於本地，並且不會產生過度詮釋與誤讀的情形。對此，一位匿名的受訪者的想法或許可作為後續研究的思考的角度：

直接約人訪談，其實就是要縮短取得資料的時間，沒有長期瞭解的結果，就可能造成一些誤解或偏差。你其實會隨著你瞭解的程度，慢慢去修正自己的觀點。畢竟，蘭嶼的組織系統與台灣社會實在是差太多了。從台灣的邏輯去思考，其實會卡卡的，甚至寫不出來。

第二，在實際研究的執行上，必須要考慮研究對象是否會因為錄音機、照相機與攝影機等紀錄設備，而產生不舒服的防衛心理。假如有，那麼科技就會介入訪談之中，使資料受到一定的汙染。對此，本文對於不接受錄音的受訪者，多是採非正式的閒聊，透過輕鬆對話的過程，化解受訪對象的不安心理。待閒聊結束後，再以田野筆記的方式，紀錄值得進一步探討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受訪者在與研究者有了初步的認識後，大多能建立基本的信任關係，此時，即可以再進一步邀約受訪者進行正式的深度訪談。

第三，分享學術成果。許多受訪對象皆表示，他們犧牲個人的時間，接受訪談，但學者回到台灣後，並沒有依據承諾將發表的論文提供給受訪者。缺乏學術上的「回饋（feedback）」也是使得蘭嶼社群長期不信任台灣學術團隊的緣故。

整體而言，當傳播研究進入人類學場域時，必須要把握信任（trust）、尊重（respect）與回饋（feedback）等三項重點。如此才能確定研究者的外在因素不會干擾場域，並且盡量避免研究對象所可能產生的不舒服心理。

第五節、研究限制

本文針對蘭嶼反核廢運動，採取民族誌法的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探索網路傳播科技對於原住民社會運動之社會資本的動員與凝聚。大抵而言，本研究有三項主要的研究限制。

首先，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鎖定在參與反核廢運動的主要幹部。舊世代以牧師與傳道人為主，新世代則是以蘭嶼青年行動聯盟為多數。在此種情況下，可能會造成本研究取得的資料偏向「菁英取向」，而忽略更多達悟族人的想法。對此，本研究於後續須進一步訪問如N10等一般居民的想法。此外，因為訪談的主體是反核廢運動的幹部，因此在「擁核」與「反核」的光譜中，本研究主要獲得的是支持核廢場遷走訊息，對於更多弱勢居民的想法，則仍未有機會深入地瞭解。倘若能分析達悟族內部，關於優勢與弱勢社群之間，對反核廢運動的看法，如此將可以作為進一步探討內部異質性的方向。

第二，本文為瞭解新科技對於反核廢運動的影響，以供應電力作為分水嶺，區分新與舊世代的反核廢運動者。此種區分的方式，確實有利於本文釐清新科技對於達悟族的網絡、規範、資源所造成的影響。然而，區分新與舊，卻有可能陷入過度二分的窠臼。整體而言，現代科技與達悟社群之間，是動態形塑的過程，部分舊世代也會移民至新世代—採用新科技作為獲得訊息的管道。關於數位「移民」的過程，仍是本文未討論到的面向。

最後，本文所關注的對象是蘭嶼達悟族的反核廢運動，試圖從達悟族反核廢的經驗中，反思網路傳播科技對於原住民社會運動的影響。然而，因為「原住民」所指涉的對象並不是先驗、固定與均質的整體，相反地，它是在歷史的脈絡中，不斷與各社群互動的結果。因此，達悟族的反核廢經驗，固然值得其他原住民作為借鏡，但整體而言，探討原住民與傳播科技的互動時，仍需回顧不同部落的民族性格與特定的歷史背景，如此才能進一步瞭解、比較與歸納台灣原住民族在挪用網路傳播科技的經驗。

參考書目

- 王顯中、陳韋綸（2012）。〈Pongso No Tao 不只反核廢 更反殖民〉。上網日期：2012年8月10日，取自：<http://www.cooloud.org.tw/node/66823>
- 王嵩音（1998）。〈原住民議題與新聞再現：以蘭嶼核廢料場抗爭為例〉，《台大新聞論壇》，5：111-136。
-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1）。《100年數位落差調查報告》。上網日期：2012年8月10日，取自：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024389&ctNode=12062&mp=100>
-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1989）。《蘭嶼地區社會發展與國家公園計畫》。台北：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1984）。《蘭嶼地區自然及人文資源保育與開發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
- 孔文吉（2000）。《忠於原味：原住民媒體、文化與政治》。台北：前衛。
- 李亦園（1992）。《台灣土著民族的社會與文化》。台北：聯經。
- 李英明（2000）。《網路社會學》。台北：揚智文化。
- 林鶴玲、鄭陸霖（2001）。〈台灣社會運動網路經驗初探：一個探索性分析〉，《台灣社會學刊》，25：111-156。
- 林嘉南、謝來光、夏曼·藍波安（2012）。〈蘭嶼原住民研究與數位典藏的反思與展望〉。上網日期：2012年12月8日，取自：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C00_index.php?PHPSESSID=d14ufv010u7o5ret6q0jae7460&Pfile=2318&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width=900&height=650
- 郭良文（2010）。〈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7：43-74。
- 郭良文、林素甘（2010）。〈從參與式傳播觀點反思蘭嶼數位典藏建置之歷程〉，《新聞學研究》，102：151-175。
- 教育部（2008）。〈台灣資訊教育推動理念、策略與現況〉。上網日期：2012年8月20日，取自：<http://www.edu.tw/>
- 夏鑄九、陳志梧（1988）。〈台灣的經濟發展、蘭嶼的社會構造與國家公園的空間角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4)：233-246。
- 黃彩惠（1990）。《蘭嶼反核廢場運動之動員過程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厚銘（2009）。〈邁向速度存有論－即時性電子媒介時代的風險〉，《新聞學研究》，101：139-175。
- 紀駿傑（2005）。〈原住民研究與原漢關係：後殖民觀點之回顧〉，《國家政策季刊》，4(3)：5-28。
- 孫大川（2000）。《夾縫中的族群建構：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台北：

聯合文學。

- 翁翠萍 (2007)。〈世界第一 台灣完成「村村有寬頻」〉。上網日期：2012 年 8 月 10 日，取自：<http://blog.yam.com/tmbit/article/13121445>
- 蔡友月 (2007)。〈遷移、挫折與現代性：蘭嶼達悟人精神失序受苦的社會根源〉，《台灣社會學》，13：1-69。
- 蔡文輝 (2000)。《社會學理論》。台北：三民。
- 張玉佩 (2012)。〈初探傳播科技在部落：網咖與蘭嶼原住民日常生活〉，《資訊社會研究》，23：96-119。
- 張桓凱 (1997)。《滅族恐懼的建構：草根組織與新聞媒體對蘭嶼反核廢運動的意義建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鵬元 (2012)。〈臉書社會運動，台灣新力量〉。上網日期：2012 年 9 月 28 日，取自：<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2090513590010A>
- 蘭嶼鄉戶政事務所 (2011)。〈蘭嶼鄉一百年九月份人口統計表〉。上網日期：2012 年 9 月 8 日，取自：www.lanyu-house.gov.tw/?Act=page5
- 關曉榮 (1997)。《蘭嶼報告 1987-2007》。台北：人間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Barney, D. (2004).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 Bakshy, E., Rosenn, I., Marlow, C. & Adamic, L. (2012).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s in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the Proceedings of ACM WWW 2012, April 16-20, 2012, Lyon, France.
- Belausteguigoitia, M. (2006). On line, off line and in line: The Zapatista rebellion and the uses of technology by Indian women. In K. Landzelius (Ed.), *Native on the net: Indigenous and diasporic peoples in the virtual age* (pp.94-11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ennett, W. L. (2003).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networked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2), 143-168.
- Bimber, B. (2000).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ivic engage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4), 329-333.
- Boissevain, J. (1974). *Friends of friends: Networks, manipulators, and coalitions*.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G.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NY: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 & Wacquant, D.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stell,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UK: Blackwell.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 Cottle, S. (2011). Media and Arab uprising of 2011: Research notes. *Journalism*, 12(5), 647-659.
- Earl, J. & Schussman, A. (2003). The new site of activism: On-line organization, movement entrepreneurs, and the changing location. In P. G. Coy (Ed.), *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 Northern Ireland and indigenous movements* (pp.155-187). London: JAI Press.
-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article 1.
- Forte, M. C. (2006). Amerindian@Caribbean: Internet indigeneity in the electronic generation of Carib and Taino identities. In K. Landzelius (Ed.), *Native on the net: Indigenous and diasporic peoples in the virtual age* (pp.132-15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Fukuyama, F. (1999).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Hampton, K., Sessions, L., Her, E. J., & Rainie, L. (2009). *Social isol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How the internet and mobile phones impact Americans' social networks*. Retrieved April 23, 2010, from <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s/2009/18-Social-Isolation-and-New-Technology/Part-1-Introduction.aspx?r=1>
- Howard, W. T. (2010). *Design to thrive: Creating social networks and online communities that last*. Burlington, MA: Morgan Kaufmann.
- Hanifan, L. J. (1916).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chool science*, 67, 130-138.
- Jones, S. G. (1999). Studying the net: Intricacies and issues. In S. Jones (Ed.), *Doing Internet research: Critical issues and methods for examining the net* (pp. 7-35). London, UK: Sage.
- Jorgensen, D. (198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 methodology for human studie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
- Landzelius, K. (2006). Introduction Native on the Net. In K. Landzelius (Ed.), *Native on the Net : indigenous and diasporic peoples in the virtual age* (pp. 1-42).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atukefu, A. S. (2006). Remote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Questions of access, inform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K. Landzelius (Ed.), *Native on*

- the net: Indigenous and diasporic peoples in the virtual age* (pp. 43–6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ee, H. (2006). Debating language and identity online: Tongans on the net. In K. Landzelius (Ed.), *Native on the net: Indigenous and diasporic peoples in the virtual age* (pp.152-168).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ievrouw, L., & Livingstone, S. (2006). Introduction to the updated student edition. In L. Lievrouw & S. Livingstone (Eds.), *Handbook of New Media* (pp. 1-14). London: Sage.
- Loury, G. C. (1977).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P. A. Wallace (Ed.),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pp. 153-186). Lexington, MA: D. C. Heath.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hall, C., & Rossman, G. B. (1994).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
- Miller, D., & Slater, D. (2000). *The Internet: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Oxford, NY: Berg.
- Pew Research. (2011). *Internet Gains on Television as Public's Main News Source*. Retrieved April 19, from: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1/01/04/internet-gains-on-television-as-public-s-main-news-source/>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s*, 24, 1-24.
- Portes, A. & Landolt, P. (1996). The down side of social capital. *The American Prospect*, 26, 18-22.
- Putnam, R. D., Leonardi, R., & Nanetti, R. Y.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65-78.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MCB University Press, 9 (5). Retrieved April 19, from: <http://www.marcprensky.com/writing/prensky%20-%20digital%20natives,%20digital%20immigrants%20-%20part1.pdf>
- Salazar, J. F. (2007).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 Latin America. In E. L. Dyson, M. Hendriks & S. Grant (E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people*

- (pp. 14-26). Hershey: Information Science Publishing.
- Stein, L. (2009). Social movement web us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US movement websites. *New Media & Society*, 11(5), 749-771.
- Sissons, J. (2005). *First peoples: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their futures*. London, UK: Reaktion Books.
- Theocharis, Y. (2011). Cuts, tweets, solidarity and mobilization: How the Internet shaped the student occupations. *Parliamentary Affairs*, 65, 162-194.
- Valenzuela, S., Park, N., & Kee, K. F. (2009). 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 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trust, and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4), 875-901.
- Van Laser & Van Aelst. (2009). Internet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on repertoir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3(8), 1146-1171.
- Van de Donk, W., Loader, B. D., Nixon, P. G. & Rucht, D. (2004). Introduction: Social movements and ICTs. In W. Van de Donk, B. D. Loader, P. G. Nixon & D. Rucht (Eds.), *Cyberprotest: 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s* (1-26). London, UK: Routledge.
- Watkins, S. C. (2010). *The young and the digital: What the migration to social network sites, games, and anywhere media means for our futur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Wellman, B., Quan-Haase, A., Witte, J., & Hampton, K. (2001). Does the Internet increase, decrease, or supplement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commit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5(3), 436-455.
- Zuckerberg, M. (2011). Letter from Mark Zuckerberg. Retrieved April 19, from: <http://finance.yahoo.com/news/mark-zuckerberg%E2%80%99s-ipo-letter--why-facebook-exists.html>

附件 訪談大綱

構面	舊世代	新世代
網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當初反核是透過哪些方式告訴部落的民眾？ 2. 誰是主要的動員者？動員的方式為何？參與的人數有多少？ 3. 教會扮演何種角色？ 4. 傳統家族扮演何種角色？家族網絡在各部落的情況？ 5. 如何聯繫旅台的達悟族人？ 6. 有沒有尋求台灣團體或學者的支持？有哪些？大概有多少人？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為何會想要再度提起反核的議題？ 2. 誰是主要動員者？串連的方式為何？總共參與的人數？參加的人大概是哪些？人數？ 3. 蘭嶼青年行動聯盟扮演的角色？ 4. 網路傳播科技扮演的角色？ 5. 如何聯繫旅台的達悟族人？ 6. 有沒有尋求台灣團體或學者的支持？透過哪些方式？大概有多少人？
規範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當初反核廢的共識如何凝聚？島上共識高嗎？ 2. 族人之間的動員是否與傳統文化有關？有的話是哪些部份？ 3. 牧師或者耆老出來帶領，是不是更能說服族人出來反抗？為什麼？ 4. 年輕人如何與部落的老人達成反核共識？ 5. 與台灣團體合作的過程，會不會遇到價值觀的衝突？若有的話，如何協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反核廢的共識如何凝聚？透過哪種方式？網路還是親身討論？島上共識高嗎？ 2. 族人之間的動員是否與傳統文化有關？例如家族的體系。 3. 帶領的人還是教會牧師和耆老嗎？若不是，領導的方式有何改變？ 4. 年輕世代在認同反核的議題是否有差異？ 5. 311 在台北的反核有上千人參加，你們如何制定行動規則，譬如集合時間與訴求。參加成員遵守的程度為何？ 6. 如何看待老人和年輕人在反核廢想法的差異？
資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當時抗爭的策略為何？譬如說與族人溝通的策略，或是媒體策略。 2. 傳統知識如何幫助族人理解核廢料？如何運用傳統的符號？ 3. 當時參加的人大概是誰？有多少人？籌畫的幹部和現場參加的族人是否足夠？ 4. 活動的經費、設備、宣傳品是否足夠？不足的話有哪些單位會提供？ 5. 當時如何與媒體溝通？假如沒有媒體願意報導，是否有採取其他方式爭取曝光？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你是否擁有電腦？網路？通常會使用哪些社群媒體？使用情形為何？ 2. 你在什麼時候學習電腦與網路的使用技能？ 3. 這些技能如何幫助你思考或策畫 220 與 311 的反核運動？ 4. 220 與 311 參加的人大概是誰？有多少人？籌畫的幹部和現場參加的族人是否足夠？ 5. 活動的經費、設備、宣傳品是否足夠？不足的話有哪些單位會提供？ 6. 如何與主流媒體溝通？假如沒有媒體願意報導，是否有採取其他方式爭取曝光？